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 一种批判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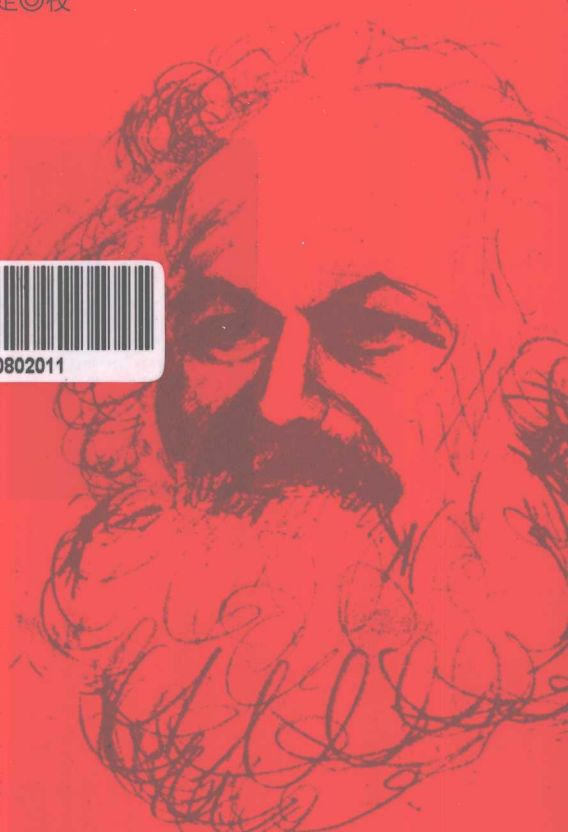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著

张翼星 万俊人 译

黄振定 校



NLIC297080201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6043号

本书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所谓“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的倾向”。作者以马克思的“原来学说”与苏联的社会现实相比较，认为苏联的现实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后果，更不能说是这种学说的实现。书中丰富的史料和作者犀利的笔锋，对我们深入展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查询图书信息，下载教学资源：  
<http://www.crup.com.cn/gggl>

ISBN 978-7-300-14868-7

ISBN 978-7-300-14868-7



9 787300 148687 >

定价：3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 [美] 马尔库塞著；张翼星，万俊人译；黄振定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14868-7

I. ①苏… II. ①马… ②张… ③万… ④黄…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  
IV. ①B5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6939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的分析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著

张翼星 万俊人 译

黄振定 校

Sulian de Makesizhuy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2 000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愿意将自己的新作纳入丛书。为此，我谨代表本丛书编委会对各位尊敬的读者、作者、译者、出版者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工作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随着实践的迅猛发展，思想理论发展的步伐也日益加快。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断推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2004年以来，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交相辉映，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理性。从国际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运用的普及，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如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全球社会治理、世界体系演进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国际学术界很多有识之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是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的关系、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研究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还从当代人类的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新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及其发展源流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对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为推进我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事业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我国近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新作，译介给我国读者。其中，有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研究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规律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的未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有的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成果，如生态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等，可以给我们思考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启发。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这些作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08年3月28日于北京西单

##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美籍德裔哲学家, 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 16 岁那年,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7 年, 他曾应征入伍。1920 年他入弗赖堡 (Freiburg) 大学学习, 就读于存在主义创始者海德格尔 (M. Heidegger) 门下, 同时旁听现象学家胡塞尔 (E. Husserl) 的课程, 1922 年获博士学位。1932 年, 他来到法兰克福 (Frankfurt) 社会研究所, 与该所所长霍克海默 (M. Horkheimer) 一起, 积极开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活动。希特勒 (A. Hitler) 上台后, 他离开德国, 先到社会研究所设在瑞士日内瓦 (Geneva) 的办事处任职, 1934 年转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 (Columbia) 大学的社会研究所, 开始了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工作, 成为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 (T. W. Adorno) 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40 年他加入美国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任华盛顿战略研究局研究员。1951 年, 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 (Harvard) 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1954—1965 年在布兰代斯 (Brandeis) 大学、1965—1976 年在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1979 年 7 月 29 日, 他在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讲学途中逝世。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颇为激进的思想家。他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著述甚多, 概括地说, 他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和先进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系统而激烈的批判, 《单面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一方面则是对苏联的某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批判性的考察。本书集中反映了后一方面的理论活动。全书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政治学原理, 是他在 1952—1953 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 (成立于 1946 年) 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伦理学原理, 是他于 1954—1955 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准备的。本书英文版出版于 1958 年, 1960 年再版, 以后曾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作者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他首先自称，他的评论采取的是“内在批判”的方法，即从其理论前提出发，对其种种后果展开研究，依据这些后果来重新考察其前提。同时，作者认为，解释苏联马克思主义，除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苏联社会的内部结构外，还要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规定。就是说，苏联理论和政治的发展，都反映出西方相应的发展，反之也是如此。这种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从属于历史发展的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范围内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出现了另外的趋势，两个基本阶级之间冲突关系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阶级而行动。他把这看做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意义的因素，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为基础的，并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作者以马克思的“原来学说”与苏联的社会现实相比较，认为苏联的现实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后果，更不能说是这种学说的实现。全书的基本倾向是要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来学说。

所谓“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是指“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的倾向”。他虽没有对这三种形式作出明确的原则区分，但也并没有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从革命初期的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经历了相当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西方革命的延迟和资本主义的稳定，也有利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结构中某些质变的发生。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源头在于列宁主义，但他仍把批判的锋芒集中于斯大林主义。

作者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点，比如，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断，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作者认为这些概念和观点大都既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相脱离，也与原来马克思学说的含义相矛盾。作者极力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说它愈来愈成为政权统治的工具，只是为了实用和宣传，愈来愈远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因而表现出行为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特征。

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大致有以下主要几方面：

## 一、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原来的学说

马尔库塞一开始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最初的概念”。从社会



主体方面立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总之，无产阶级应当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成为历史的动力。这正是马尔库塞作出分析、比较的出发点，是评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实现生产高效率的工业化。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要求直接生产者能够控制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分配，要求发挥无产阶级“来自下面”的主动；但在苏联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工业化，只不过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内，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加速工业化。马克思虽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保持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包含了为国家消亡逐渐创造条件的含义。国家作为统治机器的职能应当逐渐削弱。但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异常环境里，苏维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的体系不但继续存在和发展，行使压抑性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在日益加强，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已相去甚远。更有甚者，由于国家的职能、权力的日益强化，就势必形成一个管理国家和享有国家权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已经具有特殊权力的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俄国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国有化的经济组织，被集中地加以计划与控制，国家成了直接指挥生产机构的政治组织，“成了国有化经济的总经理和人格化的集体利益”。这种状况更加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

在文学艺术领域，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实际是自然主义的，主张文艺如实地描绘现实，要使文学艺术自觉而有控制地贯彻苏维埃国家的各项政策。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不但违背艺术本身的特点，而且苏联的美学把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的使命在于揭示“本质与存在间不可克服的对抗”当做“形式主义”来抨击，实际也抨击了艺术本身。这种对抗是一种历史事实，只有在为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使人的存在与本质相一致的社会才能得到解决。艺术是超越性的，苏联却通过行政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遵照政策法规，成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并且成为粉饰现实的装饰品和调解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尔库塞说：“就其职能而言，这种艺术也像个人的自主与认识一样，正在走向衰退。”因此，他认为苏联当时奉行的文艺理论与文艺路线，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

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曾经受到苏联理论界和正统马列主义者的严厉抨击与反驳。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是继承还是偏离？如何看待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的批驳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认为马尔库塞的观点是制造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也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曲解。这当然有一定的根据。同时，西方学者中也有从方法上批评马尔库塞观点的，比如认为马尔库塞批判苏联的社会现实时，不是依据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实际情况，而是搬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批评苏联官僚阶层分裂出“特殊利益”时，也是原则多于事实，缺乏相应的实际材料；等等。对于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问题，马尔库塞逝世以后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和资本主义实践，正在和将会进一步作出判明，我们不必过早地作出结论。

## 二、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而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斯大林主义则是把列宁的某些思想引向极端。可见他并没有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他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有重大区别，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的这种看法是包含合理因素的。

### 1. 对列宁主义的批评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首先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这是苏联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列宁把理论看做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反映，而不看做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和阶级意识的表现，联系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必须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格言，这无异于使无产阶级从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只供利用的客体。这与马克思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不相一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反复强调物质是不以人的感觉、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乃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前提。马尔库塞认为，这便不是把主观与客观看做无产阶级活动中达到的统一，而是把二者分割开来。由此他指责列宁滑向了二元论。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并不

是互相独立的，因而谈不上“派生”或“反映”的问题。他认为列宁主张人要改造世界，必先认识世界，这种反映论是消极、被动的，忽视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能动作用。他批评列宁的反映论是只要反映不要创造的机械论，认为这种消极的反映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相违背的。

马尔库塞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某些观点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把列宁的整个认识论说成消极的反映论，则显然包含某些误解和偏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强调反映论，是与他同马赫主义者激烈论战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有所忽视，可说是某种缺陷，但这种缺陷，在列宁后来所写的《哲学笔记》中显然有所克服。列宁的认识论前后有重要转变和升华，马尔库塞有所忽视。至于马尔库塞指责列宁滑向二元论，更加缺乏根据，列宁从来没有把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看做两个平行、独立的源头，不论在认识论或历史观上，列宁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在政治思想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列宁主义的显著特点是：革命的动力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的党，并强调农民作为同盟者的作用。这正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性而提出的主张。在一般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正是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但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发挥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思想并不一致。

马尔库塞认为，国际上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有所突破的思想，是起源于托洛茨基，列宁一开始就肯定了这一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仍然加以强调，并寄希望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但列宁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潜力，低估了无产阶级的结构、地位和基本变化。因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仍然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块基石，由此而坚持使用的一系列正统的概念，显然与现实的形势、政策相矛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一直存在。

马尔库塞作出的一个评判是：“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是整个列宁主义发展的特征，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断然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列宁主义的出现，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帝国主义论》、《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正是从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

在20世纪初开创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十月革命后，列宁又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实施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且提出了整治官僚主义、倡导政治民主、开展文化革新的一系列新举措。所以，与马尔库塞的论断相反，依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力图创新，才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特征。可见，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基本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 2.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苏联在国际上曾经面对两类大的矛盾、冲突：一类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另一类便是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马尔库塞认为，这两类矛盾是列宁同时承认并看做互相关联的，但列宁的路线、政策，是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础，苏联要加速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就必须利用这类矛盾和冲突。

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进入向社会主义转变之前的最后阶段。马尔库塞认为，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重复了三十多年，它显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相矛盾，因而人们往往把它当做宣传而不屑一顾。当然，这种“总危机”并不意味着一种革命形势或资本主义的崩溃即将到来，而是历史发展的一整个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把世界形势的格局看做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共存。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是社会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产生。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孤立；社会主义限于落后地区；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重新巩固；等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困扰苏联的内外矛盾。斯大林主义相信其内部矛盾可通过国家的“指导”作用解决，而外部矛盾则需通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革命才能最终消除。实际上内外矛盾是相互渗透的。斯大林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有时便把这种斗争转向国际舞台。马尔库塞认为，历史的进展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外部矛盾继续盛行时，苏维埃国家能够解决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使内部矛盾永久存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因此必须加强国内压抑性的政治、军事机构，而这种机构的日益加强，反过来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环境，甚至促进了它的国际联合。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迫承认，内外矛盾互相依赖，使得社会

争端决定政治争端。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法作出如此概括：国家权力可能发展的最高目的，是为国家消亡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随后，他又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之前和在过渡期间必须强化国家权力。这样，苏维埃国家不仅保持了“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相分离，而且经常用“资本主义包围”的“异常”环境来为国家的压抑性的“反常”现象辩护。马尔库塞还特别指出，这种压抑性国家发展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仅是政府官僚阶层的形成，不仅有官僚数量激增和等级制度严格的特征，更在于官僚特权地位的保持和提升。官僚阶层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阶级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来控制基本民众，而这种控制的行使，又产生了控制中形成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苏联的官僚阶层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或国家的名义“代表”社会利益，但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往往被“国家”所僭取。这样逐渐形成的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使苏联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学术文化和物质生活等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在国际上发生过严重影响。马尔库塞着重批评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与危害，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斯大林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高度集中，着重发展重工业，才使苏联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增强了国防力量，因而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后来的苏联解体，正是由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造成的后果。这两种看法显然存在严重分歧。马尔库塞的分析和批评，可供研究和评论者参考。

### 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重视辩证法。马尔库塞更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石。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主要修正，不在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上，而在于辩证法的基本职能上的变化。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本来是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这里，却被称为“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际上变成了僵化、固定的条例。他说：“这种转变比任何修正都更彻底地破坏了辩证法。”这种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意识形态相适应。这样，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便不再作为革命与实践的研究方法，而是进入既定统治制度的上层建筑，便逐渐地被编纂为一种哲学体系。马尔库塞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越是难以分辨，辩证法本身就越是变成了形式逻辑。

在马尔库塞看来，辩证法从本质上就反对编纂一部教科书，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设想把辩证法发展为一般方法论图式。辩证的逻辑可以称为“自由的逻辑”或“解放的逻辑”。当然，黑格尔设想的自由，最终只是理念的自由。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却是应用于社会历史的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排除非历史的概括。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逻辑，却既不是在黑格尔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也不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的意义上，因而便不再是解放的逻各斯。他们只是从“经典”的分析中提取并图解某些原理，使之与某些“非辩证的”思想相对照。这些原理便列举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它们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某些命题所作的释义，把自然领域的证实看做先于历史的证实。苏联马克思主义既然把辩证法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 worldview，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两大块，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科学和哲学体系的一个特殊分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被编纂为一种意识形态，由党和国家的官方来作权威的解释，为现行政策与实践作论证。

此外，马尔库塞还批评了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实用性特点和对辩证法内容的某些曲解。如夸大阶级斗争而过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性，忽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质变的爆发形式；以及否定之否定的消失；等等。

总之，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重视辩证法，但有不同的思路和视角。正统马克思主义多半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把辩证法看做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把辩证法区分为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的反映，试图建构一个包含辩证法基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的科学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视角转向主体和人自身，认为辩证法只是人类思维或指导实践活动的一种方法，从卢卡奇开始，一般都否认自然辩证法，否认辩证法有几个固定的规律和范畴，反对把辩证法建构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法思想提出种种质疑和批评，是不足为奇的。

总的看来，马尔库塞对俄国革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的分析和批评有其激烈的一面，但基本上是说理的；在批评中有其偏颇的一面，但有些地方也是深刻的。书中某些丰富的史料和犀利的眼光，对我们深入开展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我们应

当以分析、批判和包容的态度看待这部著作，我们充分相信读者的明辨、慎思的能力。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形态。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事业不但在实践上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曲折，而且在理论上经历了重要的探索和演变。怎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过与是非？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原本马克思学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斯大林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当代国际舆论中有着复杂争议的重大问题。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有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利于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在考察问题的角度和许多理论观点上，可以与马尔库塞有原则的区别和分歧，但我们愿意把这个译本奉献给关心和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读者，为其提供一份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文献，引发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论反思。

本书导言和第一部分由张翼星译，第二部分由万俊人译，黄振定对全书作了认真、仔细的校订工作。最后由张翼星通读全书。由于译者学识、文字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张翼星写于2009年11月

2011年7月修改

## 鸣 谢



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是我在1952—1953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别资助下，于1954—1955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俄国研究中心，特别感谢该中心主任威廉·L·兰格（William L. Langer）和副主任马歇尔·D·舒尔曼（Marshall D. Shulman），他们很支持本书的出版，把第二部分的出版权让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L·克兰（George L. Kline），他为这部作品准备了第二部分所用的某些材料；感谢艾尔弗雷德·E·森（Alfred E. Senn）在俄文参考材料方面的援助；感谢阿卡笛·R·L·格兰迪（Arkadii R. L. Gurland）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帮助。

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 Jr.）阅读了手稿，并照例给我提出了他透彻的批评。

索引是莫德·黑兹尔坦（Maud Hazeltine）准备的。

赫伯特·马尔库塞  
布兰代斯大学  
1957年6月



# 目 录



导言 .....	1
----------	---

## 第一部分 政治学原理

1. 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 .....	11
2. 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 .....	23
3. 新的合理性 .....	45
4. 一国社会主义 .....	53
5. 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 .....	58
6. 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 .....	69
7. 辩证法及其变迁 .....	78
8.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91

## 第二部分 伦理学原理

9. 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它们的历史关系 .....	111
10. 苏联伦理学——价值的外在化 .....	120
11. 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	132
12. 伦理学与生产力 .....	142
13. 共产主义道德趋向 .....	148
索引 .....	154

## 导 言



我的这项研究，试图按照一种“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方法，来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倾向，也就是说，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展开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上的各种结论，并依据这些结论重新考察其前提。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及其历史方向，我们的批判使用了它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这种方法包含着双重的假定：

（1）苏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倾向），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Kremlin）为了合理地说明和论证其政策而传播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以各种形式表现了苏联发展的现实。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苏联理论的极其贫乏以至它的不诚实性，与其说败坏了苏联理论的基本意义，不如说其自身便暗示了造成明显的理论残缺的原因。

（2）各种可以看出的客观倾向和趋势在历史上起作用，它们构成历史过程的内在合理性。由于这一假定容易被误解为对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认可，因此这里要作少许的答辩和说明。

对于客观历史“规律”的信念的确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这些规律是理性的表现——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和在物质、精神文化中起作用的一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力量。于是，历史便同时也就是一个逻辑的、目的论的过程，就是说，是意识和自由的实现中的进步（尽管有沉沦和倒退）。因而文明各主要阶段的顺序，便是依次上升到人类的更高形式——量的和质的增长。马克思保留了这种基本概念，同时，又对它进行了决定性的改造：历史的进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得以实现，其进步性不在自由的实现中，而是在自由的先决条件的创立中；它们仍然只是维护阶级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肯定不是理性的表现，而正是它的反面；理性只属于无阶级社会的未来，无阶级社会是为了适应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社

会组织。在黑格尔看来是历史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却还只是史前史。

关于历史规律的假定可以与一切目的论相分离。前者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从一种社会制度导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是由各个社会自身既定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劳动的基本分工和组织决定的，而且政治、文化制度也导源于这种基本分工和组织，并与之相适应。社会生活的多维和多方面，不是各种事实和力量的单纯的总和，而是构成了一种清晰可辨的统一，以致在任何范围内的漫长的发展，都必须从它们与“基础”的关系上去了解。根据这种结构的统一性，便可以把连续的社会制度区分为本质各异的社会形式，而社会的一般发展方向在可以证明的意义上是由它的来源“预先决定的”。要确定一个精确的日期（即使在一个世纪或更长些的时期内）来标明一种社会制度的结束和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开始（比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不可能性表明存在着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潜在趋势。新社会出现在旧社会的机构内部，通过旧结构中的明确变化——这种变化一直累积到本质上不同的结构的出现。在这个链条中，归根结底不是“外部”原因的作用，因为只有在基础已经奠定，例如，当它们“符合”各自社会内部相应的发展，或者符合社会的愿望和需要（像野蛮人入侵削弱了的罗马帝国，像从13世纪到16世纪国际贸易和商业以及地理发现对正在内部起变化的封建社会的影响）时，所有明显的外部因素和事件（如地理发现、入侵、深远力量的影响）才能对社会结构发生作用。

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形式，一旦制度化，就不仅决定了各自社会内部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外部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过程是合理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内部发展的例子是：在西方工业社会的现阶段，由于它对经济的私人调节和政治调节的日益加强（换言之，由于它日益增强的政治性经济和文化），使它显得是前一阶段所盛行的自由企业与自由竞争之“合乎逻辑的”——即固有的——结果。无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说明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方面是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对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利用。外部发展的例子是：在野蛮部落军事组织的冲击下，封建制度从晚期罗马帝国农业经济的基本体制中产生这一事实，也许为固有的历史合理性和不可逆转性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证。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工业文明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看来都可合理地预见到，大型机械化工业的基本制度及其控制下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将会带来与自由主义时期相比具有不可挽回的差别的政治和文

化制度——这种历史趋向，很可能取代西方和苏联制度之间目前某些最显著的差别。

关于客观历史规律的概念的这种简要概括，可以用来表明这种传说的非目的论特点。它不蕴涵目的，不意味着发展运动中的历史有什么“结局”，不暗示任何内在于过程的形而上学的或精神的理性——只有它的制度的决定性。而且，它是一种历史的决定性，也就是说，它绝不是“自动的”。人们与现存的自然、历史条件发生相互作用，在由此自我给定的制度结构内部，发展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进行的，它们是历史的动因，它们的活动是选择和决定。

如果用这种传说来解释苏联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便会有一种限制。苏联社会的这种决定性的趋向，似乎并不能仅仅根据苏联社会的结构来界定，而必须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规定。即使我们极粗略地考察一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在每个发展转折关头，苏联的理论（和苏联的政治）都反映了西方相应的发展，反过来也是这样。这本来似乎是不证自明而又几乎不值一提的，只是因为事实是：人们通常很少研究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估计到它在外交和宣传方面的表现，或仅仅把它当做权宜之计或短期间调整一类来加以了解。然而这种相互作用似乎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反映着两种对立制度之间的一种本质联系，因而它影响的正是苏联社会的结构。这种联系最明显的形式体现在两种制度所共有的技术经济基础（机械化和不断强化的机械化工业）中，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社会组织的主要动力。与这种技术——经济的公分母相对立的是极不相同的制度结构，在西方社会里是私营企业，而在苏联社会那里则是国营企业。那么，共同的技术—经济基础会不会最终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保持自身并超越这两种制度呢？社会制度的不同，会不会继续扩大两种制度对生产力利用的差别呢？（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技术—经济基础自身是“中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它，究竟由谁利用，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极好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决定论”的局限。）这个问题，对于估价国际动态和全球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前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它可以提供某种预备性材料。

西方与苏联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从属于决定性的历史趋势，从属于支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以及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中。从一开始，由于“古典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即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而释放出来的特殊的

国际动因，规定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先锋队学说\*、“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斯大林主义（Stalinism）对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和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的胜利，重工业的持久优先地位，一种压抑的极权主义集中制的继续。严格说来，这些理论乃是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用马克思的术语，“反常的”）发展和重新调整，对因这种调整而导致的西方世界革命可能性下降所作出的反应。这些发展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程度，可以用“共存”这一术语的作用来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共存概念有过很不相同的强调——从短期的策略需要到长远的政治目标。但是，如果没有可以确定的衡量标准，则这种“短期”与“长远”的区分便没有什么意义。而这些标准反过来又以对苏联发展的历史方向的可论证的理论估价为前提条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若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相比较，任何事情都可说是暂时的。在这种语言的范围之外，谈论什么“短期”政策就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可能延续几十年，而且不是由政治波动而是由国际形势的结构所决定的。就此看来，共存也许是当代最独特的特征，即两种对抗形式的工业文明相遇，在同一国际舞台上互相挑战，哪一方也不能强大到足以代替另一方。两种体系的相对弱势，是它们各自结构的特点，因而是一种长远的因素；一种体系的有生力量的完结，就等于这种体系的终结。在西方工业社会里，其弱势来源于日益狭窄的世界市场和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中生产过剩的经常性危险，由于这种危险，人们被迫采取经常性的政治对策，但这些对策又反过来限制了该体系的经济、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苏联体系仍然遭受着生产不足的祸害，它要借助各种军事、政治措施才能与先进的西方世界长期抗衡。这种动态的含义，将在下面几章里探讨。

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来的发展，按其主要的阶段和特征，将作为一种“异常”格局的结果来讨论，在这种格局中，社会主义<sup>[1]</sup>社会的建设，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不如说是与资本主义的共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继者，不如说是它的竞争对手。这并不是说，决定苏联社会基本趋势的政策（比如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是一种无情的必然性。这里是可以选择的，但它们是一种断然的历史选择——是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进行伟大社会斗争的所有阶级面前的“选择”，而不是由苏联领导者任意进行的选择。其结果是在这种斗争中决定的：在欧洲大致是在1923年决定的：苏联领导者虽然为它出过力，但并没有作出这种决定（苏联领导者在那

\* 指列宁关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学说。——译者注

时的作用大概比人们通常所设想的要小得多)。

如果这些见解能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苏联领导者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就无关紧要了;一旦融入到新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目标之中,马克思主义就服从于那超越领导者意向并为操纵者自己所屈从的历史动态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内在的探讨,有助于弄清领导者自身所服从的这种历史动态——不管领导者是如何的自主或极权。因此,在考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的)发源时,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抽象教条的正确性,而是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的倾向,这些倾向也许还可为预见未来的发展提供一把钥匙。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必须作简要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声称是一种本质上崭新的哲学,实际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从意识形态转到现实、从哲学解说转到政治行动来实践这种传统。为此,马克思主义不但重新规定了主要范畴和思维模式,而且重新规定了它们的检验尺度;它们的正确性是由历史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行动决定的。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象化真理的概念,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党性(partisanship)概念,有着理论上的连续性。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运用传统的哲学真理标准来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来,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这种批评,不论怎样有力而扎实,都很容易被这样一种论据所驳倒,即它的概念基础已被进入了历史和理论概念的不同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尺度本身似乎一直完整无缺,因为它一直处于这种论据之外。但如果批评涉及尺度本身,即按照它们自身的主张和内容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发展及其运用,就有可能探究出在它所展示的思想和政治形式下的真实内容。

“从外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评,或者必须把它的那套理论成果当做“宣传”予以抛弃,或者取其表面价值,也就是把它们看做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社会学。我们首先的选择似乎是要弄清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究竟何在?它的特征又是在什么基础上造成的?<sup>[2]</sup>第二种选择则可能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之外的各种哲学和社会学争论,而这些争论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又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按这种方式把《简明哲学辞典》(*Concis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或1950—1951年的逻辑问题讨论等,看做哲学或社会思想史中的事件,那么它们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它们的哲学错误在任何学者看来都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并没有起到对普遍有效的范畴和思想方法加以系统地学术阐述的作用,而只是对它们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定义。<sup>[3]</sup>相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内在的批评,即根本不从它们的表

面价值上看待这些理论，就能够揭露作为它们实际内容的政治意向。我们在此提出的观点是，把批评的重点从引人注目的公开论战，诸如关于亚历山大诺夫论战（Aleksandrov debate），或逻辑和语言学的讨论，转向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趋向，并且只把前者用作例证后者的手段。

内在的批评在这样的设想下进行，即马克思的理论在苏联政策的形成和实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从苏联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运用，可以推论出苏维埃国家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起来的，而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社会的重建，则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列宁主义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意识形态于是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性部分，尽管它只是用作统治和宣传的一种工具。据此理由，把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之前的马克思的理论反复进行比较，就是必要的了。马克思理论的苏联式的“修正”，不应作为马克思的教义学问题来对待。我们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一种标记，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领导者是怎样解释和估价变化着的历史形势，以建立其决策的构架。

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特征。它的大部分理论见解具有一种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意向；这些见解被用来解释、论证、促进并指导为这些见解提供实际“素材”的某些行动和态度。这些行动和态度（比如加速农业集体化、斯达汉诺夫运动、整个地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决定论），都是在苏联领导者应用于变化着的历史形势的、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实质的名义下，被加以合理化和论证的。但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特征，使得它成为我们了解苏联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见解，以它们的实用主义的职能，规定着苏联发展的趋向。

所以，必须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的公开理论形式与其实际的意义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是通过方便的“伊索寓言”式的术语来表达的，因为这一术语只能掩盖而不能指出实际的差别。的确，按苏联的习惯用法，“民主”、“和平”、“自由”等词的含义，与西方世界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它们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苏联的用法还重新规定了专门的马克思的概念的含义。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的概念本身也就被改造了；它们变成了对本世纪上半叶基本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从这种观点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是试图调和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

继承与新的历史形势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形势似乎已使这种学说自身的中心概念，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失效了。因此，作为讨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我们必须限定一下苏联马克思主义由以产生的历史情况和理论形势。我们必须尽量确认历史的发展对马克思分析的突破之处。这是了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本书第一部分旨在分析一些基本概念，由于这些概念，苏联马克思主义呈现为当代历史和社会的一种统一的理论。我们根据其教义式的陈述来讨论这些概念，只是为了在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联系中展开对它们的研究，因为这种联系乃是它们所解释的，并且只有这种联系才使得它们具有意义。我们始终把重点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似乎反映和预期的倾向上。因此第一部分集中于构成苏联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客观因素，第二部分则涉及主观因素，也就是涉及“人的材料”——它被认为是跟随领导并达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目标的。这部分的材料取自苏联伦理哲学。

### 注释

[1] 这里对苏联社会用“社会主义”一词，并不意味着这种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假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意向和目标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社会。

[2] See pp. 39 f below.

[3] See Chapter 5.





苏 联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第一部分

# 政治学原理



# 1. 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



## 最初的概念

马克思理论的辩证—历史结构，意味着它的概念随着这些概念所指向的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方式是，新的内容正是以展开最初概念的内在因素而获得的，因而它保持着理论上的一贯性，以至概念的统一性。这也适合于下述概念，在这一概念中，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它就是关于文明进步与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间达到客观的历史一致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工业无产阶级是完成向文明的更高阶段过渡的唯一社会力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导出上述一致性，从而给予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确定地位，也就是说，一致性本身是“过渡性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只有一种过渡的形式：随着一切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革命也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从而创造一种新的进步动力——自由人的共同体，这种自由人按照全体成员合乎人道的生存的条件来组织他们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仍然暗示了超越历史一致性的另一条道路，即通过两个冲突阶级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使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革命的阶级而行动。这种选择的出现，也许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革命阶级而行动，以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这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预见过的；本来，它们不是构成必定驳倒马克思理论的事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它们一般被解释为客观和主观条件的“不成熟”，并被看做是暂时的倒退，此后革命的倾向会随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长而重新发展起来。但是，无论有没有一次被击败的革命，只要在先进工业国家里，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了一种长远的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趋向，表明了民族和国际的分裂而不是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团结的

趋向，这样一来，情况就十分不同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资本与（雇佣）劳动是互相规定的，或者更具体地说，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终究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方向。所以，如果这种趋向转到了无产阶级的反面，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马克思的范畴就不适用了。一个以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重新确定向社会主义转变和制定这个时期的战略思想的任务。

马克思的辩证法如何把握历史过程中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过程的新阶段是前一阶段之“规定的否定”，就是说，新阶段是由存在于原先阶段的社会结构所规定的。比如，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列特征为前提的：

(1) 高度的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但它不是充分用于创造全体成员的人道生活，因为这种应用与牟利性的私人利用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2) 生产率的增长超出私人支配的限制，这一情况表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体制方面的某些变化（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集中化、私人企业家的自由竞争和管理职能的衰退），以及随后向着公共支配和占有而发展的趋势。

(3) 劳动阶级，作为一种具有阶级意识的力量而行动，追求的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治组织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量的变化日益积聚，直到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冲破现行的结构，代之以另一种有着质的差别的结构。因此，新的历史水平不是一跃之下就可达到的；过渡正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阶段，只有通过这些阶段才能完成这种过渡本身。飞跃是在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中成熟的，但新阶段的最初形式仍然保存着原先阶段发源的胚胎痕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1875）中，对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校正，而正是依据了辩证方法的原理。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要比那些因“调节”时期而被迫发生的联系结合得远为紧密。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形式中，自由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原则，仍然服从于生产力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发展。社会财富（物质的和精神的）必须丰富到足以使社会产品有可能按个人需要进行分配，而不管个人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贡献。用经济技术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在个人需要的自由满足方面还要继续苦干和等待。社会主义的最初形式仍然把劳动者束缚于他限定的

职业范围，仍然“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sup>[1]</sup>，因而仍有合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对抗、发展社会的合理方式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相冲突。整体的利益仍然要求自由的牺牲，为全体的公正仍然包含着不公正。只有当社会化的生产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能为自由而普遍地满足需要，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前提，这种对抗才能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建立中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阶级社会的结构内部已经发生进步，而且私人占有的利益束缚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会使得解放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在时间上会有所间隔。前社会主义阶段所达到的物质的和精力的生产力水平越高，这种时间的间隔就越短，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就会越加短暂。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这段间隔的长短作出推测，这种推测对他们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的变化，即“否定之否定”，乃是随着第一阶段自身的开始而发生的，而且是一种从占支配地位到自我规定的变化。不管这第一阶段会延续多久，也不管它包含着多少压抑，这种压抑都是由“直接生产者”，即由无产阶级构成一个国家而强加于自身的。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社会分配，从而使个人需要和才能的满足将由社会财富生产者的集体决议来规定。不论需要运用什么样的强制手段，都是由被强制者自己来运用的。在这里，没有脱离和凌驾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之上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因为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前的形式作对照的地方，他们总是从构成国家的现实的主体方面，而不是从特殊的制度方面来进行这种对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别的，而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2]</sup>；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sup>[3]</sup>；生产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sup>[4]</sup>；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sup>[5]</sup>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在马克思的概念中，作为整个第一阶段特征的变化，是以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活动为先决条件的。使自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到革命的时刻为止，它曾经一直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如果这个制度已经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如果毁灭和穷困已经十分普遍，那么，按照马克思的预想，无产阶级将把自己组织成为革命的阶级，遵循它的客观历史使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仅仅起着“掘墓人”的作用。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继续成为一种“营业发达的商行”，甚至提高它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那么，无产阶级就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肯定性的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提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sup>[6]</sup>，到1884年，他作出结论：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

己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sup>[7]</sup>。只有实实在经常性的危机才能够使尖锐的阶级斗争得以保持，也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即作为其“绝对的否定”的阶级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说，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无产阶级自身就不得不在“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以它直接的（经济的）利益取代了它的真实的（历史的）利益。这种关系只有阶级斗争本身才能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只有等到无产阶级再度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并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种催化剂。

马克思对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两者的区分，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实践、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区分蕴涵着寓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起源与解决之间的一种历史的冲突。因此冲突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因素。如果社会关系决定意识，那么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如此。如果社会关系是阶级关系，那它们也就引入了现实对人所表现的形式与现实的“本质”两者之间的差别。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乃是马克思的方法的一块基石，不过形而上学的范畴已经变成为社会学的范畴了。在分析资本主义时，马克思把这种差别描述为商品生产的“面纱”（物性化）；他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从“人受他的劳动手段的奴役”中得出这一点。当他把这一观点应用于无产阶级时，虽然它“在现实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但这种客观的现实并不会直接表现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自在的”阶级并不必然就是“自为的”阶级。既然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本质”仅仅是以理论分析来加以规定和证明的一种历史的力量，那么由这种分析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真实利益”，就不是关于无产阶级本身性质的一种抽象的、任意的构造，而是一种理论的表述，尽管它可能没有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什么。

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时，他的概念并不与有关无产阶级的概念相一致，而且大概较之今天的情况更不相符。马克思的学说和它的政治目的是与当代无产阶级，至少是与它的大多数的存在和利益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识到了本质与现象，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他们把这看做是无产阶级历史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相信它会被工人阶级最后政治上的激进化所克服，而这种激进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矛盾加剧的结果。的确，不管无产阶级有何差别，其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之间似乎有一种可证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就表现在劳动者所受的非人遭遇和穷困生活，它似乎成了

抵抗“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抵制革命阶级的分化的一种客观障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正因为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历史作用，所以这种过渡的特殊政治形式是多变的，而不能由理论来加以固定和确立。一旦无产阶级已经把它自己组成为革命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并准备实现它，那么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手段就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得出了。暴力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活动所固有的；阶级意识既不必然地依赖于国内战争，也不必然要使自己在公开的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暴力既不属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也不属于革命的主观条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统治阶级不能也不会免除暴力）。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向社会主义合法、民主地过渡的可能性时<sup>[8]</sup>，这就不光是“政治”了，特别是当工人人数和政治力量不断增长，当工人政党公开宣布强大的革命目标时更是如此。

但当过渡的具体形式呈多样化时，它的阶级基础却不这样。革命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直接的有组织的活动，否则它就根本不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承认任何别的革命动力或任何“代替物”，因为代替只会表明这样一个阶级本身的不成熟性。<sup>[9]</sup>“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sup>[10]</sup>“夺得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的结果。<sup>[11]</sup>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一个“党”，但这个党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自然成长起来的<sup>[12]</sup>；它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

因此马克思的概念主张革命前后历史动力的一致性，而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则一直表现着这种一致性。在阶级意识的程度、“工人贵族”的数量和分量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承认无产阶级内部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损害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唯一执行者的身份。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就是说，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存在了。

## 后来的修改

马克思是通过省略所有具体特征（比如对外贸易、政府干预、“第三种人”），而从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式”得出上述结论的，那些特征并不关系到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过程。在《资本论》（*Capital*）的第2卷和第3卷中，随着马克思分析的深入，又重新引入了这些被略去的特征，并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展开论述其具体的历史现实；理论的模式在其与历史现实的本



关系中重新铸造。现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的现实中发展着与其固有矛盾相反的趋向，比如，资本输出（经济的和政治的）、垄断、政府干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部分，即广大的农民阶级，也几乎未予注意，这个部分在现实中证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在后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中，相反的趋向和“否定的”因素成了问题的焦点。

对于“相反趋向”的讨论，进入了马克思学说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中心。这些理论（包括从“修正主义”到正统的列宁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解释）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现成社会的继续保持活力，特别是与先进工业国家中工人阶级生活水准提高的事实相一致——这些事实看来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即将发生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概念相矛盾。虽然在解释上有很大差别，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一致认为，在大约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据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自由竞争向有组织的竞争的转变，国家和国际的卡特尔、托拉斯和其他的垄断组织占据统治地位，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政府与商业的融合，以及对“非资本主义”和弱小资本主义地区实行扩张主义的经济政策（比如，加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剥削）。然而，在对这种发展的估价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却不可调和地被划分为“改良主义的”和“正统的”两个阵营。前者的学说出现在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900—1901 年的著作中<sup>[13]</sup>而在经济民主（Wirtschaftsdemokratie）的理论中达到顶峰<sup>[14]</sup>，这一派主张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部，无产阶级能够继续改善它的经济、政治地位，并通过有组织的劳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用合法和民主的手段最后建立社会主义。与此截然不同，以列宁为极端代表的正统的解释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脆弱的暂时的稳定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政权间的武装冲突和日益尖锐的经济危机而被突破。列宁说明，无产阶级中的改良主义倾向，产生于少量的“工人贵族”，这些人是现存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由于获得从垄断超额利润中支付的高薪而堕落了。

这里我们只谈谈列宁主义的解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而出现的列宁主义，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1）试图把农民纳入马克思的理论策略的轨道；（2）试图重新确定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和革命发展的前景。列宁主义思想的两条主要线索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先进资本主义存在着活力（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未预料的），因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改良主义的继续加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转向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里占优势的是农业，其资本主义成分的薄弱看来又为革命提

供了较好的机会。诚然，资本主义链条必须在它的“薄弱环节”上突破的思想——斯大林在革命后也强调的思想——起源于托洛茨基（Trotsky）而不是起源于列宁，但列宁主义思想的整个倾向一开始就是以此为指导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而不是工人的革命，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不仅因为革命正好在俄国成功了，而且因为在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看来在隐退。从长远看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就以列宁对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状况的分析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潜力和无产阶级地位的变化。事实上，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是整个列宁主义发展的特征，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虽然列宁在他的活动开始时，是按照新的形势来重新确定他的党的革命策略，但他的理论概念并没有跟上形势。列宁坚持革命无产阶级的经典概念，虽有工人贵族和先锋队的学说帮助支撑，但一开始就显露出它的不合适性。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点就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无产阶级的“通敌者”部分，在量和质上都不同于已被垄断资本收买的少数上等阶层，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与其说是“叛徒”，毋宁说他们的政策颇为确切地反映了先进工业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事实上，列宁借以表明无产阶级概念的革命先锋队的策略，已远不只是经典的马克思的概念的一种重新阐释；他的反对“经济主义”和群众活动自发论的斗争，他的关于阶级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名言，预示了后来事实上无产阶级由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了革命过程的客体。的确，列宁的从中可以找到这些思想的经典表述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sup>[15]</sup>一书是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一个落后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写的，但它的含义远远超过了这一背景。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一开头，就宣布了它的最终攻击目标，即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兴起的改良主义阵营。列宁认为代表人物是伯恩施坦和米勒兰（Millerand），因为他们要求一种“从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断然转变”。此外，“阶级意识从外部灌输”的说法，不是源于俄国的现状，而是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他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论战中提出的。<sup>[16]</sup>列宁的目标越出了特殊的俄国形势的紧急状况，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的国际性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反映出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趋向“阶级合作”的势态。这种倾向的增长，威胁着要败坏整个马克思主义战略所依据的把无产阶级当做革命主体的概念。列宁的系统阐述，意在从

改良主义的冲击中挽救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这些阐述很快便构成了一种学说，这一学说不再像“工人贵族”概念那样设想无产阶级与进步之间具有历史的一致。这是为列宁主义的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部分，这个党把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真实意识交付于不同于无产阶级大多数的一个集团。集中主义的体制，起初是依据并应用于落后条件的“不成熟性”的，后来便成了国际范围内的一般策略原则。

作为无产阶级真实代表的列宁主义党（或党的领导）的建设，不能越过新策略与旧的理论概念之间的鸿沟。列宁的先锋队策略实际上承认了它在理论上所否定的东西，就是说，承认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基本变化。

鲁道夫·希法亭在他于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sup>[17]</sup>，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解释了这种变化。他指出，在金融资本的领导下，整个国民经济会被动员起来进行扩张，而这种扩张，通过大型垄断和半垄断企业的相互勾结，会趋向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大规模的国际融合。在这种新的洲际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拥有最强大资本主义股权的卡特尔所控制和管辖。在这种“总的卡特尔”的庞大统治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统治集团的利益能得到保证，在此统治范围内劳动者工资的高水平也能得到维持，以对统治范围之外的市场和居民强化剥削为代价。希法亭认为，这种国际资本主义的计划，要求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取消民主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将被一种侵略的军事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所取代。卡尔·考茨基随后在他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sup>[18]</sup>

对于这些发展，希法亭和考茨基都只是作为趋向来描述的，其实现究竟要多长时间则谁也没有拿准。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现状的变化，这两位作者也没有作出充分的结论。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得以稳定和实现等级化统一的经济、政治条件，是有所概述的——这些条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还显得虚无缥缈，除非现实的力量会取代发展了的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旦这些条件成为实实在在的了，统一的经济基础就的确会出现。它确实出现了，十分缓慢地出现了，而且是在两次世界战争、原子弹的生产和共产党政权发展的影响下，伴随着许多倒退和挫折出现的。这些事件改变了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基础。<sup>[19]</sup>这种基础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有效的利用。从那以后，西方国家之间对立的竞争势力逐渐地结合起来，并被东、西方之间的根本冲突所代替，因而形成了一种洲际的政治的经济——在规模上比以前自由

的世界市场小得多，但容易对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马克思主义曾把无政府状态看做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同时，劳动者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分裂为（用汤因比的术语）内部的和外部的无产阶级，后者包括那些（城市的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们生活在战后重建颇有成效的地区内外，但在那里却得不到较高的工资、较好的生活条件或发挥较大的政治影响。

外部的无产阶级（按它最广泛的部分说，包括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苏联领导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一种群众基础。它作为一种历史的“主体”而出现，看来是由于（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一种外在的原因，就是说，由于革命是在落后的俄国获得成功，而没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事实，随后又是从俄国扩展到前工业地区，而先进的工业国家却一直不受影响。但这一事件并不完全是外在的。西方社会一些重要地区逐渐形成的“免疫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开始显示它的有效性；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那时还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组织——的民族主义态度只是这种免疫力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后来这种免疫力又在1918—1923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表明了它的力量，那时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在与资产阶级和军队的联盟中，击败了共产党的冲击。在英国，改良主义的工党的优势从来没受过严重的干扰。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一直远远地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德国是战败后走向强有力的复活的唯一国家，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很快就向法西斯政权屈服了。先进工业国家革命潜力持久的弱势，使革命限于那些无产阶级还未受影响、统治集团已伴随着经济落后而显出政治上的崩溃的地区。

马克思的学说对属于免疫过程的经济根源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解释为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为对付工资水平提高的压力而实行的产业工人的有效组织，而且是由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的垄断超额利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一刻也不能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工人阶级的利益被指望通过周期性的战争和危机来抹杀掉，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固并没有基础。这种解释并未规定实现这样一种国际基础的可能性（很快便成了事实）。在这种基础上，西方工业社会创造了它的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灾难性的暴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文化的破坏程度，以及同样前所未有的技术生产率的增长（这是1918年以后时期的特点），都适合于这项任务的完成。受到挑战并必须作为反对竞争的文明重新肯定的，正是现存的文明结构。在这场斗争中，技术和政治潜力的发展很快就显示出，小型的调

整不足以应付这种挑战。为着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总体动员的需要，就必须取消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放任自由，实行政治过程的有条不紊的控制，以及在实际的经济权力的等级制度下实行国家的重新组合——以牺牲宝贵的传统主权为代价。整个西方社会作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利益冲淡了民族和阶级的利益：民族的政党与国际的经济、政治力量结成了联盟。工人也不例外，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也成为西方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共产主义则成了东方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比这时更接近于成为一种“总的卡特尔”，成为令人生畏的幽灵——这种卡特尔通过超帝国主义的计划，会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无政府状态。而正是苏维埃制度的进步，促进了这种令人生畏的可能性的实现。

### 注释

[1]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9-1950), II,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 *Ibid.*, p. 57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 Marx, *Capital*, I, chap. I, Sect.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Engels, “Anti-Dühring,” in *A Handbook of Marxism*, ed. by E. Bur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 29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 Engels,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2), p. 158. “国家消亡”问题将在下面讨论，参见 pp. 102 f. below.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 Letter to Marx, October 7, 1858, in Marx and Engels,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A Selection with Commentary and Not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p. 115-116; see also his letter to Kautsky, September 12, 1882, in *ibid.*, pp. 399-4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 *Origin of the Family*, p. 15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这个思想后来在列宁主义关于“工人贵族”成长的学说中得到重新解释，see below, pp. 41 f. 参见 E. R.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s. ; London, Macmillan, 1953), III, 182.

[8] 这里涉及以下的论述：马克思 1872 年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的演说，引自 Iu. M. Steklov,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8), p. 240; Marx, “Konspekt der Debatten über das Sozialistengesetz” (写于 1878 年), in Marx and Engels, *Briefe an A. Bebel, W. Liebknecht, K. Kautsky, und Andere* (Moscow, 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SSR, 1933), p. 516; Engels, “Introduction to Marx’s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I, 109-127; Engels,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Draft Program*, 1891, Sect. II。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2 卷，27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蕴涵着某种“代表”形式，因为如果没有组织和职能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考虑由无产阶级自身所构成的代表，即由“直接生产者”直接委托，对“直接生产者”直接负责的代表。如果阶级的“意识”是“不成熟”的或者受到腐蚀，代表阶级的领导者能帮助它成熟，但不能把它引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说来，领导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领导。

[10]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 14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 卷，1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 Marx, Letter to F. Bolte, November 23, 1871,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II, 4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3 卷，33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又见 *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 Phil. Becker, Jos. Dietzg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ed. by F. A. Sorge (Stuttgart, Dietz, 1906), p. 42。

[12] Marx, Letter to Freiligrath, in F. Mehring, *Freiligrath und Marx in ihrem Briefwechsel* (Ergänzungshefte zur Neuen Zeit, N. 12; Stuttgart, Dietz, 1912), p. 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0 卷，48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 参见 Eduard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A Criticism and Affirmation*, trans. by Edith C. Harvey (New York, Huebsch, 1909)。

[14] 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于 1927 年在基尔 (Kiel) 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会议上系统地提出，又见 Fritz Naphtali, *Wirtschaftsdemokratie*, published by the Germ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 Berlin, 1928。

[15] Lenin, *Chto delat'?* (*What Is to Be Done?*), 初版于 1902 年。

[16] 参见 *What Is to Be Do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9), p. 40.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6 卷，3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7]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Marx Studien III; 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10)。希法亭的术语不只是指明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指明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他确认了 (a) 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扬弃” (Aufhebung)，和 (b)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

本”更密切的融合这两种基本因素。

[18] Kautsky, “Der Imperialismus,” *Die Neue Zeit*, XXXIII, 2, No. 21 (September 11, 1914), 921.

[19] 苏联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如果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确必须坚持——这些事件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持久的战争经济”，作为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唯一出路，导致了原子弹的生产，原子弹的生产又加强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按照这种概念，这些导致西方世界转变的事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动力，而且是有助于战争的力量，同时也是有助于生产的进步和“暂时的”稳定的力量。

## 2. 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



### 列宁主义遗产

把上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的分析与苏联的官方言论比较一下，表明后者并不明确地承认这些前提。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学说一样，多次断然否认了西方世界的长期国际融合的可能性。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重新调整，在明确反对“资本主义绝对停滞论”和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收缩的命题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加剧”的概念。<sup>[1]</sup>苏联马克思主义同样断然否认了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结构伴随的变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概念成了苏联理论的一块柱石。然而，苏联势力范围内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政策，是以作为当前时期特征的结构变化，以西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衰退为基础的。这种二向性提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言的客观真实性问题——它是苏联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提到，“伊索的语言”被系统地应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自身内部，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广大听众和通信交往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继续使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指称显然与这些概念相矛盾的形势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当做仅仅是一种“宣传”而不予理会，似乎是很恰当的。但这是一种骗人的解决方式，因为“宣传”与“真理”之间的区分，是设想了一种可论证的“真理”而使宣传能与之相对照。如果坚持认为真理只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中，而不是表现在它的理论中，认为理论只是用作控制群众的思想支柱，那么这种论点是需要证明的。由于苏联统治者自身制造的困难，这种论点绝不是自明的，因为他们费尽心机地不断教导和发布本来与现实并不协调的马克思的思想。实际情况是，不管它的“水平”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说一直是苏联政权主要努力的一个方



面，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也一直存在。

但是，如果把苏联的整套理论斥之为宣传是不恰当的，因此保留其部分的真理，那么把其他归为“巧立名目”的做法也同样不合适。如果从苏联的理论和策略的多种变化中，我们能够发现某些保持经久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那我们就有这种选留的标准，否则就不好办了。若有了标准，就有可能确认其“基本因素”，并从这些因素引申出“修正”与“否定”，从而获得与实践相联系的整套理论原则。下面的探讨遵循的正是这种方法。

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而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简要地概括一下列宁主义与随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就足以弄清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在前面提到，形成着的列宁主义的独特的特点，就是革命动力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的党，并强调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作用，因为它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持续力量冲击下得到了发展。这一起初是针对俄国无产阶级“不成熟性”而提出的概念，面对先进工业国家“成熟的”无产阶级继续采取的改良主义态度，变成了一种国际的策略原则。为了对付大部分有组织的劳动者融合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就由党独占了革命战略的“主观因素”，党呈现为指导无产阶级的一种职业革命组织的特征。

列宁主义的概念，可以作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真实”利益（和意识）所作出的区分的一种发展。其发展的主要阶段是：（a）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个别无产阶级的愿望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他个人的状况得到直接的和不断的改善。（b）为了达到这种改善，工会的“经济主义”政策是认可无产阶级的被剥削阶级的地位，从而认可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在为“阶级和平”提供基础的范围内，对社会结构作某些变动。（c）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偏离了它作为革命阶级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放自身的客观历史地位。（d）只有使直接的主观的利益服从阶级的真实利益，使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无产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才能得到“挽救”。这个任务就是列宁主义党的职能。既然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经济斗争本身从来只能取得短暂的改善，所以资本主义过程通过周期性的萧条和危机将调整平衡，并导致无产阶级的激进化，从而重建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真实利益的一致。

但是，当过程（c）影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时，会

发生什么情况呢？马克思的学说是不是因此就失去了它的实现所必需的群众基础呢？而且，是不是理论若不通过重新规定现实来重新规定自己，它们间的联系也就丧失了呢？这些问题看来已经促使列宁主义学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重新的估价，这一估价便成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理论基础。

这种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论，一开始就表现为是由工业社会的新阶段所限定和决定的。列宁的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起初只是一种对现实形势的表述，但由此作出的推论却正好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紧接着写道，所以，“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sup>[2]</sup>。这个结论清楚地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而更多的落后国家将落在后面。一年以后，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胜，而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sup>[3]</sup>国家。

列宁保留了马克思的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充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爆发的结果，甚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也没有使他放弃这一信念。众所周知，他在承认这场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上是迟疑不决的，尽管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被一种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议会制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所超越。迟至1919年3月，他仍把十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sup>[4]</sup>。接着他补充说，只有在1918年夏天，农村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开始。他还坚持认为，俄国革命必须得到德国革命的援救。

但是，正是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这种尝试性和初步性的信念，引导他形成了显然是斯大林主义政策的预兆的理论。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或者至少以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成就，即一种高度的工业化，高度的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的、熟练的、有纪律的工人力量为前提。这种顺序中的有些阶段也许可以“跳过”（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迟疑不决的）<sup>[5]</sup>，但是，没有完全工业化和合理化的经济，就不能有社会主义，不能按照个人的需要和能力进行社会生产的分配。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工业化应该优先于社会化，也就是说，优先于按照个人的需要进行生产和分配。在1918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在与预见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列宁宣称：



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sup>[6]</sup>

一个月后，他引证 1917 年 9 月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直接先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接着他说，“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sup>[7]</sup>

这些论述的含义一直给弄模糊了，原因是由于 1918 年的德国革命像是解开了成熟国家禁锢革命的锁链，使它们将重新走上国际革命的“正统”道路。苏维埃国家不仅会得到工业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保护”，而且会分享到它的物质和技术财富，从而保证和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共产国际和它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以及列宁在革命最初几年的演说中所曾读到的德国发展方向看，几乎是令人绝望的。但是，大约从 1920 年以后，苏联的政策却是从德国革命的失败作出的推论。鉴于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两者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中心地位，德国革命的失败——联系到在西方世界的重建中美国领导地位的壮大——看来造成了重新估价国际发展的必要性。如果资本主义的潜力确实将长期胜于革命的潜力，如果连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不能打破改良主义对“成熟无产阶级”的控制，那么，革命的历史动力就不仅是发生了地理区域上的变化，而且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变化。如果存在着真正的“资本主义稳定”的话，那么苏维埃国家不仅将长期与强大得多的资本主义世界“共处”，而且它还必须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兴起的革命运动看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的“储备”。不仅国际性的策略，而且苏联社会内的社会主义结构，都必须重新确定。

列宁在《真理报》（*Pravda*）上发表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Better Fewer, But Better*）（1923 年 3 月），用几句精辟的陈述综合了对国际发展的传统的和新的估价。这些陈述集中的论点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不

是在“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继续说道：它们“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sup>[8]</sup>。帝国主义对被征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列宁的上下文中，特别指德国）的剥削，是如何改变“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的完成呢？列宁的文章提出了几种回答：（a）通过把资本主义中心从中欧转向西欧，最后转向美国<sup>[9]</sup>；（b）通过迅速把“俄国、印度、中国等等”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c）同时，通过加速东方的（以及被征服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列宁的命题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对战败国家和东方的“新的剥削”），另一方面，指出了“东方”革命可能性的增长（“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些理论所呈现的困难，因列宁的这种论述而有所扩大，“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sup>[10]</sup>，所谓“不利”，只能解释为，由于对被征服国家的剥削，“连同”对整个东方的剥削，并由于帝国主义战胜国中工人阶级的合作，资本主义的新的力量得到了自然的增长。列宁强调：“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sup>[11]</sup>

这种说法接近于希法亭关于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内联合劳动与资本，建立一种有力的民族利益的概念。但是，相反，列宁的分析却被用作苏联政策的“指导”，这种指导是以期待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而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这里，列宁论述的模糊性，再一次引人注目。他提出了如何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即将发生的冲突中挽救“我们自己”的问题，因而包含着典型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营垒对峙的原则。但他又立即回答说，希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sup>[12]</sup>，而没有讨论前一冲突（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可以“抵消”或“推迟”帝国主义营垒内部的冲突。他宣称，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绝对有保证的”。因为“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正在迅速“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使列宁感兴趣的，不在于最后结果，而在于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他主张苏维埃政权要“保证我们能存在”，直到这种冲突爆发，这就必须

使东方“能赶得上建立文明”，因而就必须“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sup>[13]</sup>

列宁的分析包含着旧的和新的形势因素，但他没有使这两方面一致起来：“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和这个营垒与苏维埃国家“就要发生的冲突”同时并举。列宁从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把两种矛盾作了等量齐观。

(1)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苏维埃国家的幸存最终依靠它们。苏维埃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以便获得和保持一种长期的“喘息”。因此，列宁于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sup>[14]</sup>。

(2) 资本主义世界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矛盾。战胜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暂时稳定与“阶级和平”，使革命的可能性从这些国家向“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转移。这种转移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变化——它还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一种新动力的出现。列宁仅仅从“俄国、印度、中国等等”的人口上指出这种动力。这种指出的含糊性是很典型的：列宁既没有引入过会改变马克思的学说结构的新的理论概念，也没有详细说明过阶级斗争新的国际特征的概念。但是，他的政策导向是清楚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决定性的东西；为了苏联工业化这一主要任务的完成，必须对这些矛盾加以利用。

苏联马克思主义遵循了列宁的双重指导：它的主要理论作用，是使这两种矛盾互相关联起来，以作政策的基础，并且规定它们的相对分量。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自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到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形势分析的多次转变和多种变形，但我们将试图证明，在这整个时期里，苏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概念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的确，共产党的策略连续发生过左右摇摆的曲折变化，但迟至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这些变化只是些短命的战术尝试，显得与根本的概念和战略截然不同，并经常发生冲突。为了澄清这种战术手段与基本概念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开始试图找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贯穿于多种转变中保持不变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做构

成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进一步划分，看来只是代表一个相同的基本趋向发展中的某些阶段。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的主要特征如下<sup>[15]</sup>：

(1) 垄断资本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的残存因素。

(2) 以持久的（可能的或现实的）战争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范围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伴以成长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

(3)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较弱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较强的被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制伏，因而创造了大规模的洲际“剥削”区。

(4) 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全部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的总动员。

(5) 民主过程、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自由和人道主义思想的限制或彻底消灭。

(6) 通过强制和“腐化”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革命的可能性被遏制。

(7) 全球在社会政治上划分为“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阵营。

在说明这种解释之前，必须回答三个问题：（1）鉴于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法西斯主义和西方民主派、“庄严的同盟”和“冷战”，有着明显的困难，苏联马克思主义如何论证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时期具有一种基本趋向的设想？（2）资本主义制度内成功地遏制革命力量的概念，如何与共产党的战略中经常发生的“左”倾和过分冒险相一致？（3）它又如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引人注目的成长相一致？

对于第一个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是把法西斯主义看做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就是说，看做“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分子的公开的和恐怖的专政”<sup>[16]</sup>。这种专政是试图通过加剧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的剥削，“对弱小民族的奴役”，以及准备和实行对苏联的报复性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提法包含了随后适用于“英美的或美国的帝国主义”的全部主要特征。这种转换包含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第3点中：在最强的经济大国的最高统治下，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等级体制，它必然要牺牲传统的主权和民主特许权。德国法西斯主义霸权的经济基础太狭小了。这种“反常”现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纠正过来了，这场战争按照实际的经济力量，也就是根据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调整了国际间的平衡，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因而法西斯主义和它的失败，表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改组中一个“合逻辑的”步骤。

但是，如果反对苏联的斗争是这种改组的必要因素之一（见第4点）的

话，那么，人们又如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资本主义的西方与苏联之间的联盟呢？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回答：（a）西方国家为打败德国法西斯需要苏联的援助；（b）即使在联盟期间，西方国家反对苏联的斗争也仍在继续（举例来说，开辟第二战线的延误、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西方国家所谓与德国取得单方面和平的努力）。

至于第2和第3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就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剧的革命形势（“第一时期”），随着就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第二时期”）。斯大林于1925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第一次政治报告中，根据“资本主义的稳定”分析了国际形势。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sup>[17]</sup>，三年后，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宣布了“第三时期”的到来。共产党被引向左派激进主义。面对坚决的武装抵抗的群众性示威，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劳动党和工会的损失惨重的斗争，与极右势力的联盟，在中国宣布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都是“左”倾的表现，它似乎能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找到它经济上的理由。1932年，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再次宣布“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以及战争与革命的新周期的开始。“第三时期”据说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掀起革命高潮”和“经济危机尖锐化”<sup>[18]</sup>为特征的。这或许就是共产国际在一战后欧洲革命失败后极端“左”倾的表现，库西宁（Kuusinen）在对全体会议所作的国际形势报告中宣称，一切努力都应当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新时期夺取政权的斗争作准备”<sup>[19]</sup>。但是，其战略方向似乎是以对资本主义形势完全不同的估计为前提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库西宁报告的文件与报告本身相反，主要采取了一种防守性的调子。虽然保留了库西宁报告中“掀起革命高潮”的术语，但会议的主题是号召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sup>[20]</sup>，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号召开展“以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sup>[21]</sup>阶级斗争，号召在“适当的条件具备”<sup>[22]</sup>时开展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最后它一般性地告诫共产党“沿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航道”指导运动。

因此，我们设想，斯大林主义的战略包含着在某些重要的欧洲国家革命失败后对西方世界的革命力量进行有效的牵制，即令是最“左”倾的共产国际纲领，也与这种设想没有矛盾。随后在1935年形成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通过向共产党提交了一个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构内的“最低纲领”，进一步承认了西方革命潜力的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形势又一次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尽管发

布的各种宣言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稳定”的设想下起作用的。那时,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拥有的大众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而且他们的武装力量第一次似乎已足以进行夺取政权的尝试。然而,在少数分散的、不协调的地方起义之后,共产党人实行了一种合作政策,放弃了他们的军事组织,坚持了一种“最低纲领”,即使在随后的政治大罢工时期,也没有把革命作为直接的目标。这种战略可以用它的“群众基础”的薄弱来说明。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蔑视马克思的革命战略的传统概念的形势;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同盟国的军队,与合法的民族偶然事件一起,摆在了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面前,这毋庸置疑地象征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新形势甚至在同盟军撤出后依然存在:“阶级敌人”不再能够在巴黎、里昂或图卢兹,在米兰、都灵或博洛尼亚的“街垒上”被击败。现在它的中心位置在华盛顿和纽约,在同盟国的司令部和委员会。比起苏联对于国外共产党的专政来,在一种远为客观的意义上,国内战争已成为一种国际、洲际政策的问题。战争结束时,在国际事务的格局中,一切机会都由西方同盟国,特别是美国控制着。不错,在西方军队迅速遣散之后,苏联军队本来可以横行于欧洲大陆。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毕竟对苏联的决策有所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就是,它影响了斯大林,使他不至于想象,由一个备遭破坏、疲惫不堪的俄国反对实际上未受损害而在世上具有最强经济力量的国家,通过在欧洲的一种闪电性袭击,就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到失败。而且斯大林,由于他的理论仍然坚持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的传统概念,因而对战后立即重新宣布反对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联合阵线”态度的急变(丘吉尔在密苏里的富尔敦的演说,1946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英美在鲁尔的谈判,1947年),完全感到吃惊。

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他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和通常被认为与日丹诺夫(Zhdanov)有关的1947—1948年的挑衅性战略。这种理论最接近于公开承认国际资本主义的统一<sup>[23]</sup>,因而也就最接近于抛弃关于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传统概念,虽然这种理论实际上并不承认这两点。因为“两个阵营”的理论把西方无产阶级包括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之内,并且重申内部和外部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大约同时,瓦加(Varga)对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稳定化和“生产性”功能的过于谨慎的承认,遭到了粗暴的批驳。斯大林主义的对外政策,遵循着“两个阵营”的基本观点,即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阵营之间的矛盾,眼下已经取代了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共产党的统治



是封闭而又扩张的；内部透不过气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1947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突然袭击，退出对德国的“同盟控制委员会”，柏林的封锁，与铁托关系的破裂，1948年）。但是，早在1948—1949年，不妥协的共产党的战略在西方正逐渐消失（法国和意大利政治罢工的失败和放弃），而代之以新的“联合阵线”政策，而且从此就一直在保持并推进这种政策。在东方，则有着不同的进程：印度党坚持极左战略，直到1950年；印度支那的军事事件仍在增多；朝鲜战争正是开始于西方党处于防守之时。在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西方与东方的政策从来没有卓有成效地互相配合；自中国革命初期受斯大林主义“指导”而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起，斯大林主义像是追随而不是指导“殖民地革命”的力量。在那里，新的革命的历史动力似乎是“自然”成熟的，而已由列宁引入革命战略的农民群众，却好像是完成了他们的职责。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则仍然是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这一概念上。危机本身被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阶段，生产力的社会性与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和私人利用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之前的最后阶段。关于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都由这种冲突来说明。<sup>[24]</sup>

“总危机”包括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又被分为两个主要阶段。<sup>[25]</sup>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是危机的尖锐化时期。危机是因苏维埃国家的出现而发生，因它随后的成长而加剧。危机的具体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极端萎缩，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平行而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建立。前者缩小，而后者没有萧条和混乱，稳步地增长。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以及几乎是整个东欧的市场，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此外，资本主义不仅失去了以前占有的很大一部分销售市场，而且失去了以前拥有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日益狭窄的基础上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因而榨取和实现利润的困难（由于资本的“较高的有机构成”——从总资本来说，也就是由于不变资本部分的增长和工资部分的减少，这些困难已经大大地严重化了）增加了，并迫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集团进入瓜分大大缩小了的市场的残酷斗争。这就反过来加重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冲突。在后期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市场的斗争，采取了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较弱者的形式，导致了美帝国主义的最高霸权。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在1915年指出的那种趋向

已经到了它的顶点\*。经济的军事化，帝国主义的“经典”特征，变成了事情的“正常”状态。战争经济，一方面服从于头号资本家的垄断超额利润，同时，即使在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压低了消费品生产的水平，把大量的资本主义投资引向了直接的和间接的战争工业，并因而增加了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的不平衡性。这种危机所影响的正是这种制度的再生产。

按照上述的解释，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发动了一种连锁反应，它通过加剧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sup>[26]</sup>。这就是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1930年）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1956年）时作出的理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内部固有的，与一切现象相反，它们再次表现为决定性的东西。苏联马克思主义一贯否认，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结合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阵营，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超帝国主义”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论调一再遭到强硬的反驳<sup>[27]</sup>——像40年前的情况一样。美国垄断资本家要建立一种美国的“世界托拉斯”（world trust）的企图是失败了。尽管有各种结合，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竞争的冲突仍然在尖锐化；“被征服的”国家设置障碍，并努力夺回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原有地位；联邦德国和日本作为最危险的竞争者重新出现。<sup>[28]</sup>马克思所说的决定历史事件进程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导致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和爆发，导致了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军事冲突，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接近它的最后崩溃”<sup>[29]</sup>。

人们通常会警告说，不要把形势解释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即将瓦解。因此，特拉克坦伯格（Trakhtenberg）说，虽然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出路”日益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找到出路就“绝对不可能”，也不意味着延缓危机就“绝对不可能”。他指出，当前在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正盛行着军事经济的急剧膨胀，但他的结论却重申，在资本主义“复苏”的表面下，经济危机的溃散力量仍在继续增长。<sup>[30]</sup>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尖锐化的论点，究竟如何才能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供决定性的方向，这一点是难以弄清的。这一论点被人们重复了30多年，但它显然与事实相矛盾。看来这一论点如此的似是而非，以至于人们容易把它当做宣传而不屑一顾。然而，实际上它又是一个关系到政策制定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资本主义“总危机”（与周期性的“萧条”相区别）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按“经典的”、“正常的”方式发挥作用。

\* 指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趋向。——译者注

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不能再容忍相对自由的企业和相对自由的竞争，让经济规律自己表现为自由的，即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的状态。“帝国主义”的到来，结束了资本主义的“经典”时期，开始了它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只有通过扩大具有垄断性管辖和统治的国家控制，进行战争或战争准备，以及“加强剥削”，才能继续发挥它的职能。“总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的即将到来和一种革命的形势，而是历史发展的一整个阶段。它意味着在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它根本不排除“稳定”，相反包含着把稳定看做正是它的本质的意思。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形势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共存和平行（不是像马克思的学说所设想的，那是说社会主义必然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而产生）。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1925年的任务所通过的文件，谈到了“两种稳定”：“与资产阶级欧洲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稳定一起发生的，是苏联国家工业的毋庸置疑的增长和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加强。”<sup>[31]</sup>这些文件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稳定”，按照苏联的理论，已经被另一些（甚至是更持久的）部分稳定的形式（持久的战争经济和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所超越，但仍然保持着平行以及与之相应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反常”，只要这种平行还存在，它就可能是苏联决定政策方向的基本因素。而且，在这个方面，“共存”不仅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而且是一种理论的陈述。这种陈述出现于列宁最后的政治指导中，出现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sup>[32]</sup>，而且从此没有被丢弃过。甚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与相应地执行不妥协的“僵硬”的对外政策的时期，日丹诺夫也宣称：“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长期共存的事实出发的。由此可见，苏联与其他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只要相互交流的原则得以遵守。而且义务一旦为双方承担，就会受到尊重。”<sup>[33]</sup>共存使得避免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成了目的（用苏联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和平政策”），这一目的必须处于政府整个对外政策的中心，并且必须“决定它的全部基本步骤”<sup>[34]</sup>——这不是由于苏联领导者的什么天生的爱好和平的心理，而是由于这样一种冲突会“延缓”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会打破列宁所断言为苏维埃国家生存的前提的“喘息”。正如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标志着历史发展的一整个历史时期，“喘息”亦然：它包括不少于实现把落后东方的文明提高到先进工业国家水平所要求的时间。要是这个目标达到了，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就会达到：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的开始，也会引起西方世界革命力量的复活。

在这种分析（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列宁和布哈林的理论著作，就可知道这是极为粗糙和表面的分析）的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自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发生了若干更改和修正。起初只是表现为强调方面的不同，这是微不足道的变动，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概念。但是，从斯大林生活的最后时期和他死后苏联的发展来看，这些变更却显出了较为重要的意义，即它们预示了苏联政策中一种长期转变的可能性。这方面的作用，我们将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一章中讨论，这里只作一种初步的陈述。

这些变更首先涉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西方世界与苏联阵营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在总的趋势上是针对东西方冲突实际上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的情况。后来，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转变就显而易见了。它首先是由斯大林关于一次理论论战的声明宣布的：他责令党和它的发言人必须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看做决定性的东西。<sup>[35]</sup>“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比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更大，然而“实际上”，后者超过了前者。这种理论与现实互相贬抑的对照，在此竟被用来告诫人们把二者统一起来。的确，在斯大林的论述之后，随着就有对国际形势的重新考察和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这在斯大林死后变得更为明显了。斯大林的论述提出，要强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正常”活动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困难的依靠，而不是依靠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地位的冲击。<sup>[36]</sup>

第二种变更是有关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估价，特别是有关对现时代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增强的估价。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否能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一问题，在战后的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瓦加出版于1946年的著作，之所以受到批驳，是由于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他强调出现于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和组织作用的概念，似乎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性，关于通过集中计划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质的不可能性的命题。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过错，而且他对于否认资本主义稳定长期有效的革命战略的理论基础，具有削弱的危险。为了维护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化及其在资本主义“战争经济”中的作用起了变化的命题，瓦加引证了列宁的论述，即“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up>[37]</sup>，认为这提出了帝国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新阶段已经不能再用以前阶段的那些不可侵犯的术语来解释了。尽管事实上在随后对瓦加著作的讨论中，这种转变被承认了<sup>[38]</sup>，但他的观点却受到了批驳。

得到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而不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sup>[39]</sup>然而，近来的一些文章<sup>[40]</sup>，无保留地谈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且十分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积极的经济作用——大多是在瓦加以前受到谴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意义上论述的。而且，这种强调的角度似乎也没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因为同样的一些文章，都是按照传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一律地强调垄断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及其内外经济的加剧紧张，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超帝国主义”统一的可能性一如既往地受到极大的嘲笑，资本主义的统一性被描绘为在缩小了的世界市场上渗透着剧烈的竞争冲突。但是，斯大林主义理论的这些陈词滥调，现在却出现于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纲领性的再评价中。对斯大林最后的文章中最集中宣传的命题之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生产萎缩）的断然反驳<sup>[41]</sup>，关于不要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命题作简单化理解”<sup>[42]</sup>的警告，以及承认自“列宁时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sup>[43]</sup>——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讨论中——都表明了对斯大林主义时期某些不可侵犯的信条的重新阐述。既然承认由于某些“基本因素”而使工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使“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有了增长”（虽然这不是“在一种健全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至少也就暗示了以前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拒绝承认是无效的。据说这些基本因素主要是<sup>[44]</sup>：（1）“经济的军事化”及其对一般生产水平的影响；（2）德国和日本战败后，马歇尔计划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提供了可能；（3）设备现代化和早已过时的固定资本的更新；（4）“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剧，主要通过合理化手段和追求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无疑，这些因素主要是在美国发挥作用；而如今在最权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中被如此着重地强调，这就无异于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力量的一种重新估价。美国共产党的决议草案进而讲到美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统治阶级还没有被硬逼到不能维持它已经确立的政治统治方式。”<sup>[45]</sup>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些经济、政治的因素的确是“基本的”，它足以表明“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反复估计”是“有害的”、“不现实的”<sup>[46]</sup>。

但是，请再次注意，这种重新评价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积极的”意义是重要的。完全不谈这种稳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健全的基础”，这种资本主义也会实现恩格斯<sup>[47]</sup>和列宁<sup>[48]</sup>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概念。充分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up>[49]</sup>会比单纯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更合乎历史的发展水平，即达到它的不可超越的“极限”。

## “总危机”与西方无产阶级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运用了多少传统马克思的范畴去分析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在对西方无产阶级的估价中变得特别清楚。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否认任何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的存在；后斯大林主义的修改接近于承认这样一种基础（尽管他们认为它是“不健全的”）。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的理论都否认阶级状况有任何根本的变化。它们仍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革命的阶级（虽然不是处于“革命的形势”中），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将其看做总危机中的破坏力量。在苏联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决议中，宣布了一项作为苏联对外政策中心的“和平共处”政策，但正是这一决议，又要求尽一切努力加强“作为世界革命基础的苏联无产阶级与西欧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联合”<sup>[50]</sup>。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斯大林通过回忆苏联无产阶级作为“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作用<sup>[51]</sup>，又重谈这个联合的问题。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重申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是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最强大的力量。劳动者的大部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和解，他们的生活水准的提高是按“相对贫困化”的论点来解释的。列宁关于“工人贵族”“腐化”的概念以少许的改动而被保留：苏联社会主义的挑战、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劳动者的力量，迫使垄断资本主义“作出一系列的社会性让步，让步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水平”<sup>[52]</sup>。

但是，在苏联的理论继续谈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同时，苏联的政策却已经根据现实状况进行了调整，并且已经把西方无产阶级暂时搁下，等待它作为一种革命力量重新活跃的转折时刻的到来。把无产阶级与其他“爱好和平”的社会集团归并到一起，表明了对历史的基本趋向的认识。“革命阶级”接受了民主改良主义的特性。为了解释和论证这种趋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这一众所周知的理论概念。

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18—1923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及原先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霸权下的屈服，把西欧的革命发展抛回到了一个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了民族主权、民主权利和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巨大进步成就已经被垄断资产阶级所背弃。在这种条件下，被征服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举起并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

旗帜<sup>[53]</sup>，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去接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恢复先进资产阶级反对反动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因此，西方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符合苏联对国际格局的评价，必须把它看做一种长期性的特征，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最低纲领”被纳入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公式中：“对于现时代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维护民族主权和反对外国奴役威胁的斗争，已经变得极其重要了。”<sup>[54]</sup>不是“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倡导为苏维埃国家与跟随本国共产党的群众之间提供了一种脆弱的联系（不过，对历史“主体”中的变化来说，乃是一个良好的标志），而且这种纲领是用来激化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一种手段。

“联合阵线”<sup>[55]</sup>的政策属于同样的概念。它受着“组织起来了的资本主义”这一客观条件的支配，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使得劳动阶级的大部分成为新的繁荣的受益者，因而似乎也为改良主义和反革命的态度提供了一种最新的正当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历来所主张的，如果革命的成功靠的是赢得大多数，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人民的大多数，那么，共产党的战略就必须根据大多数人不革命的条件进行调整。只要非革命的条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联合阵线的政策就是一种基本的战略，即使在领导分散时也不能抛弃。事实上，至少自1934年以来，联合阵线就已经成了苏联政策的一个目标，虽然作用的重点和范围发生过好几次变化。对于联合阵线的评价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在于它是不是针对普通百姓或者是不是也针对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也不在于它是不是针对这些集团以外的某些或全部“资产阶级政党”，而在于这种政策是不是可能改变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可能的非共产党的联盟者的态度取决于西方社会起作用的程度，所以只要这个社会还在发生着影响，联合阵线就不能不仍然是早产或具有“地方局限”的。如果情况不再是这样，联合阵线的政策就几乎是多余的了。然而，单是达到联合阵线的持续努力就会使共产党的某些重要方面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继承者。<sup>[56]</sup>当后者倾向于失去工人阶级的特性而接近于中产阶级政党的特性时，这就可能出现一种真空，在这一真空中只有共产党人才可能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出现，但这种利益又反过来召唤非革命的代表。这种趋向在法国和意大利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可能性<sup>[57]</sup>，实际上是令人回想起了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曾长期作为社会民主党战略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各国共产党的利益与苏联共产党的利益的一

致性，不是因为对付共产党的种种政治对策，这种趋向还会更加强大。

鉴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要素的经久不变，人们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是否有“破裂”？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年代与充分发展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由于专政的发展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这种差别就很快表现为极权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稳步增长。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的话，那么，从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就很适合这一规律。西方革命的“延迟”和资本主义的稳定助长了苏联社会结构中的质变。列宁试图通过先于社会主义解放的工业化建设（集中体现在他的社会主义就是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的定义中），即苏维埃国家的地位优先于苏联工人<sup>[58]</sup>，来抵消一个落后国家内革命的孤立性。列宁逝世于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升之前，此后，他曾经力图取得的“喘息”似乎只延续了一段更短的时间。斯大林推进了列宁看做保持苏维埃制度的先决条件的“文明”纲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达到高峰之时，恰好是希特勒政权巩固之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文明已经进展到了足以抵挡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最强大的战争机器的地步。从那种空前的破坏来看，战后重建工作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在另一个国际阵营里，重建也是这样进行的。战争结束时的苏联政策，以其一系列的占领和“来自上面的革命”，不顾各个国家固有社会力量的格局，表明斯大林不相信一种革命制度正在欧洲成熟起来，或者苏维埃国家的长期保存可以依靠殖民地的革命。不过，列宁的指示仍然有效，而且它确定了在社会主义“最初阶段”苏维埃国家的压倒一切的目标。这就是奉行一个公式，“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sup>[59]</sup>。所以，在压制人的潜力的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继续增强物质和技术的潜力，苏联社会在继续发展。

但是，正是斯大林主义文明的成就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所明确规定了的僵局。按照这种学说，战争经济为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是这样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巩固是不稳定的和短命的，而且必定会在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中被打破。然而，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的话，这个敌人增长着的力量与扩张要求保持一种“持久的”战争经济或备战经济，使得帝国主义的力量得以联合，而同时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资本主义既能维持这种经济，又能使生活水平不致显著下降（或许还能有所提高呢），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即恰恰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增长支撑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统一与稳定。苏联方面不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政策，就不能打破这种僵局，而这反过来又得



靠苏联社会相应的前进。政策上的这样一种变化——目的在于瓦解资本主义的稳定所赖以支撑的“战争经济”——的先决条件是苏联达到了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使得它能“放松”其不妥协的、攻击性的战略。只有这样一种放松，而且有计划地长期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粉碎国际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使资本主义体系回复到“正常状态”，即其内部矛盾应该成熟并最终爆发。从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开始并在1955—1956年获得的契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变化，表明了政策上将要发生的转变。转变的时间不是苏联领导者斟酌决定的，斯大林的去世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的因素看做存在于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态势的先决条件的实现之中，即对于苏联社会来说的先进工业文明水平的达到之中。我们认为，如果近来政策的变化表明，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估计，这种先决条件现在业已具备，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在国际共产党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本质上的崭新阶段。

下面几章将概括地评述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并且试图把它们与苏联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倾向联系起来。

### 注释

[1] 参见米高扬 (Mikoyan) 于1956年2月16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in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Stenograficheskiĭ otchet* (苏共二十大：速记报道) (2 vols.;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6), I, 319-321; 参见赫鲁晓夫 (Khrushchev) 2月14日的演说，in *ibid.*, I, 14-20; 又见 *New York Times*, 1956年2月19日; 及赫鲁晓夫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 (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 p. A-47)。

[2]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Slogan” (written in 1915), 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House Document No. 619, Supplement I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p. 29; Lenin, *Selected Works* (12 vo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7-1938), V, 14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 “Voennaia programma proletarskoi revoliutsii” (The War Program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Sochineniia* (著作集) (3d ed., 30 vols.; Moscow, Institut Lenina, 1928-1937), XIX, 32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又见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 169。

[4] 他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政策的演说，1918年3月23日，见 *Sochineniia* (著作集)，XVII, 16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6卷，182~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比如“Two Tactics of Social Democracy”（写于1905年）中的矛盾的陈述，*Selected Works*, III, 7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1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又见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to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1920, in *Selected Works*, X, 239—24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Sochineniia*（著作集），XXII, 48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 “O ‘levom’ rebiachestve i mel’ koburzhuaznosti” (On “Leftist” Infantilism and Petty-Bourgeois Attitudes), *Pravda*, May 9-11, 191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81、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 In *Selected Works*, IX, 39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89~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 1915年，在他的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Slogan）中，列宁写道：“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Selected Works*, V, 140-141（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 *Selected Works*, IX, 39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理论，由于共产主义力量的巨大增长，这种“分裂”表现为不是对“帝国主义者”，而是对共产主义者有利，是一种成功。

[11] *Ibid.*, IX, 398（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 *Ibid.*, IX, 399. 喘息或“歇口气”的概念，在1920年苏联内外政策中开始起决定作用。参见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53), III, 318 ff.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 *Selected Works*, IX, 400-40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1~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 *Sochineniia*（著作集），XXVI, 14-15. 译本见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3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0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 材料取自：(a) 共产国际的纲领、论文和决议；(b) 已经被列入必须遵守的“经典”中的苏联领导者的某些理论论述；(c) 苏联经济学家的重要讨论和文件，特别是1947年（瓦加论战 [the Varga controversy]），1949年和1950年的讨论，以及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后《经济问题》（*Voprosy Ekonomiki*）上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分析。具体的出处，将在下面注明。

[16] *Thirteen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intern: Theses and Decisions*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4), pp. 3f.; Dimitrov's report to the

Sev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1935, in *United Front Against Fascism* (New York, New Century Publishers, 1935), pp. 5-7.

[17]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0), pp. 10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Capitalist Stabilization Has Ended; Thesi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Twelf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2), p. 7.

[19] O. Kuusinen, *Prepare for Power*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2) p. 40.

[20] *Capitalist Stabilization Has Ended*, p. 16.

[21] *Ibid.* p. 22.

[22] *Ibid.* p. 17.

[23] 见日丹诺夫于1947年9月在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House Document No. 619, Supplement I, p. 216。“政治力量的一种新的联合已经兴起”。日丹诺夫继续说明，“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西方和远东、中东国家在一切主要问题上追随美国的领导。

[24] 关于以下的论述，请参见：M. Rubinshtein, “Osnovnoi ekonomicheskii zakon sovremennogo kapitalizma,” *Voprosy Ekonomiki*, 1952, No. 10, pp. 38-55; I. Lemin, “Obostrenie protivorechii i neizbezhnost' vojn mezhdu kapitalisticheskimi stranami,” *Voprosy Ekonomiki*, 1952, No. 12, pp. 34-53; and I. Trakhtenberg, “Osobennosti vosproizvodstva i krizisov v sovremennom kapitalizme,” *Voprosy Ekonomiki*, 1952, No. 10, pp. 69-85.

[25] 例如，G. V. Kozlov, “Obshchii krizis kapitalizma i ego obostrenie na sovremennom etape,” *Voprosy Ekonomiki*, 1952, No. 4, pp. 68 ff.

[26] I. Lemin, “Obostrenie protivorechii i neizbezhnost' vojn mezhdu kapitalisticheskimi stranami,” *Voprosy Ekonomiki*, 1952, No. 12, p. 44, 该书为针对瓦加的著作采取的粗暴行为提出了理由，瓦加的著作是 *Izmeneniä v ekonomike kapitalizma v itoge vtoroi mirovoi voiny* (Moscow, Gospolitizdat, 1946), See p. 66 below.

[27] *Ibid.*, p. 45.

[28] *Ibid.*, p. 40.

[29] *Ibid.*, p. 53.

[30] I. Trakhtenberg, “Osobennosti vosproizvodstva i krizisov v sovremennom kapitalizme,” *Voprosy Ekonomiki*, 1952, No. 10, p. 85.

[31]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a (B) v rezoliutsiakh i resheniakh s'ezdov konferentsii, i plenumov TsK* (2 vols.; Moscow, Gospolitizdat, 1936), II, 27.

[32] *Ibid.*, II, 48.

[33] Report at the Cominform conference, September, 1947, 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House Document No. 619, Supplement I, p. 219.

[34]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üa* (B), II, 48.

[35]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ed. by Leo Grulioiw (New York, F. A. Praeger, 1953), pp. 7 f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6] 有关“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命题的变更，参见 pp. 161 f. below.

[37] In the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2), p. 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8] 这里讨论的英译本参见 *Soviet Views on the Post-War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48); see especially p. 9.

[39] E. Varga, “The Decline of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II, No. 32 (September 23, 1950), pp. 3 ff. (节自 *Voprosy Ekonomiki*, 1950, No. 4, pp. 48-71)。

[40] V. Cheprakov, “Burshuaznye ekonomisty i gosudarstvenno-monopoliticheskii kapitalizm”, 1955, No. 9, pp. 134-147; and V. Cheprakov, “Leninskaia teoriia neravnomernosti razvitiia kapitalizma i obostrenie mezhimperialisticheskikh protivorechii v poslevoennyi period,” *Voprosy Ekonomiki*, 1956, No. 4, pp. 30-47.

[41] 参见米高扬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XX S” 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ü Sovetskogo Soiüza*, I, 323。虽然斯大林的名字特别地在米高扬演说的广播中被提到，但在代表大会的官方报告中被略去了。

[42] Khrushchev, in *ibid.*, I, 15.

[43] Mikoyan, in *ibid.*, I, 323.

[44] 参见赫鲁晓夫的演说，in *ibid.*, I, 15-16，及赫鲁晓夫在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 (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 p. A-17)。

[45]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1956.

[46] *Ibid.*

[47] “Anti-Dühring,” in *A Handbook of Marxism*, ed. by E. Bur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p. 292 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8]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3), pp. 7, 14, 1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7卷，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9] 其主要特征在 Cheprakov, “Leninskaia teoriia neravnomernosti razvitiia kapitalizma i obostrenie mezhimperialisticheskikh protivorechii v poslevoennyi period” 中有所概括，*Voprosy Ekonomiki*, 1956, No. 4, pp. 30-47.

[50]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üa* (B), II, 48.

[51]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p. 235. 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 676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52] V. Cheprakov, “Nekotorye voprosy sovremennogo kapitalizma,” *Kommunist*, 1956, No. 1 (January). 又见赫鲁晓夫 1957 年 11 月 6 日的演说 (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 p. A-47)。

[53] Stalin,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p. 236.

[54] P. Fedoseev, “Socialism and Patriotism,”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 No. 28 (August 22, 1953), 4 (摘自 *Kommunist*, No. 9 [June, 1953], pp. 12-28)。

[55] “联合阵线”这里只是就它联合东西方的作用, 而不是就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来讨论的, 它对于后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

[56] 参见 p. 242 below. 又见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1957.

[57] Khrushchev, at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in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I, 38ff.; Mikoyan, in *ibid.*, pp. 312 ff.

[58] 这种态度的最显著的例子 (后为托洛茨基所充分认可), 参见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到处可见, 特别是第 93、188、213~216 等页。

[59] 1939 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着重号为作者增加), 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 25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又见他在战后 1946 年 2 月 9 日的讲话, 参见 *Pravda*, February 10, 1946。参见《斯大林选集》, 下卷, 496~497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这个公式也从 N. Voznesenskii 的 *Voennaia Ekonomika SSSR v Period Otechestvennoi Voiny* (Moscow, Gospolitizdat, 1947) 得出结论; 但人们之所以否定这部著作, 并不是由于这个结论。

### 3. 新的合理性



我们将以一种初步的方式，试图来确定“一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来确定支配它的建设和内部态势的原则。这样做时，我们作为指导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术语，也不是它的简单的否定，亦不是“极权主义”及其同义语。不是社会主义，因为概念的证实依靠定义的一致性，而且它只能产生于考察的结果；不是极权主义，因为这个概念适用于广泛的多样化的有着对抗结构的社会制度。我们倒宁愿尽力综合那些在所有阶段，甚至在倒退和变更中也保持着普遍一贯的苏联社会建设的特征，以便确认那些支配性的原则。这些特征可以扼要地重新陈述如下：

(1) 在国有化生产的基础上，总体的工业化伴随着“主要的第 I 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优先地位。

(2) 实行农业的逐步集体化，目的在于最终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

(3) 劳动的普遍机械化，“多种技术”训练的推广，引导城乡职业之间的“均等化”。

(4) 在坚持第 1~3 点提出的目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生活条件的普遍水平。

(5) 树立一种普遍的工作精神、竞赛效率，消灭一切超常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因素（所谓“苏联现实主义”）。

(6) 维护和加强国家，把军事的、管理的和党的机制作为这些过程（第 1~5 点）的工具。

(7) 在达到第 1~5 点中提出的目标之后，社会产品转向按个人需要分配。

这些目标是以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条件的，这是当前一些主要趋势的归结点。超出这一点，我们定之为新的和不同质的趋势，它们将

在第8章里，在试图评价“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前景时予以说明。

以下的原则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过渡的解释：

(1) 苏联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内部和外部矛盾展开的辩证过程而发生。

(2)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在苏维埃国家的控制和指引下，内部矛盾能够没有“爆发”而得到合理的解决。

(3) 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动力的基本内部矛盾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的合理而有控制的发展形成一种向共产主义的逐步的管理上的转变。

(4) 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转变发生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环境）下。包含在这种形势下的外部矛盾，只有在国际的层次上——通过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解决。

(5) 这种解决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整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里革命潜力的软弱性和苏联势力范围内仍然普遍存在的落后性，需要一种新的持久的“喘息”<sup>[1]</sup>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处”。

(6) 苏联必须通过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来维持这种喘息，避免与它们发生战争，避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令人泄气的革命实验（“夺取政权”）。

(7) 外部矛盾的解决将成熟起来，这取决于两个因素：（a）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和资本主义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将使无产阶级再次成为革命的历史动力；（b）苏联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力量日益增长。

(8) 支持这些基本革命力量的“主要后备军”，是发展中国家的半无产阶级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不独立国家的解放运动。

由这些原则指引的社会过程不只是极权管理下国有化基础上的东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这里所发生的事超出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共产党的工业化通过“跳跃”和缩短整个历史时期而前进。西方与苏联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为一种强大的同化趋势所平衡。两种制度都显示了后期工业文明的共同特征——集中化和严密的组织代替了私人企业和自主；竞争成为有组织的和“合理化”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官僚有着共同的法规；人民通过通信、娱乐和教育等“大众媒介”而协调起来。如果这些手段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民主的权利和体制就能通过宪法而授予，并且得以坚持，而没有与制度相对立的滥用这些权利和体制的危险。国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就其自身而

言，只要生产还被集中和控制得高于全体居民之上，就不会形成一种本质的差别。如果没有“直接生产者”“自下面”而来的主动性和控制力，国有化不过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为了从上面进行控制（集中计划）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政治手段，即统治方式的一种变化、统治的简化，而不是什么消灭统治的前提。取消了作为自主的经济和政治主体的个体，压抑生产力发展的某种“老式”制动器就被消除了。（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的个体单位不再是社会一体化的合适媒介，技术进步和大生产打碎了在自由主义时代起进步作用的个体形式。

但是，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和增长着的生产率又产生了抵制这种趋势的威胁。增长着的社会能量和财富进而反对压抑性的劳动组织和分工。对这种逆反趋势的认识体现在近来的政策变化之中，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sup>[2]</sup>

苏联制度似乎是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持久落后以后“跳跃”几个发展阶段的又一例证，它加入并毫不客气地跑到了晚期工业社会的总趋势前面。这些被跳过的阶段是那些启蒙的绝对主义和自由主义阶段，企业自由竞争的阶段，具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的中产阶级文化的阶段。在一个落后国家里，以创纪录的速度努力赶上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其结果是，在一种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不相容的统治和严密组织的制度内，建设并利用一架庞大的生产机器。这里就埋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和唯心主义因素进行无情斗争的根源，这种斗争反映出对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不是一种解放，而是控制的手段。

代表现代西方文明的理性观念集中于我思的自主、自我的独立思想发现和履行了自然与社会合理组织的法则。自我本身就是服从于自然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主观的理性与客观的理性正好是重合的：这个社会把握了自然，并把自然转变成了人的需要和才能的发展实际上取之不尽的物质来源。只要国家即现存的权力还是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障碍，这种目标的达到就要求个性的解放。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可望从大量个体（经济、政治、文化的）企业的适当自由中产生，而整体的合理性是通过这些个体单位的竞争过程表现出来的。这一过程要求高度的个体自主性、预见性、预测性和敏锐性——人们不仅需要在生活的实际职责中获得这些特质，而且在培养这种职责的准备中：在家庭、在学校，以及在思想和感情的深处，要求获得这些特质。因此，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自主，就是说，依赖于主观



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区别与张力，依赖于对这种张力关系的解决，其解决方式即是维护客观理性（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和发展主观理性（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

技术的进步和大工业的发展包含对这一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种（对抗性的）趋势：（1）劳动的机械化与合理化，从物质的工作过程中，能够解放从未有过的大量个人精力（与时间），并使这种精力（与时间）可用于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2）同样的机械化与合理化产生了千篇一律的统一性和对机器的严格服从，因为机器所要求的只是调节与反应，而不是自主性和自发性。<sup>[3]</sup>如果工业设备的国有化与集中化是随着对这些趋势中的第一个趋势的抵制而发展的，即伴随着把劳动当做一种全日性的职业来征服和强制进行，那么，工业化中的进步也就等于是支配的进步，因为，对机器的料理，即科学工作过程，变成了极权主义的东西而影响着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器械的技术完美性支配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时又保持着两者之间的差别。自主性和自发性只能在既定的模式内发挥效率，有所成就。智力创造成了工程师、专家和代理人的一种差事。个人生活和闲暇被当做是劳动的放松和准备，因为这种劳动乃是尊奉工业设备的。所以，人们中的持不同意见者，不仅犯了一种政治上的罪恶行为，而且犯了技术上的愚蠢行为、破坏活动和对机器的滥用。理性不过是这一整体的合理性，即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行和增长的合理性。所谓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和谐，仍旧只是一种纯粹的许诺而已。

我们可以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合理性的自我解释来阐明这种合理性的作用。按照它的自我解释，十月革命建立了一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之间的一致，消除了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因而，理性已不再分裂为主观的和客观的两种表现；它不再与现实相对抗或外在于现实，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而是在社会自身中得到实现。这个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定义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成了辨别真理与谬误的唯一标准，思想和行动上不能有任何超越，不能有个人的自主性，因为整体的法则（Nomos）才是真正的法则。要超越它，就是想树立主观的理性来反对国家的理性，诉诸更高的准则和价值，这乃是属于阶级社会的君权，因为阶级社会的社会法则并不是它的个体的法则。与此相反，苏联社会使个体的现实利益制度化——由此看来，它包含真理与虚伪、正确与谬误的一切标准。“苏联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和美学问题，它是苏联社会结构所要求的智力和实践行为的普遍范式。

诚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效力之外，人们并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等于一种自由而合理的社会，这个“理性的实现”的概念自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实际上个人利益仍然与整体的利益相对抗，因为国有化并不是社会化，所以苏联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表现为根本的不合理和对恐怖主义的遵从。然而，要是新的苏维埃合理性的评价停留在这一点上，就会忽视它的决定性作用。因为那种从制度之外来衡量是不合理的东西，在制度之内却是合理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具有宣布和指挥有限实践的功能，它往往也创造出命题所规定的事实。它们不要求它们自身的真理价值，而是宣布一种通过特定的态度和行为来实现的预先建立的真理。它们是对行动的实用性指令。例如，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是围绕少数经常重复并严格地列入正统经典的论述，大意是说：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全体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保证和实施的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另一方面是说今日资本主义出现阶级斗争尖锐化，工人生活水准下降、失业等状况。因此，这些由它们自己所采取并公式化了的论述，显然是荒谬的，不论按照马克思还是非马克思的标准来看，都是如此。但是，在它们所出现的前后关系之内，它们的谬误性并不能使它们无效，因为，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对它们的证实，不是在既定的事实中，而是在“趋势”之中，在所控制的政治实践将会实现所期望的事实的一种历史过程中。

这些论述的价值是实用性的，而不是逻辑上的，正如由它们的句法结构所清楚提示的那样。它们是无条件的、不可改变的公式，要求一种无条件的、不可改变的回答。在无休止的重复中，同样的名词总是伴以同样的形容词和分词；名词正好直接地“统辖”着它们，所以当它一出现，它们就“自动地”跟随在恰当的位置上。相同的动词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向来“转移”命题，而那些为命题所称呼的动词，也应该按同样方向移动。这些论述不把一个谓语归因于一个主语（在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的意义上）；它们不按其特定的关系来展开主语——所有这些认识过程都寓于命题的范围之外，就是说，是寓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中，而例行的论述只是唤起某种预先建立的东西。它们要由人“拼缀”，即由人们机械地、单调地从字义上学习的东西；它们应伴随着现实化行动的一种礼教由人们去履行。它们是去唤起和维持所需要的实践。就它们自己来说，它们也像那些命令或广告一样并不服从于真理：它们的“真理”是在它们的效果中。在这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密集型社会时代的那种语言和交流的衰退。在认识的水平上来讨论官方意识形态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是个实践理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理性的问题。

如果对于带来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些命题失去了它们的认识价值，那就是说，如果它们被理解为一种特定行为的指令，那么，不可思议的因素就会胜过和支配可理解的思想与行动。如果凭幻觉来指导一种创造和改变现实的行为，那么也就抹杀了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正如抹去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差别一样。巫术在原始社会的实际作用，被描述为一种“纯粹实际行动的实体，是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来执行的”<sup>[4]</sup>。这种描述很适用于貌似理论命题。官方的语言自身就具有巫术的性质。

然而，当代交往中巫术特性的复活是与原始的状况很不相同的。巫术的非理性因素进入科学的计划的和实践的管理体系中——它们成为社会的科学管理的一部分。而且，苏联理论的巫术特性还被变为一种挽救真理的工具。礼教的公式是从其原始认识的背景中分离出来的，因而为毫无异议的群众行为提供毫无疑问的方向，但同时它们又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保留着它们的历史实质。备受人们赞颂的严格性，就是要在显然与现实相矛盾的情况下保持这种本质的纯粹性，就是要在使预先建立的真理成为悖论的明显矛盾的事实面前，强行予以证实。它蔑视理性，它显得荒唐。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却有一种客观的根据：它反映了历史境况的荒谬性。在这种历史境况中，马克思允诺的实现目标出现了——只是又被推迟了而已，新的生产力再次被用作压抑生产的工具。礼教化的语言保持了马克思学说的最初内容，把它们当做必须相信和用以反对一切相反现象的真理。人们必须从行为、感情和思想上把他们的国家看做好像是那种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理性、自由和正义的现实，礼教就是要使人们确信这种行为。由它指导的实践的确在国际范围内打动了广大被剥夺社会权利的群众。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学说的最初诺言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学说的新形式适应于它的新的历史动力——要成为其“真正”所是，即成为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的落后的人们。这种学说的礼教化，在事实的反驳中保持了它的活力，并且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把它传达到了一群被赶入政治行动、向先进工业文明竞争和挑战的落后的被压迫的人们。在这种巫术般的应用中，马克思学说呈现出一种新的合理性。

苏维埃合理性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不仅适于它自身的势力范围，也适于它涉及的资本主义方面的论述。诚然，直接明显的谬误常常可以归因于单纯宣传的需要。但是在这方面，在巧言令色之外经常发生的谬误形式，也含有挑战的意向，即与事实开展顽固的斗争，因为用世界历史的“真理”来衡量，事实乃是偶然的，应当予以否定。例如，《真理报》驻纽约特派记者报道<sup>[5]</sup>：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分类卡里，找不到一本“一般论述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 或苏联军队”的书。而事实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分类包括大约“两打直接关系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卡片”，和“大约 500 张在‘军队、俄国’名目下的卡片”。苏联记者却因美国和苏联相敌对的主要分类关系，而把这些都否定了。又比如，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于 1952 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历史》（*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出版的时刻正值该党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普遍的支持，它的领导者被关在狱中，它的党员在数量上微不足道——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工人阶级和民族的党”，其中一节的标题是“共产党的进步”，这些论述七零八落的不真实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一种作用，这就是拒绝服从事实；坚持和履行该党作为“列宁主义的群众性的党”的真实本性，而反对它的不适当的实际存在。

马克思的学说实体化为一种礼教形式，就成了意识形态。但是它的内容和功能却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经典”形式：马克思的学说与其是“虚假的意识”<sup>[6]</sup>，毋宁是正对虚假的意识，这种虚假乃是一种在被客观历史利益所体现的“较高真理”的背景下得到“纠正”的虚假。这往往易于取消意识形态上的意识自由，易于使意识形态作为自觉指导社会行动的部分而与社会基础同化。随着社会生产潜力与它的受约束的利用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就尖锐化了，这时原先意识形态的自由因素就服从于行政的控制与指导了。意识形态对于现存的社会需要的相对独立性的削弱、它们的内容的僵化，乃是现阶段文明的特征。在僵化的形式中，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对抗性的意义，而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如果像人的自由、理性或个人思想自主之类的观念，不再从它们仍未实现的要求去理解，而成为那些在其维护现状的职业中每日都在背叛它们的报纸记者、政治活动家、表演者、广告宣传员等的常备武器，那么，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性概念就会丧失它们的超越作用，而沦为关于向往的行为的陈词滥调。

独立思想的衰退极大地增强了词语的力量——它们的魔力，文明过程一开始就伴随着它们的破坏作用。如果保护词语，反对用理智的探求从言词追溯到它们所表述的思想，那么词语就成为行政管理手中的武器，而与之相对的个人却毫无力量。通过大众交际媒介，词语传达着行政管理的目标，使全体民众与政府所期待的行为相适应。

伴随着西方文明进步的合理性，是在思想与思想对象间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了发展：它是在理解着的主体与其世界的关系中来探索真理与谬误的，而逻辑则是这种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发展，其表达形式是命题。正如思想的对象

被看做某种依于自身和自在的东西（不管它们如何与思想相分离）一样，主体也被认为是某种“自为”的东西——它自由地发现关于其对象的真理，特别是还在隐藏着的真理，即它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认识的自由被认为是实践的自由，亦即按照真理去行动、去实现主观和客观可能性的一个本质部分。在不再存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这种关系的地方，传统的逻辑就失去了它的根据。真理和谬误因而就不再具备认识的命题的特性，而具备使思想和行动相适应的一种预先加以确立和限定的事态的特性。这样一来，逻辑的衡量标准便是这样：思想和行动是否适于达到预定的目标。

### 注释

[1] 正如斯大林所解释的，最后两点概括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三历史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开始直到现在）。Stalin, *Sochineniia* (Works), (13 vols.; Moscow, Gospolitizdat, 1946-1951), VI, 153.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又见 L. F. Shorichev, *Voprosy strategii i taktiki v trudakh I.V. Stalina perioda 1921-1925 godov* (Moscow, Pravda, 1950)。

[2] See Chapter 8.

[3] Thorstein Veblen,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New York, B. W. Huebsch, 1922), pp. 306 ff.

[4] Bronislaw Malinowski,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chor Books; New York, Doubleday, 1954), p. 70.

[5]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1953.

[6] Engels, Letter to Franz Mehring, July 14, 1893,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9-1950), II, 4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4. 一国社会主义



上一章试图确认的新的合理性，正是苏联从事社会建设的氛围之特点。更明确地说，这种合理性属于苏联社会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在苏联社会中，那种最井然严格的统治系统，是为自由奠定基础的，压抑性的政策被证明为解放的政策。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设想，即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附加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政权的一种支柱而起作用的；我们也没有接受另一种相反的假设，即认为苏联社会是马克思学说意义上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仅仅进行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单纯对照，我们还不能说明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是“异常的”共存条件下苏联社会建设的反映。

我们已经强调，只要对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的控制不是属于“直接生产者”他们自己，就是说只要没有“来自下面”的控制和主动，国有化与工业化一样，就只是一种更有效的统治工具，在大规模社团结构内增长和操纵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在这方面，苏联社会跟随的是后工业文明的普遍趋势。然而，尽管有这一事实，人们还是会问：苏联的国有化，在它前进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可以抵抗压制的倾向，并改变苏联社会的结构——不论是现实的还是领导集团所谓的政策和目标？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动力问题只是追溯到它被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面，所以，我们的讨论将仅限于选择一些似乎特别具有阐明作用的概念。我们将讨论“一国社会主义”，由这个政治概念所支配的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意识形态中的某种变化，以及最后，这种动力达到顶点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概念。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供总体框架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sup>[1]</sup>，同时也为苏维埃国家的压抑性职能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的证明。这种理论始终依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些形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孤立、社会主义限于落后地区，以及资本主义在大陆间得到重新巩固，从而造成了

困扰苏联社会的内外矛盾。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认为，其内部矛盾能够通过苏联内部并在苏联内部解决，通过国家的“指导”作用解决，而外部矛盾只有通过国际过程<sup>[2]</sup>，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革命才能最终消除。然而，实际上，外部矛盾渗透着内部矛盾，反之也是这样。所以，二者的差别失去了它的决定性意义；通过它自身的发展，“一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更大的概念，它重新确定了苏联社会建设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

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指谓随着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变化而变更。它们主要是根据无产阶级和农民<sup>[3]</sup>、社会主义国家与“本国资产阶级”<sup>[4]</sup>、富农与贫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旧意识”与社会主义精神<sup>[5]</sup>之间的矛盾来规定的。它们的基础被确认为是生产力的增长与落后的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外部矛盾则是根据阶级斗争转向国际舞台来解释的：



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sup>[6]</sup>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斗争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性的；谈论什么向国际舞台的“转移”是没有意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种不同的含义：它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适应于先进工业国家内阶级斗争“中立化”的历史事实。这种概念是与“两个阵营”的论调相联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由苏联领导，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实”阶级利益而战斗。由于西方无产阶级在地理上“包含”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尽管“实际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不能有效地维护它的“真实”利益——这种职能可以说是移交给了加入苏联阵营的国家集团。无产阶级的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之间的冲突，一开始就包含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现在却成为两个国际集团之间的冲突：落后国家的“外部的”无产阶级应当为真实利益而战斗，承担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随着这种主人公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战略也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变成了一种争夺空间和人口的战争，社会争端发挥了一种政治争端的功能。西方无产阶级（以及就此而言的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苏联的政策中只是在与苏联的政治利益不相冲突的范围内才得到维护的。因此，阶级斗争与其说是转向国际的层次，毋宁说是使它变质为一种

国际的政治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的变质，使得不改变本身结构而解决苏联社会内部矛盾的一切企图均遭失效。为了达到它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依赖于生产力与束缚它们的组织之间冲突的解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消灭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而是解决这种冲突，从而结束人受劳动奴役、人统治人的手段。就这种奴役在生产过程中被制度化而言，它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灭，个人只有当他们自己控制生产时才能是自由的。到达自由的道路可能经历某些阶段——甚至是压抑的阶段（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作过概述），但是除非这条道路由作为解放的唯一历史动力的劳动阶级自己来行进，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革命不一开始就把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手段的关系倒转过来，就是说转为由他来控制它们，那么这种革命就没有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而存在的理由。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实质上是与转向由劳动者们自己来控制相联系的。只要这种转变没完成，革命就一定会再生出正是它力图克服的对抗。对抗表现为多种形式：国有化的生产资料被束缚的利用，生产率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对立，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之间的冲突，国家与私有、半私有财产之间的冲突；或者在国际舞台上，苏联的利益与国外共产党的利益之间、苏维埃国家安全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政策的目标之间的对抗。即使“一国社会主义”变成了所谓“一种势力范围的社会主义”，这些对抗仍然持续存在，因为归根结底造成对抗的正是造成和维持两种制度共存的那些因素。如果苏联马克思主义用“资本主义的威胁”继续盛行来论证压抑性的国家机器永久存在的理由，那么它就承认了苏联社会的结构仍然是对抗性的；这些对抗的解决，有赖于国际格局的根本变化。1938年，斯大林曾经暗示，由于苏联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国际矛盾已经解决<sup>[7]</sup>；1952年，他又强调了当前不同程度地再现的国际矛盾<sup>[8]</sup>。

历史的状况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在外部矛盾继续盛行时，苏维埃国家能够解决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使内部矛盾永久存在。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环境”迫使继续加强压抑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防止为满足个人需要的生产力的自由利用。但是，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继续加强，反过来又使“资本主义环境”永久存在，甚至促进它的国际联合。自列宁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除非苏联成功地打破僵持以利于自身，否则它就最终不能幸存下来。这种打破是希望通过“帝国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复活来实现的。这些矛盾在西方



的防御经济中被冻结了，所以，瓦解这种统一的政治经济，就是必不可少的首要目标。

但是，只要当苏联不再是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的威胁，就是说，当苏维埃国家的生产力改为服务于其公民的需要和能力时，苏联领导才能希望达到这种目标。这就意味着生产和生产关系是按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组织的，这种方式是：物质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只是社会努力的副产品，而是社会努力的目标。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苏联社会的这样一种转变，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共存时代国际政治的要求。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迫承认，两类矛盾互相依赖，使得社会争端决定政治争端。突破僵局的关键目的，只有通过苏联社会的改革才能达到，这种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优势，“通过传播”来推广社会主义，并因而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阶级斗争的解冻提供基础。

为了评价这种改革的前景，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结构，按照苏联的学说，这种社会结构是要保持对社会变化的“指导作用”。

### 注释

[1] M. M. Rozente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1), pp. 57, 108, 及其他各处。

[2] 第一个“权威性”的公式参见斯大林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Results of the Work of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ference) (写于1925年)；*Sochineniia* (Works) (13 vols.; Moscow, Gospolitizdat, 1946-1951), VII, 90-132。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35~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Stalin, “Results of the Work of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ference,” 引自斯大林的 *Problems of Lenin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p. 63。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Stalin, “Letter to Ivanov,” 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House Document No. 619, Supplement I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p. 151。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Rozente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pp. 293 ff.

[6] 斯大林于1937年的论述，引自一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演讲，Soviet Home Service, Moscow Radio, March 5, 1951。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又见 Rozente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p. 302。

[7] “Letter to Ivanov,” 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House

Document 619, Supplement I, p. 150.

[8]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ed. by Leo Gruliow (New York, F. A. Praeger, 1953), pp. 5, 11, 14. See below, pp. 166 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1~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



简要的概述就足以使人想起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持和发展的学说的主要方面，与恩格斯的适用于社会主义在所有或多数国家获胜的“国家消亡”的公式相对照，在“一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有新的决定性的职能。这些职能是依据内部发展和国际形势而变化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从十月革命到“剥削阶级被消灭”），国家的职能是：(a)“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b)“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c)“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在第二阶段（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国家的(a)职能消失，而代之以“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职能，(b)与(c)职能仍“完全保存”。而且，在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仍会继续存在，除非“资本主义的包围”已被消灭，除非“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已经消失——只有到那时，国家才会“消亡”<sup>[1]</sup>。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法归结为以下公式：“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sup>[2]</sup>随后，他又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之前和在过渡期间必须强化国家权力。<sup>[3]</sup>

在社会主义初期国家继续存在的观点，是包含在马克思学说的本来概念之中的。马克思设想过，“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存在。<sup>[4]</sup>因此，国家也会继续存在，它的“消亡”将是逐步的，并且先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勾画了这样一种发展<sup>[5]</sup>，他在19世纪80年代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又强调了这一点：



无政府主义者……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sup>[6]</sup>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围绕马克思引文所展开的对考茨基的批驳，与这个概念并不矛盾。<sup>[7]</sup>应当摧毁的“国家机器”不能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而必须“打碎”的“官僚军事机器”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诚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的一切历史形式都是阶级国家的形式，但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感染”有资本主义的遗产，那么，其国家的情况也就同样。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行使强制性职能的同时，它的实质却经历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确是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sup>[8]</sup>因此，就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而言，强制的主体和被强制的对象是一致的。<sup>[9]</sup>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阶段的国家是一种“非国家”，被“打碎”和“摧毁”了的国家。<sup>[10]</sup>由于“严格地”说来，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sup>[11]</sup>，所以，国家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阶级同一性，现在就倾向于把强制转变为合理的管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总结的国家职能的变化正是这种转变：“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sup>[12]</sup>

与这个概念相对照，苏维埃国家却全面行使反对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的和政府的职能；统治仍然是劳动分工的一种专门职能，而且其本身乃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官僚的垄断。生产过程的集中的官方组织使这种职能永久化，因为指挥生产过程的集团决定着社会的需要（社会生产和分配），而这种需要又是独立于被统治的全体居民的集体控制之外的。这些集团是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个“阶级”，乃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词句的解释问题。<sup>[13]</sup>事实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作为区别于基础体制的“指导”职能，而这种国家又保持“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的分离。苏联马克思主义用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异常环境来为这种“反常”现象辩护。这些环境应当要求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的体系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展，并

且要求国家行使压抑性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教育的职能来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因此，苏维埃国家恰恰形成了恩格斯所描述的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结构：“社会产生着……某些共同职能”，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因而构成了与全体居民相分离的特殊利益。<sup>[14]</sup>国家再次成了一种具体化、人格化的力量。

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国家作为这样一种力量成了世界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的阿基米德点，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工具”。苏联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的永久人格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本身联系起来。<sup>[15]</sup>其论证如下：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国有化为一种代表城乡无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国家是他们的国家，因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农村地区“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sup>[16]</sup>。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引下，国家经济秩序的革命化不仅超越和反对工人、农民的“直接利益”，而且使工农利益服从于生产的官僚一权力组织，这就是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形成了国家的坚决制度化。按照斯大林主义，向社会主义随后阶段的转变，同样将是通过加强制度化的国家而不是通过瓦解国家来实现的。<sup>[17]</sup>但是包含在这些公式中的政权的人格化会自己阻碍因国际、国内的发展而必需的政治结构的变动。国家的权力有其客观的局限。在斯大林主义后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本身从属于普遍的社会经济规律。“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sup>[18]</sup>根据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种国内国际的发展正在斯大林主义成就的基础上显示出来，并正在要求苏联的理论和策略出现一种相应的变化。

在我们概略论述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国家发展趋势之前，人们肯定会问：苏维埃国家是谁或是什么？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已上升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以及它的构成和特权，这些都不再是有争议的事实——至少在苏联是这样。继续强调吸收和训练高度合格的专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他们的特权也得到宣扬。<sup>[19]</sup>而且这个集团的不断壮大，被看做是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sup>[20]</sup>国家发展问题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仅是政府官僚阶层的特权，它在数量上的加强及其等级制的特征，也是它的权力的基础与核心。对于官僚阶层来说，保持和提高特权地位，显然是性命攸关的利益。很明显，官僚阶层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为了评价它们对苏联社会的倾向性发展的重大意义，也须试图确定，是不是有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来

运用官僚阶层的特殊地位（或官僚阶层内部的特殊地位），使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破裂和改变，下面几段仅提出有关这种尝试的几个一般的方面。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承认苏联社会中相矛盾的利益的存在<sup>[21]</sup>，并且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劳动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来引申它们。提到这些矛盾的具体根源是：生产资料的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制的共同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的不同阶层的划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不平衡发展。只要官僚阶层是劳动分工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殊地位，它就有一种单独的特殊利益。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内部”矛盾以及伴随着的官僚的单独地位，将因不消除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所导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不平等而“拉平”。因此，官僚的阶级地位（但不是官僚本身）的消除，将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在那个阶段，官僚阶层仍将履行特殊职能，但不再是在一种制度化的、等级性的职能分工内履行；官僚将会因“公开化”而失去其“政治性”内涵，随着物质和精神生产力的丰富，一般的社会职能成为可以在个人之间互相交换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这样一种趋势的设想，在理论上是不是与苏维埃国家的现实结构相一致的呢？

官僚阶层，就其自身而言，不管它怎样庞大，都不会产生自我持久的权力，除非它有一种由以派生出它的地位的经济基础，或者除非与它联盟的其他社会集团具有这样一种权力基础。自然，传统的经济权力根源不适用于苏联的官僚阶层；它并不拥有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但是很显然，宪法规定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并不控制生产资料。所以，控制而不是所有权，必定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是，除非进一步规定，否则，“控制”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权力之所在。“控制”的行使是单纯靠充分独立足以公开反对他人的特殊利益集团呢，还是这些利益集团自身也服从于压倒一切的规律和力量？谈到苏维埃制度和它的生产组织，就必须把技术管理和社会控制区别开来。如果那些管理工业和农业的要害机构的人，是由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并作为一个特殊集团，来决定企业和劳动的政策，从而对社会需要及其满足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如此一来，这两种控制层次就一致了。这样一种一致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苏联的理论，这是党运用社会控制压倒一切技术管理的控制，而且由于党与国家相融合，社会控制采取了集中而有计划的政治控制的形式，但是关于党的方面，必定会提出最终取代控制的同样问题，因为甚至党的最高领导也包含不同的集团和利益，包括经营管理上的集团和利益。显然，“人民”是可以被排斥在外的：没有有效的“自下而上”

的社会控制。于是，便留下了两种可能性：（1）官僚内部的一个特定集团运用控制压倒所有其他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集团成为社会控制的自主的主体）；（2）或者官僚作为一个“阶级”成为真正统治者，就是说，是一个统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控制与技术—管理的控制是一致的）。下面就来讨论这种选择。

即使是有效地制度化了的个人权力，也并不限定社会控制。斯大林的专政完全可以通过他的实际权力压倒一切不同的利益。然而，这种个人权力本身服从于社会制度的要求，它依靠这种制度的持续运转，这些要求高于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乃是由控制工业和农业基础的利益集团，由警察和军队的利益集团共同决定的。这一点，对于后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更为确实。于是，对社会控制之所在的探寻，就从个人专政追溯到上面概述的那种选择。但是看来并没有什么孤立的单一型集团，可以把社会控制有意义地归属于它。最高统治集团本身是变动的，并且包括各种官僚阶层和官僚的各个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管理、军队、党）的“代表”。它们中的每一个对于社会控制都有一种特殊的利益和追求。但是，权力的垄断者受到两方面力量的抵制：一方面，是中央的计划，尽管它有其难以预测的变化、漏洞和更改，但最终会代替或统一各种特殊的利益；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阶层，直到最高层次，都要受竞争恐怖的支配，或者，在恐怖减轻之后，就要受政治的或惩罚性工具的高度易变的运用所支配，导致权力的丧失。诚然，中央计划本身就是官僚阶层在制度的主要部门（政府、党、军事力量、经营管理单位）中的工作；但它是它们组合与调节各种利益并协商的结果，于是便有了由苏联社会的内部发展所决定的一般利益。这种关系在恐怖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恐怖是无数暴力的集中的、有条不紊的应用（对于恐怖的对象和恐怖的最高集团，甚至恐怖的实施者来说，恐怖是难以计数的），不仅在紧急形势下，而且在正常状态下也是这样。只要苏维埃国家依靠这种无数的应用，它就依靠恐怖的力量，尽管恐怖会接近于一种正常竞争的社会制度，以至于使惩罚手段（诸如来自官方的调动、降级）成为非暴力的。按其历史职能来说，恐怖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倒退的<sup>[22]</sup>，这取决于它是不是在实际上促进压迫制度的毁灭、自由制度的成长和生产力的合理利用。在苏维埃国家里，恐怖具有两重性，即技术性恐怖和政治性恐怖。技术和业务方面的不称职和成绩的贫乏要受到惩罚；政治上危险的怀疑态度、意见和行为，任何这类型的不守规矩也要受到惩罚。这两种形式是互相联系的，不称职总是要从政治上进行裁判。然而，随着一切有组织的对立面的消灭和极权主义管理的不断成

功，恐怖的趋势逐渐以技术方面为主，而且就苏联自身而言，严格的政治恐怖似乎是例外的情形而不是一种规则。甚至，不再自命为合理、雄辩和严谨的政治指控的那一套完全刻板化的陈词滥调，也完全可以用来包含告发的真实理由：这种真实理由实际上只是在管理措施的时间安排和执行方面有意见分歧，而对其实质性的东西，反对派是没有异议的。

技术上的恐怖是无所不在的，但正是这种无所不在，就意味着在特权和地位方面极大的无差别性。如果环境是“有利的”，在低层发生的行为就可能涉及高层。首长们自己并不是不受影响的——他们不是压制别人的绝对主人。那种驱使国家机器反对特定目标的环境，似乎是各个官僚阶层内无数纵横交错的力量最后态势。突出案例中的最终决定，也有可能是最高集团间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每个集团都代表它自己的“组织”，而每个“组织”又服从于中央计划和对外对内政策现行原则总框架的竞争性控制。这种总框架给个人和小集团的影响和利益、贪污腐败和牟取暴利留下了空子；它也允许一个集团（以及集团中某一个人）上升到顶端，但它也规定了在不推翻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制度下权力垄断所不能超越的界限。

这些界限是受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的有计划的增长和相互关系制约的。主要机构增长的比率和方式，以及机构内部的重点，显然是通过竞争造成的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决定的。然而，其结果迟早必然适合苏联社会建设的基本趋向，适合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支配着这种趋向的原则。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一旦制度化，它们就有自身的契机和自身的客观要求，利益集团本身依赖于对这些要求的遵守。原则是按照变化着的国内、国际形势改变和调整的，但会出现一种长期性的总趋势，改变和调整则是融合其中的。当斯特潘宁（Stepanian）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预先设想“它的原则和基础的不可改变性”<sup>[23]</sup>时，并不只是一种宣传，同样的原则（不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的确支配了苏维埃制度所有基本领域的控制。这些原则很可能再次体现在权力的竞争及所造成的利益集团的冲突之中，因为它们正是从属于这些权力和利益集团所盛行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比如，努力减少重工业的投资，以利于轻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品的增长，在斯大林死后这一点已走向公开化，并在最高领导的某些集团中采取了权力斗争的形式。然而，苏联工业化的长期趋向和由它规定的政治体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斗争的结果。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社会建设，依靠的是重工业持久的优先地位；这种平衡中的根本转变意味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自身在结构方面的根本转变。斯大林主义的纲领并没有排除这种转变，相反，我们强调过这个纲领的“试验”性和它是



“第二阶段”的方针。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在任何特殊集团或个人的自行处置和权力之内发生的，它依赖于国际格局和苏联社会生产力的经济、政治水平。更明确地说，它依赖于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削弱。这种水平是不是已经达到，国际形势对于变化是不是可行，这是一种政治决断，它要在官僚阶层的最高领导者之间以斗争的方式解决，但如果作出的决断不被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客观因素，就是说，归根结底不被苏联政策的国际国内效力确证和检验，这种决断就将被取消。

另一个保持凌驾于官僚阶层的“权力斗争”之上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的例子，可以由农业政策方面来提供：经各种转折、回复、跳跃和改正，并经过集体化的连续阶段，农业政策的目的在于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城乡的生活及劳动的同一。在对外政策方面，经过“强硬的”与“温和的”时期，经过局部战争与“和平进攻”，列宁的方针成为最高的指导：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处中，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保持“喘息”。在这里，对支配性原则的解释，以及关于这些原则所规定的措施的时效和范围的决策，最后也都是由最高领导集团所垄断的。但是，不论最高领导层的组成和数目可能如何变化，也不论它与下级官僚阶层的磋商与妥协的程度会有多大差异，支配性的原则看来都十分严格，以至于规定了特殊权力的界限，并且在这些原则所支配的体系之内防止了这些特殊权力的制度化。

因此，苏联的官僚阶层，似乎并不具有有效地永久保持那种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之最高普遍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的基础。官僚阶层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阶级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来控制基本民众，而这种控制的行使，又产生了在控制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但是，它们必须妥协，并最终服从总的政策，任何特殊利益集团都无法凭借其特殊权力来改变这种总的政策。这是不是意味着官僚阶层代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共同利益呢？

在一个由具有不同经济利益、职业利益和行政利益的竞争集团所组成的社会里，“共同利益”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术语。即使有人认为，由于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最大限度的实现而产生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条件的普遍提高，可以用来定义每一个文明化社会的共同利益，那么，在不同质的社会里，这种共同利益的实现，似乎也伴随着与社会中某些特权化了的集团利益的冲突。共同利益不会与所有的利益相一致，它只会保持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概念。这种对抗的情况，不但在官僚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而且在城市和乡村两大类人之间，甚至在这些集团内的不同子集团之间，诸如男工与女工、熟练工

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等关系上继续存在。即使在一个有着丰富资源而又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一般生活水准和一般性自由的提高，也只能压倒大部分民众的直接利益，作为一种最不平等的发展而出现。正如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不是同一的那样，“普遍的”自由和正义的实现，同时也就是个人的非正义和非自由的实现（甚至是整个社会集团的非正义和非自由）。由于权利与法律的真正普遍性——正义与自由的保证者——必须从“特殊”中抽象出来这一事实，而要求否定和限制。

在一个落后的社会里，包含在共同利益中的不平等会大得多。国有化和集中计划本身都不能消灭这种不平等。共同利益仍将作为与直接利益的对立而保持一种高度的“抽象”（虽然这种抽象性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降低）。换句话说，一般（共同的）利益与特殊利益的总和之间的传统区分仍有道理，一般必须由其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作为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来规定。苏联马克思主义是联系生产力及其组织来规定前者；社会利益据说是由那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集团和利益所代表的。这种关系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因素，它要由各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来规定。

就苏联社会来说，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被看做“共处”环境下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和竞争力量的前提。于是官僚阶层的地位便依赖于生产机构的扩展，而且官僚内部特殊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通过工艺和力量的机械化，通过外交和权力政治，由这种共同的社会利益所取代。所以苏联的官僚阶层是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代表社会利益，在这种形式中，个人的利益与个人相分离而被国家所僭取。

苏维埃国家作为制度化的集体出现，在这一集体中，马克思关于直接利益与真实（客观的历史的）利益的区分成了政治结构建设的基本原理。国家是真实（社会的）利益的体现，但是这样的国家“还不”是与它所统治的人民的利益相同一的；他们的直接利益“还不”与客观的社会利益相符合。比如，人民希望较少的工作、较多的自由、较多的消费品，但是，按照官方的理论，仍然存在的落后与匮乏必然要求这些利益继续从属于军备和工业化的社会利益。这是个人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之间古老的分歧所在；但是，按照苏联的理论，它却是出现在历史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因为以前，国家所代表的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说，阶级的国家，就它组织并支撑整个社会有秩序的再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它也代表集体的利益。<sup>[24]</sup>然而，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合理发展与他们的个人得益的利用之间的冲突，在阶级国家的结构内部，是不能解决的，并且破坏了利

益的一致性。当这种冲突成熟时，阶级国家就必然会变得更加倒退，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桎梏。与此不同，苏维埃国家被设想为越过了这种对立的过程，它能够解决冲突<sup>[25]</sup>，并且能够在全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和谐。

### 注释

[1] Stalin,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Eighteenth Party Congress”, in *Lenin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2), p. 474.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69、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Stalin, *Political Report to the Sixteenth Party Congress*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0), p. 171.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iazykoznaniiia*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0).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又见 M. M. Rozena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1), p. 109。

[4]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9-1950), II, 23; see above, p.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Questions 17 and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366~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 Letter to Ph. van Patten, April 18, 1883, in Marx and Engels, *Briefe an A. Bebel, W. Liebknecht, K. Kautsky und Andere* (Moscow, 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SSR, 1933), I, 2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仅仅在五年以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似乎还与这个概念相矛盾。在那里他说：“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但是，限定性术语（“真正”、“整个社会”、“独立”）会使得有可能发现这种“行动”是在第一阶段的末尾而不是开头。

[7]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2), pp. 25, 3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8~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 “Communist Manifesto,” 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House Document No. 619, Supplement I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p.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89~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 当然，国家权力直接反对内外“资本主义敌人”的地方除外。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这种职能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结构；反对阶级敌人的军事和政治行动，

被看做一种在群众中的发动，看做武装了的人民自己的行动。

[10] Marx, Letter to Kugelmann, April 12, 1871,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II, 4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p. 3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 “Communist Manifesto,” 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House Document No. 619, Supplement I, p.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2] Engels, “On Authority,”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I, 57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著名的公式：“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 Marx and Engels, *Die Allianz der sozialisti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ed. by Wilhelm, Bloss under the title *Marx oder Bakunin?* (Stuttgart, Volksverlag für Wirtschaft und Verkehr, 1920), p.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3] 显然，如果“阶级”是按对基本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定义的，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又是由所有制决定的，那么苏联的官僚就不是一个阶级。如果把掌握生产资料作为标准，那么这种掌握是不是委托给“直接生产者”并从而有效地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就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了。我们这里的“阶级”是指作为社会劳动分工的“单独”职能（无论有无特权）来行使政府（包括管理上的）职能的一个集团。因此，如果官僚是公开地“自下”上升的，只要它的职能的独特性使它独立于它所管理和支配的人民之外，那么它就会仍然是一个阶级。

[14] Engels, Letter to Conrad Schmidt, October 27, 1890, in *Üb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ed. by Hermann Duncker (Berlin, Internationaler Arbeiterverlag, 1930), II, 14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5] Ts. A. Stepanian, “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 in *O sovetkom sotsialisticheskome obshchestve*, ed. by F. Konstantinov (Moscow, Gospolitizdat, 1948), p. 544.

[16]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iazykoznaniiia*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0).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See below, p. 167.

[18] Stalin,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Eighteenth Party Congress,” in *Lenin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2), p. 473.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 至少从1935年起。参见 Stalin’s speech to the graduates of the Red Army Academy in *Leninism*, pp. 363 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371~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 例如, 参见 Stepanian, “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 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pp. 516 f. and 520.

[21] “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在通过我们自身力量解决内部矛盾的基础上。”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65 vols.; Moscow, OGIZ RSFSR, 1926-1947), XI . VII, col. 378. 关于特殊矛盾的列举, Stalin's speech to the Stakhanovites, 1935, in *Leninism*, p. 368. 参见《斯大林选集》, 下卷, 387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又见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ed. by Leo Gruliov (New York, F. A. Praeger, 1953), 其中到处可见。参见《斯大林选集》, 下卷, 557~560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Rozena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pp. 283-288; Stepanian, “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 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pp. 528-531; and *Pravda*, August 20, 1947.

[22] See Franz Neumann, “Note on the Theory of Dictatorship,” in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57), pp. 233-256.

[23] “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 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p. 482.

[24] See below, p. 120.

[25] See above, pp. 94 f., and below, p. 167.

## 6. 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因为它不单纯就是生产的基本关系的直接的政治表现，而包含着可以说是对生产的阶级关系的“补偿”因素。国家，作为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支撑着普遍的法律和秩序，因此至少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少数人的平等与安全。仅凭这些因素，阶级的国家就能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履行缓和与保持由生产关系所造成的阶级冲突的职能。<sup>[1]</sup>正是这种“中介”作用，使国家具有一种超越特殊利益冲突的普遍利益的外表。国家的普遍性职能本身是由基础决定的，但包含着超越基础甚至与基础相对抗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成为半独立的力量，反过来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作用于基础。

恩格斯区别了国家能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过程的两种主要方式，即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或相同的方向。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推动”经济的发展。<sup>[2]</sup>第二种反作用的方式以政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为前提——这是马克思的学说唯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和一般阶级社会）上升阶段才有的适应。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又提供了集中控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经济规律继续作为客观力量起作用，决定着上层建筑，它们既不能被国家“创造”，也不能被国家“改变”，但它们变得可以被自觉地利用和运用了。<sup>[3]</sup>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苏联的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性差别。两种国家形式都构成一种“政治的上层建筑”，就是说，它们都是由各自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盲目的、至上的，而苏维埃国家则能“指导”并“控制”它。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毋宁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控制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指导力量”，经济的“指导力量”。<sup>[4]</sup>

有些分析苏联发展的人，在这种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新定义（在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Marxism and Linguistic Problems*]中作了一般概括和证实)中,已经看到了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的一种修正。<sup>[5]</sup>实际上,它只是恩格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命题的一种运用而已。国家,如果它“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量,帮助(协助)它的基础来形成和巩固它自身;它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新制度来破坏、消灭旧的基础和阶级”<sup>[6]</sup>。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这种论述,不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一般上层建筑。这些公式在逻辑上依据这种假想,即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无可争辩的是,苏联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基础的关系(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关系),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同样可以在逻辑上设想为一种非对抗性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其说是前进到“更高阶段”不涉及基础中“破坏性的”变更,毋宁说是它的可能性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基础的存在的确会改变上层建筑的全部传统职能,并且建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传统的马克思的概念图式化地运用于苏联社会,那么,其基础就是由现存的生产关系中现存的“生产力”所组成。<sup>[7]</sup>“生产者”是那些赚取工资和受雇于国家领薪水的人,以及集体农庄的成员。在生产者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方面,构成苏联社会的集团(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之间,不存在阶级差别——当然,在控制权和生活条件方面,还是有重大差别的。上层建筑包括行政、法律和文化机构系统,以及由这些系统颁布并传播到私人 and 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图式中,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说,后者是按生产机构的要求塑造的。但机构是国有化的,而且这些要求被集中地加以计划和控制,这就导致了传统图式的重要变化:没有中间因素,国家成了生产机构的直接的政治组织,成了国有化经济的总经理和人格化的利益集体。因此,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在职能上的差别便趋于消失:抹去上层建筑那些超越基础、与基础相对抗的职能,使上层建筑有条不紊地、系统地同化于基础。这个为社会控制建立新基础的过程,改变的正是意识形态的实质。观念与现实、文化与文明、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曾经作为西方文明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的紧张关系——不是解决了,而是有条不紊地减轻了。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schein),但却是一种必然的幻象,是从对人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客观的规律和力量系统的社会生产

组织中产生的。当作为现实的社会基础的一种“反映”时，意识形态含有真理，但真理表现为虚假的形式。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并宣称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这种宣称是建立在“虚假的意识”上——之所以虚假，是因为思想与它们的经济基础的真实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的实际局限和否定，并没有进入意识。<sup>[8]</sup>一种特定的历史内容显示为普遍有效的，并服务于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一种支柱。但是，意识形态的职能远远超出这种服务之外。世代相传的材料——包括人类永久的希望、追求和苦难，他的被压抑的潜能、完满的公正、幸福和自由的观念——都成为意识形态的部分。它们的意识形态表现主要是在宗教、哲学和艺术中，但同时还在自由、平等和完全的法律、政治概念中。

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含有一种动态发展，它导致相对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职能和分量上的变化。基础越是侵犯意识形态，即使它与现成秩序相协调，那么，作为离现实最遥远的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哲学），正因为它的遥远性，就越成为这种秩序的对立面的最后庇护所。当马克思开始精心阐述他的学说时，他受到了一种信念激发，即认为历史已经最后达到了理性与自由能从哲学观念质变为政治目标的阶段。他发现，哲学（在马克思看来，是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实现是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中<sup>[9]</sup>，这种实现同时就是哲学的结束、哲学的“消灭”。无产阶级，为哲学提供“物质武器”，又在哲学中发现了它的“思想武器”。哲学已详尽阐述了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他的自主性、他对自身生命的掌握、他的潜能和幸福等观念。阶级社会使这些内容成为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社会的行动，将把它们变为现实。

然而，妨碍先进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样的发展，破坏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现实、哲学转变为革命实践的概念。如果无产阶级不再作为代表现存秩序的“绝对否定”的革命阶级而行动，那么它就不再为哲学提供“物质的武器”。于是情况复原了：理性与自由为现实所抵制，因而再次成为哲学所关切的事。人的本质，他的完全的解放又成为〔仅仅是〕思想中所经验到的（in Gedanken erlebt）。<sup>[10]</sup>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它的历史地位本质上正是哲学——又一次不但预见政治的实践，跑在实践的前面，而且面对失败的实践仍然坚持解放的目标。按照这种职能，理论再次成为意识形态——不是作为虚假的意识，而是作为与压抑性的现实相疏远、相隔离，甚至相对立的意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成为一种极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对于苏维埃国家来说，“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斗争，就是一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已经看到<sup>[11]</sup>，在这种斗争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如何改变它们的关系的。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前向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前进，必须使现存基础发生革命的改变，而苏维埃国家却能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指导”，在业已存在的基础上实现转变。这个过程能消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素，连进入意识并被自觉利用的最明显的矛盾和错觉，甚至胡说和谬论，都不例外。但这并没顾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内容。全体民众所从属的增长着的生产力与被束缚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民众中维持着意识形态超越被束缚的现实之外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这种需要将会消失，“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sup>[12]</sup>。在苏联的制度中，这种“普遍利益”在国家中被实体化了——它是一种与个人利益相分离的实体。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实现，并为现实所排斥，乃至它们努力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也被排斥。它们的力量对政权越具爆炸性，新的经济基础就越是被宣传为保证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彻底解放。因此，反对意识形态的超越的战斗，就成为为政权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重心便从哲学移向文学和艺术。通过把哲学吸收进官方理论，哲学超越的危险地带就被控制住了。形而上学，这个历来是人类自由和满足尚未实现的观念的主要庇护所，被宣布为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中一种合理社会的出现所完全取代。伦理哲学，被变成一种行为规则和标准的实用体系，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sup>[13]</sup>哲学的这些分支所剩下的，是它们的方法上的否定。反对西方哲学、“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唯心主义等的斗争（显著的例子是1946年关于亚历山大诺夫的论战），目的在使某些哲学倾向和范畴丧失信誉，因为这些哲学倾向和范畴凭借它们的超越性，似乎危害了“封闭性的”政治和思想体系。（作为一项理论任务，鉴于马克思的概念已经取消却保持〔扬弃〕了被列为禁忌的“资产阶级”因素这个事实，这种斗争的目的看来是自行失败了。所以，用不着惊奇，那场论战根本没有达到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实质性批判的水平。）<sup>[14]</sup>由于哲学的这种否定性<sup>[15]</sup>，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矛头便指向反对艺术中的超越。因为苏联的艺术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可以是——也已经是——艺术的一种高度批判的和进步的形式，以其思想的和理想化的表现，面对现实“本身”，现实主义坚持真理，反对隐瞒和歪曲。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以其实际的否定和暴露形式表现人类自由的理想，因而保持着超越，没有这种超越，艺术本身就会被取消。相反，苏联的现实主义适合于一种压抑形式的国家。通过文学、音乐、绘画等媒介，

对国家政策的自觉和有控制的贯彻，这本身就与艺术不相容（可以引证从希腊艺术到布莱希特 [Bert Brecht] 的很多例子）。然而，苏联现实主义通过把既成的社会现实当做艺术内容的终极框架，不允许有风格上和内容上的任何超越，这就不再是什么对政治准则的艺术贯彻了。这种现实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和落后是受到批评的，但无论是个人还是他的社会都不涉及现行制度所规定和包容之外的任何领域。毫无疑问，这涉及的是共产主义的未来，但共产主义被描述为从现在出发而不会“爆发”现存矛盾的一种进步。未来据说与现在是非对抗性的；压抑将通过顺从的努力逐步产生自由与幸福——从史前史到历史，从它的否定到否定，没有灾难性的分离。但是，正是人的本质与其存在之间的冲突所固有的灾难性因素，已经成为艺术离开礼教以来所趋向的中心。艺术的形象已经保持了对既成现实的决定性的否定——最终的自由。当苏联的美学把“本质与存在之间不可克服的对抗”的概念作为“形式主义”的理论原则来抨击时<sup>[16]</sup>，它也就抨击了艺术本身的原则。按马克思的学说，这种对抗是一个历史事实，它要在一个通过为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使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一致的社会里，得到解决。当达到这一点时，艺术的传统基础就被削弱了——通过艺术内容的实现。而在这种历史事变之前，艺术则保持着它批判的认识职能：表现仍属超越的真理，维持自由的形象反对一种否定的现实。随着自由的实现，艺术将不再是一种真理的容器。<sup>[17]</sup>黑格尔把这种实现看做是他自己时代的任务，已经宣告艺术成了一种过去的事物，失去了它的本质。他把这种艺术的废退归因于新的科学—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一种比艺术所易接近的更为严格的真理公式。<sup>[18]</sup>马克思的学说保留了社会进步与艺术废退之间的历史联系：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表现在艺术中的幸福的许诺（promesse du bonheur）的物质实现的可能；政治行动——革命——就是要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

苏联马克思主义宣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为这种转变创造了基础。那么艺术所剩下的职能和内容是什么呢？苏联美学的回答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形式反映现实。<sup>[19]</sup>“我们的美学规律是，我们的文学越是现实主义的，它就越是成为浪漫主义的。”<sup>[20]</sup>换句话说，一旦现实本身体现了理想（虽然还不是以它的纯粹形式），艺术就必然要反映现实，就是说，如果艺术要保持它的基本职能，它就必须是“现实主义”。超出现实之外的幸福的许诺，过去构成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因素，现在则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现实主义的東西而出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会合。但是这种会合，如果它是名副其实的，就会使艺术成为多余的。自由的现实会抵制艺术超越中的自由思想。黑格尔在艺术的

废退中看到了一种进步的迹象。当理性的发展克服超越（“把它取回”现实之中），艺术就转向它自身的否定。苏联美学拒绝这种观念而坚持艺术，同时又剥夺了艺术超越的权利。这种美学想要的是，不成为艺术的艺术，而且它已如愿以偿了。

然而，苏联对艺术的处理，不单纯是一种无限权力主义的爆发，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为了管辖权的政治和民族的需要。苏联美学最令人震惊的概念，表明了对艺术社会职能的一种敏锐的意识。这些概念主要是从对艺术认识职能的极力强调中引申出来的。按照苏联的美学观点，艺术与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矛盾和对立；艺术的概念与逻辑的概念是不可分离的。<sup>[21]</sup>艺术以“十分类似科学的方式”表现“客观真理”<sup>[22]</sup>，然而，艺术又是真理的一种特定表现——一种与科学和日常语言交流不能相比的表现。这种无可比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似乎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艺术揭露同时又奉献于人与他的世界中（主观上与客观上）尚未控制的力量，也就是在社会控制之下并超出社会控制的“危险地带”。从一个压抑性社会的情况来看，最终的自由就存在于这些危险地带。在它的最深层次上，艺术是一种反对存在的抗争。正因如此，艺术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它就可能危害法律和秩序。柏拉图对艺术的处理，与他把美学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标准融为一体的严格审查制度，比起把艺术作为“自由”的理智、情感和教育性的消遣来评价，是对艺术的本质和职能更为公正的态度。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艺术，只就它保存解放的形象而言，才是艺术；在一个就其总体是对这些形象的否定的社会里，艺术只能通过总体的拒绝才能保存这些形象，就是说，通过不在风格、形式和内容上屈从于非自由的现实的标准。这些标准越是成为极权主义的，现实越是控制所有的语言和交流，艺术就将越易于趋向非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它就将越是从具体推向抽象，从和谐推向不和谐，从内容推向形式。艺术因而是对已经构成现实基本部分的各种事物的拒绝。“资产阶级”的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的非现实性表现了自由的非现实性：艺术与它的对象一样都是超越性的。苏维埃国家通过行政的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这样它就甚至消灭了一个非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意识形态反映。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遵照政令，成为人类生存最后一个仍不顺从的领域的社会控制工具。割断艺术的历史基础，对它加以没有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化，艺术就恢复了它在古代史前史的职能，它显示出巫术般的特征。因此，在行为主义的实用性的合理性中，它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艺术教导……对现实的一种确定的关系。”<sup>[23]</sup>这种关系以苏联英雄和爱国者的“典型”形象为范例，表现在他们与敌对和陈腐力量的斗争中。苏联艺术的目的在于在现实中创造和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并且作为艺术，就是说，通过艺术的形象、艺术的虚构来实现这种关系。但这是巫术般的原则：是“在幻想中颁布想望的东西的实现”，“用一种虚幻的方法去补充现实的方法”<sup>[24]</sup>。当然，虚幻的东西对现实不能有直接的作用，但就它改变“对现实的主观态度”而言，它也就间接地改变着现实。从艺术的职能到巫术的职能这种艺术的认识职能的倒退，出现在苏联美学的最反动的特征中：对“形式主义”和一切“抽象”的、“不和谐”的结构之否定。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中的进步因素，正是包含在那些保持了艺术的“震撼”<sup>[25]</sup>特征的结构中，也就是在那些表现戏剧性冲突的结构中。它们表现了不顾一切的尝试，要突破那种使得传统艺术结构不能用于表现艺术内容的社会标准和歪曲。和谐的艺术形式，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的和古典的、浪漫主义的发展中，失去了它们超越的、批判的力量，它们站在不再与现实相对抗的方面，而表现为现实的组成部分和装饰品——作为调解的工具。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在消遣和娱乐时伴随着日常工作、闲暇和美味的食品，它们会成为颇受欢迎的曲调。在这些条件下，只有它们明确的否定性才能恢复它们的内容。相反，由行政指令来恢复和谐，对不和谐、杂乱和不成曲调的声音加以取缔，这就是使艺术的认识职能“变成一致”，使本质上不一致的艺术想象力被迫成为一致。

有趣的是，由于对不和谐艺术的斥责，苏联的美学就退回到了柏拉图只允许优美、单纯、和谐形式的名言。只有这些形式与“善”、“真”相“融合”：“那么善的力量就回到了美的境界；因为适度和匀称是存在于全世界的美和善”，因而“我们说，真理就是要形成这种融合中的一个因素”<sup>[26]</sup>。柏拉图的艺术理论涉及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哲学王保卫善、真和美的标准，但这是一个与现实相对立的国家。<sup>\*</sup> 由于被迫服务于现实，这种融合便破坏了它自身的成分。

在政治控制艺术的总框架中，政策的大幅度更改是有可能的。放松和收紧、艺术标准与风格的变动，都取决于国内国际的形势格局。当然，随着社会管辖从恐怖主义向正常形式的转变，人们将会听到，或许将会发出为争取更多的艺术自由的呼声。“苏联现实主义”的僵化状态很可能有所松动；无论如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了，甚至“形式主义”和“抽

\* 指柏拉图的“理想国”，它作为一种理想，与现实相对立。——译者注

象”的因素仍然可以变得符合遵从者的口味。就其社会职能而言，这种艺术也像个人的自主与认识一样，正在走向衰退。

### 注释

[1] Engels,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2), p. 1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又见 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p. 40-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7~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Letter to Conrad Schmidt, October 27, 1890,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9-1950), II, 44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Stalin,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ed. by Leo Gruliov (New York, F. A. Praeger, 1953), p. 18.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又见1953年1月23日 *Izvestiia* 的文章，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I, No. 1 (February 14, 1953), 3-6; and below, pp. 166 f.

[4] G. Glezermann, "The Socialist State—Mighty Instrumentality for Building Communism,"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IV, No. 41 (November 24, 1951), 7-10 (译自1951年10月12日 *Izvestiia*)。这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解释了这个公式，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39~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See below, pp. 167 f.

[5] Robert Daniels, "State and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III, No. 1 (February, 1953), 22-43.

[6]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论述的评价，参见 M. B. Mittin, *Novyi vydaiushchiisia vklad I. V. Stalina v razvitie marksistsko-leninskoi teorii* (Moscow, Vsesoiuznoe obshchestvo porasprostraneniuiu politicheskikh i nauchnykh znaniia, 1950), especially p. 13.

[7] 关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定义，是不是在基础中排斥生产力的争论，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生产力本身，比起生产关系来，构成了一种更基本的层次，虽然它们只在特殊的生产关系内部起作用。整个争论见社会科学共产主义学院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2月25日至3月1日，题为“Nauchnaia sessiia, posviashchennaia trudam I. V. Stalina i ikh znacheniiu v razvitiu obshchestvennykh nauk”, *Voprosy Filosofii*, 1952, No. 3, pp. 240-261。

[8] Engels Letter to Mehring, July 14, 1883,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II, 4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 Marx,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in Marx and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 by D. Rjazonov (Frankfurt, Marx-Engels 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1927), Div. I, I, Pt. 1, pp. 620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 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See above, pp. 121 f.

[12] 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 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这一转变问题。

[14] 哲学方面的禁忌甚至影响到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中标志着里程碑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最著名的，如 Georg Lukács'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lin, Der Malik-Verlag, 1923)，而同一作者的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Berlin, Aufbau-Verlag, 1954) 则可以看做马克思主义批判退化的一个例子。

[15] 由于上面指出的理由，苏联哲学的实质性讨论属于本书的范围之外，这方面最好的综合评述，见 Gustav A. Wetter,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 System in der Soviet-Union* (Freiburg, Herder, 1952)。

[16] V. A. Razumnyi, "O sushchnosti realisticheskogo khudozhestvennogo obraza," *Voprosy Filosofii*, 1952, No. 6, p. 101.

[17]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in *Sämtliche Werke*, ed. by H. Glockner (26 vols.; Stuttgart, F. Fromman, 1927-1940), XII, 215.

[18] Ibid., pp. 30, 32.

[19] Razumnyi, "O Sushchnosti realisticheskogo khudozhestvennogo obraza," *Voprosy Filosofii*, 1952, No. 6, p. 99.

[20] *Literaturnaia Gazeta*, November 17, 1948.

[21] Razumnyi, "O sushchnosti realisticheskogo khudozhestvennogo obraza," *Voprosy Filosofii*, 1952, No. 6, pp. 99 and 107.

[22] P. Trofimov and others, "Printsipy marksistsko-leninskoi estetiki," *Kommunist*, 1954, No. 16 (November), p. 95.

[23] Ibid., pp. 107-108.

[24] George Thomson,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9), p. 440. See above, pp. 88 f.

[25] T. W. Adorno, "Die gegängelte Musik," in *Dissonanz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56), pp. 46 ff.

[26] *Philebus* 64.

## 7. 辩证法及其变迁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它对辩证法的处理暴露得更明显了。辩证法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石，它指导对革命前和革命发展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被设想为指导两个时期的战略。任何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超越到一个新的历史形势而对辩证法的逻辑作出根本的“修正”，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是教条主义趣味）的一种“背离”，而且是对基本倾向改变的一种理论辩护。因此，苏联理论的解说者们恰当地注视着这个领域的事件。他们推断，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把辩证法调节和吸引到了对政权进行辩护和捍卫的轨道（但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这种政权恰恰是应当被历史发展所超越的）。借以支持这一论断的主要方面有：关于对从量到质的转变思想的阉割、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爆发性变化的否认（“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形式逻辑的再度引进，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术语的消失。<sup>[1]</sup>然而，实际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全在于它对辩证法的费力而详尽的阐述中。我们将看到，上面提到的革新本身无一是与马克思的（甚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在基本的辩证法概念丝毫也没有被修正或反驳的同时，辩证法本身的职能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从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变成了一种带有僵化的固定规则和条例的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种转变比任何修正都更彻底地破坏了辩证法。这种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从理论变为意识形态相适应；辩证法被赋予了官方的思想和交流的魔法的性质。当马克思的理论不再作为革命意识和实践的研究方法，而进入既成的统治制度的上层建筑时，辩证思维的运动就被编纂为一种哲学体系。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越是成为难题，辩证法本身就越是变成了形式逻辑。苏联马克思主义要在辩证法和逻辑方面产生一部合适的“教科书”困难重重，这不仅仅有政治性的原因，而且正是辩证法的本质反对这类编纂。这对于唯

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都是如此，因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把辩证法发展为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图式。这种图式化的第一步，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他在世时没有出版）中走出的，他的札记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编纂提供了骨架。

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和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如果黑格尔坚持越过思想与其对象之间明确建立起来的差别，如果他谈到现实中的“矛盾”（一个“逻辑”的术语），谈到概念的运动，量“转变”为质，那么他实际上不仅规定了相符，而且规定了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特定的“同一”——他使一个与另一个同化。有人注意到黑格尔混淆了本质上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是可以说，这种批评家的智慧并未超出黑格尔的智力和眼光。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传统差别是“抽象的”，并且歪曲了真实的关系。思想与其对象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它本身是“真实的”，构成了思想和它的对象的实质。这种共同的特性就是一切存在即理性的内在结构和目的。在黑格尔看来，正是依据这种结构，主观的和客观的存在的一切方式，都是在愈益自觉的形式中自我实现的方式——在历史中是从无机自然的“盲目”过程到人的自由实现。理性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是一切存在的逻各斯。就实现是发生于规定存在的各种方式和条件的矛盾的发展和解决而言，它是辩证的。存在本质上是一个“领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客体在其实存的种种条件和关系之中并与之相对立而形成自身，从而实现其存在。借助于这个过程，实存成为领悟的，客体成为“主观的”，而领悟即“概念”（*begriff*）则成为存在的本质的“现实”。自我意识的思维只是一切存在所共有的一种实存的最高方式，而思想的运动只是一切存在运动的最高、最普遍的方式。黑格尔论及一个概念转向另一个概念，意即一个概念通过思考揭露起初似乎是与这个概念相异甚至相对立的内容。在此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思想过程中，即一个概念被另一个更适合于现实的概念所代替，而是同一个概念展开它自身的内容——它是包含在概念中的属于现实的动力。现实有（或者宁可说“就是”）它自身的逻各斯，而逻辑即是本体论。在这种带有含糊其辞的外在表述后面的，正是自古希腊以来构成西方哲学的思想，即把逻各斯看做存在的本质，



它反过来规定“定义”的逻辑结构，并使得“逻辑”成为发现和交流的一种工具。不管把逻各斯翻译为“理性”可能是怎样的不合适，但它阐明了这一思想的决定性的含义，即宇宙的秩序（自然和社会、物理现象和历史）同时是一种逻辑的和本体论的，一种正在领悟和已被领悟了的（*begreifende and begriffene*）秩序。因此，认识的关系具有构成现实的意义，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然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不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既定的条件，而是在与相反的、否定性条件的斗争中达到的。一旦这种斗争成为实存的自我意识的方式，也就是出现在人的存在中，辩证的过程便成为历史的过程——理论与实践就合一了。这种斗争在一种“世界的状态”中得到完成，在那里，冲突在主体与客体、个别与普遍的透明的和谐中解决了。这是哲学和现实的内在的逻辑。因此，辩证法的逻辑可以叫做一种自由的逻辑，或者，更确切些，毋宁说是一种解放的逻辑，因为这一过程属于一个相异的世界，只是通过粉碎和超越与它的实现相“矛盾”的条件，这个世界的“实体”才可以变成“主体”（《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阐明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命题）。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超越了历史过程本身，并使之成为形而上学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中最终的自由只是理念的自由。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仍然用于历史的领域。历史过程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单纯的冲突，而是矛盾，因为它们作为异化的历史，构成的正是历史的逻各斯。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各斯）表明它反对自身：它的经济职能通常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危机来实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支撑着匮乏与苦役；财富的增加使贫穷永久存在；进步就是人性的丧失。具体地说，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求表明的，正是自由的工资契约和公平的等价交换，产生了剥削和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实现使它们转向自己的反面。<sup>[2]</sup>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自相矛盾的：正是支配它的规律把它引向毁灭。正如在黑格尔的概念中，解放的过程不是作为加于现实之上的一种外在的图式，而是作为它的客观动因而出现，这种客观动因是自由“主体”的实现，这个主体现在发现了它的历史形式和任务——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形式和任务。加之，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无产阶级的真正意识（阶级意识）乃是解放的客观动因中的一个构成的因素。

关于辩证法结构的上述简要评注，可以说明它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所经历的命运。辩证法的逻各斯不再是解放的逻各斯——既不是在黑格尔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也不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的意义上。一旦辩证法不再注视阶级社

会的矛盾，而扩展于它们之外，这一命运就不可避免了。随着马克思的学说被转变为一种一般的科学的“世界观”，辩证法也就成了一种抽象的“认识的理论”。虽然它从属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sup>[3]</sup>，但其间的联系就不再是十分清楚的了。我们说，马克思的学说或许可以称为一种“世界观”，但它的世界乃是“史前史”，即阶级社会，具体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马克思的学说分析和批判了这个世界的一切表现、它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没有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可以有意义地称作一种“世界观”。不存在什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因为支配前社会主义历史的对抗的辩证法规律，不适用于自由人类的历史，而且理论也不能预先规定自由的规律。马克思的学说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可论证的趋势之外作出任何预言。马克思学说本质上的历史特征排除了非历史的概括。虽然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sup>[4]</sup>。但他注意到了自然和社会，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而辩证法规律是从它们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sup>[5]</sup>在这种抽象中，它们能以一系列的一般设想，将范畴和结论表述出来，但这种一般的图式立即取消了它自身，因为它的范畴只是在历史的积淀中才有生命力。

因此，要试图表现辩证法“本身”，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能做的，只是从对“经典”的具体的辩证分析中提取某些原理，图解这些原理，并使它们与“非辩证的”思想相对照。这些原理就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中列举的，它们也只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中的命题所作的释义。<sup>[6]</sup>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说，它们既不真也不假——它们是空壳。黑格尔能够借助普遍性，把辩证法的原理展开为一门“逻辑科学”，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存在的结构和运动就是“概念”的结构和运动，并且在绝对理念中达到它的真理；然而，反对黑格尔用理念来解释存在的马克思的学说，却不再能够把辩证法作为逻辑加以展开，因为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逻辑乃是历史的现实，它的普遍性就是历史的普遍性。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是适用于自然的问题，在这里至少必须提到，因为强调自然辩证法，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与马克思甚至与列宁相比较。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它的概念结构上是一种历史现实的辩证法，那么，它包括自然，是就自然本身是历史现实的一部分而言（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stoffwechsel]、对自然的支配与开发、自然作为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正是由于自然是从这些历史关系中抽象出来进行研究，如在自然科学

中那样，所以使它显得处于辩证法的领域之外。辩证法的概念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与经济、社会历史著作中的辩证法概念确切的具体性相比较，表现为单纯的类比、象征和附加于内容之上的特点——特别显得空泛或平庸，这不是偶然的。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讲解中，《自然辩证法》却已经成为经常被引证的权威资料。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辩证法支配一切”<sup>[7]</sup>，如果它是“物质世界和认识的一般规律”<sup>[8]</sup>的科学，从而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那么辩证法的概念就必须首先在一切科学中最具科学性方面即自然的科学方面得到证实。结果历史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 worldview，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sup>[9]</sup>。这种分法对于马克思必定是没有意义的，对他来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含义相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科学和哲学体系的一个特殊分支，马克思主义被编纂为一种意识形态，由党的官方来解释，为政策和实践作论证。历史，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辩证法的决定的和证实的领域，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则是一个历史和超历史的规律表现自身的特殊领域。超历史的规律被安排成为了一个命题的体系，在历史和自然中呈现为最终的决定力量。辩证的过程于是不再在严格的意义上解释为一种历史的过程——宁可说是历史被具体化为一种第二自然。苏联的发展因而获得客观自然规律的尊严，据说这种发展被客观自然规律支配，而且如果被正确了解并纳入意识，自然规律将最后矫正一切错误，并导致最后战胜反对力量。

但是，在辩证法规律的客观的、决定论的特征被如此强化的同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表现为蔑视决定论，而实践唯意志论。从强调决定论到强调唯意志论的转移，似乎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特征，而在斯大林主义中达到顶点。像是从列宁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和他的集中的权威党的概念，笔直地引向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在这条道路上，“科学的决定论”让位于（如果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在实践方面）依据政治的甚至个人的目标和利益的变换所作的决议。主观的因素压倒了客观的因素和规律。但是，更仔细的分析表明，把决定论和唯意志论抽象地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们的相互关系较为复杂，需要通过讨论，才能使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历史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一开始就出现两个因素，它们的相对分量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起作用所处的历史条件。<sup>[10]</sup>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当革命“提上议

事日程”，当一个成熟的、有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正采取政治行动时，马克思主义就显得有点儿不只是客观因素的自觉表现。就客观因素“靠自己”倾向于革命而言，就资本主义结构被经济危机和政治剧变所动摇而言，马克思主义能够主要地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协调来解释形势。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它们的领袖以及国际组织的职能是去了解和解释政治力量的客观态势，并且相应地去指导无产阶级的行动。这种职能是一种主观因素：它本身就是认识和意志，它诉诸的是认识和意志。然而，作为一种主观因素，它只是客观因素的系统阐述，它指导政治行动，并成为客观因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和方面。相反，如果革命潜力被削弱、同化或者失败了，那么认识和意志的因素就不体现在客观形势中。于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与行动主要由资本主义的“盲目规律”所决定，而不是突破了这种决定论。因此，党，或者毋宁说党的领袖，就好像是无产阶级“真实”利益的历史贮藏所，并且高居于无产阶级之上，他们通过宣言和法令开展工作，而无产阶级则成为这些决议的对象。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被撕开了——在现实中；在理论上，这种发展则表现为唯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的紧张与对峙。

人们已经经常注意到，马克思的学说在1848年后经历了一种重大的变化。早期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社会主义是用人的渴望与潜能来定义的）中的哲学人道主义，让位于一种“由无情的客观规律支配的科学社会主义”<sup>[1]</sup>。这种转变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学说中的决定论因素跟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有关。因为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是服从于作为“在个人背后”起作用的无情的规律的尚未驾驭的力量。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接着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巩固，再次显示了这些规律的“效力”。对于这些规律，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也是服从的。马克思的学说那时日益强调辩证法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是反映了这种扩展了的决定论，与此同时，“唯意志论”的因素也进入了个别历史力量或动因之中，即进入了领袖的头脑之中。“真正的”意识是那种没有屈从于“虚假的”决定论的意识。但是，不管领袖的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意识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领袖，在其理论与实践，都必须保持或重建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与“真实”利益之间的可论证的联系。在第一国际时期，高度集中的领导与仍然是其决定性基础的无产阶级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那时候，领导的观念、目标和态度，与无产阶级相去很远，肯定不会被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分担，甚至不会被他们理解。但是，第一国际的开幕词（Inaugural Address）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以及领导者之间的通信仍然足以证明，无产阶级的实际态度和行动决定了领导者的理论和策略。

因此，当工业无产阶级更广大的阶层被安置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并且分享它的利益时，支配着这一制度的“自然规律”也像是要吞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一样。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这一过程。辩证法被丢弃了。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决定论相比，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理论包含着一种严格得多的决定论。主观因素的客观化是以牺牲它的革命内容和意图为代价的：无产阶级——连同整个社会——在客观规律的支配下向着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也在同样的规律支配下发挥作用。上面我们已经试图指出，列宁主义试想通过建立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集中化的革命党的权威，来恢复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且，唯意志论成分的加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决定论性质的加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代替了辩证的真理概念，这种实在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成了经典。然而，在列宁主义那里，这两种因素仍然是密切相关的：在革命时期，十分明显的是，列宁把他的策略成功地建立在工人和农民的现实的阶级利益和渴望的基础上。同时，辩证法恢复了活力，为列宁对历史形势的指导性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自1923年以后，领导者的决定则日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分离。领导者不再以作为革命动因的无产阶级为前提，而成了强加于无产阶级和其他下层民众之上的东西。成为斯大林主义领导的特征的权威的唯意志论，乃是对客观的决定因素、对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可能性的减少作出的反应。当领导者的意志从上面对无产阶级起作用时，由领导者宣布或认可的理论就采取了强硬的决定论的形式。辩证法被僵化成一种普遍的体系，其中历史过程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客观规律凌驾于个人之上，既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又支配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命运揭示了苏联社会的历史本质：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就是说，在生产的控制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条件下生产力的工业的发展方面，带有资本主义的职能。苏联的理论在此表达了它的意识形态所否认的东西，即布尔什维克革命“还不”需要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最初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在苏联社会因此而带有资本主义的职能的同时，它执行这种职能却有一种经济基础——全部国有化，它超出了现有结构而导致了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发展趋向（关于这一趋向，我们随后再来弄清）。现在，我们来简要地举例说明辩证法的僵化，以及可能显示未来的趋势之处。

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关于辩证法的阐释，集中在辩证过程的决定论性质上。比如，在罗森塔尔（Rozenal）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中, 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以及随后苏联社会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 都被说成是一种客观力量体系的展开, 而这一体系在其他情况下本来是不能展开的。诚然, 他们一贯着力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的指导作用, 强调苏联人民的爱国的英雄主义, 但人们的行动及其成功, 只有通过他们对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的认识和服从才是可能的。主观的因素与其是表现为客观辩证法的组成因素和阶段, 毋宁是客观辩证法的单纯的容器、接收器, 或执行者。这种观念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及其以后, 保持了它的强制性。党和党的领导者是解释辩证法的唯一权威, 但这种独立性又是受限制的, 因为领导者们自己也要服从他们所解释和贯彻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 是由本质上不同于以前 [社会] 组织的发展性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性质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的, 独立于人类的意识和意志而起作用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党、国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 具有以往历史所未知的机会, 去理解这些规律, 在它们的活动中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 而且同样去促进社会发展的进程。”<sup>[12]</sup>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关系的解释, 把辩证的过程改变成了一种机械论的东西。这一点在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的讨论中显得特别清楚。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而且我们已经看到, 在社会主义本身的观念中, 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自由定义为“认识了必然”<sup>[13]</sup>。这个公式是遵循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定义的转述, 但按照黑格尔的定义,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sup>[14]</sup>。在黑格尔看来, 自由还不单纯是“洞察”了的必然, 而且是领悟 (*begriffene*) 了的必然, 它蕴涵着现实条件的一种变化。单是“洞察”不能把必然变为自由; 黑格尔的“领悟了的”必然“不单纯是抽象的否定性的自由, 而是具体的、肯定性的自由”——惟其如此才是必然的“真理”。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 乃是进入“存在”的一个根本不同的范围, 黑格尔称它为一切辩证的过渡中“最艰难的”过渡。<sup>[15]</sup>

苏联马克思主义极度轻视这种过渡, 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中, 使自由同化于必然。这种同化, 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的变化解释上, 即对阶级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的解释上。按照马克思的学说, 这种发展是: (a) 突变 (阶级社会展开着的矛盾, 只有通过爆发才能解决), (b) 作为突变的发展是前进性的 (通过革命而发动的阶段是文明的更高阶段)。但是, 这两方面的成分本身既是主观的因素也是客观的因素。“爆发”不是自动的, 而是以革命阶级的行动和意识为前提的; 进步只是意味着生产

力的发展，而且继续包括剥削与奴役，直到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动因。<sup>[16]</sup>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冲突”和“矛盾”）的区分引入上述概念<sup>[17]</sup>：前者是不可调和的，只有通过一种灾变性的爆发才能解决，后者通过政治控制而得到逐步解决；前者是阶级社会的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苏联马克思主义宣称，由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在苏联，爆发性的变为渐进性的辩证过渡就成为可能的了。与此相一致，而且是遵循1938年斯大林作出的榜样，“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表述中消失了。十分明显，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概念，最适合于为现存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服务：它给这个国家指定了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历史任务，并且预先从理论上排除了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另一次革命的必要性。然而，应当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理论上与马克思的概念是一致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量转变为质的“突变”的性质，属于未被控制的社会—经济力量的盲目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建立，这些力量是在整个社会的合理控制之下的，这个社会能自觉地调整它与自然、与自身矛盾的斗争。而且，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已规定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方式变化：一旦自由的和自我的意识的合理性层次达到了（“自在自为的存在”），这种合理性也就在这个层次上支配着进一步的转变。同样的，马克思把“否定之否定”的概念具体地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以一种“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否定的否定”<sup>[18]</sup>。辩证的方法并不规定这种概念的图式般的重复，黑格尔也明确告诫过，防止对“三段式”作形式主义的解释和应用。<sup>[19]</sup>所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乃是“正统的”。因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坚决主张苏联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一贯赋予它相应的辩证的特征。这里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对辩证法的修正，不如说是对一个非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社会主义的要求。辩证法本身则被用来证实这种要求。

所有这些都似乎更加有力地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待辩证法的处理，只是为了维护和论证已经建立的政权，而对于辩证法的所有那些预示超出这个政权之外的社会历史的向前进展，也就是向着质上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进展的因素，它是加以排除和极度轻视的。换句话说，苏联马克思主义要从有利于现行事态出发来表述辩证法的“吸引力”——意识形态要追随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但是，情况是更为复杂的。我们在开头就已指出，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所处的态势，乃是该政权若不削弱其自身的基础便无法控制的。我们已经

提出，国际发展趋势迫使苏维埃政权致力于开辟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一种也会有利于改变“上层建筑”的倾向。与意识形态同化于现实相一致，这种倾向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或许是在意识形态中可预见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处理的新近发展，似乎确证了这种设想。甚至还在斯大林主义的后期，意识形态就好像在准备把政权表现得更具灵活性，使之“正常化”，使苏联社会走向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处”，这乃是苏维埃制度内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讨论，像是打算要把意识形态调整到适应这样的新时期。

我们已经提到，斯大林反复强调过上层建筑在发展它的基础方面的“能动”作用，这不仅仅是对国家的现行形式和阶段从意识形态上加以论证和稳定，而且是为了着手与生产力的增长相一致的变化所作出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为此，斯大林在1950年的论述便接近于他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sup>[20]</sup>，它强调在苏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国家指导下“逐步”得到解决。同样，1950—1951年关于逻辑和辩证法的讨论，看来与其说是反对可能的变化而对现状的一种思想的维护，一种对历史进步的警戒，不如说是为预期变化所作的一种准备。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是始终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见解相联系的。<sup>[21]</sup>在那里斯大林指出，谈论语言的“阶级性”和设想特殊的“社会主义的”语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他主张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因为它不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而是超越这样或那样的基础而持久地存在；它不是某些阶级所创造并“服务”于某些阶级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并长期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由于同样的理由，苏联马克思主义宣布，把形式逻辑看做“有阶级性”的，或者设想一种与苏联社会的新基础相适应的特殊的“苏维埃逻辑”，都是不正确的。<sup>[22]</sup>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结果的报告，作了如下总结：



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规律不是建立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形式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初级规律和形式的科学……不存在什么两种逻辑：一种旧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和一种新的、辩证的逻辑……只有一种形式逻辑，它是普遍有效的。<sup>[23]</sup>



辩证逻辑并不否定、取消或反驳形式逻辑的有效性；前者属于认识的不同方面，它与后者的关系有如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

这里我们暂不关注逻辑问题讨论的过程和结论。<sup>[24]</sup>有意义的是，这种变化倾向是在左派的“马尔主义偏离”之后，预告着向正统马克思的回复。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语言和逻辑本身都不属于上层建筑，相反，它们属于基本社会关系自身的前提：作为交往和认识的工具，对于建立和支撑这些关系来说，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语言和思维的某些特定表现才是上层建筑，比如在艺术、哲学、宗教中的表现。遵循马克思的概念，苏联的讨论把逻辑本身与逻辑科学区别开来。后者的某些方面作为对逻辑的一种特殊解释，应当归入意识形态的领域。<sup>[25]</sup>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没有否认形式逻辑的有效性；相反，他们是在揭示“常识”和“科学”的必然抽象性的辩证概念中，通过展开其形式逻辑的内容而维护和证实它的真理性。

与这种辩证法的传统相比较，“马尔主义的”<sup>[26]</sup>语言学与逻辑学（把二者的阶级性强调到极点），确实表现为一种严重的“左”倾，一种共产主义在不成熟时代的“幼稚病”。它似乎是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副产品。通过恐怖而把克服国家在技术和工业上落后的激烈斗争，强加于大量消极甚至有敌对情绪的民众，使这种斗争在苏联人独特而优越的各种理论中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的补偿，这些理论则是从它所“拥有”的作为唯一正确和进步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中引申出来的。但是，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在它的框架内，民族主义只是作为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来说才是进步的，而且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一阶段乃是一个已经被先进的西方世界超越了的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成功地调和它自身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不论在它的战略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这一点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真正的国际主义、沙文主义和“苏联爱国主义”之间的艰难区别证明了的。而且，对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精神、逻辑、语言等的强调，势必损害为达到最终革命目标而要求的国际团结与和平共处，这种团结与共处是不能由一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所完全抛弃的。在对马克思理论的“巫术”般的利用中，“马尔主义”的种种理论也许发挥了一种有用的职能，但随着苏联社会的技术和工业的进步，随着苏维埃国家政治和战略力量的日益增长，它们便与更基本的目标发生了冲突。当苏联政策开始转向过渡到“第二阶段”时，马尔主义的学说就不得不让位于更具普遍性、“正常性”和国际主义的概念。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已达到的发展水平的稳定要指明辩证法的“制动作用”，才重申语言

与逻辑的共同的人类的职能和内容。看来这一重申的目的在于，使意识形态与向“下一个更高阶段”，即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推进相一致，与包含在这一过渡中的东—西方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相一致。

### 注释

[1] 参见 A. Philipov, *Logic and Dialectic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esearch Program on the USSR, 1952), pp. 37 f.

[2] *Capital*, I, Chap. 4, conclusion.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99~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参见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结果的报道，in *Voprosy Filosofii*, 1951, No. 6, pp. 143-149.

[4] “Anti-Dühring,” in *A Handbook of Marxism*, ed. by E. Bur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 26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 *Dialectics of Nature*, trans. by Clemens Dut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0), p.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Ibid.*, p.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对“否定之否定”的省略，see below, pp. 153f.

[7] K. S. Bakradze, “K voprosu o sootnoshenii logiki i dialektiki,” *Voprosy Filosofii*, 1950, No. 2, p. 200.

[8] V. S. Molodtsov, “Ob oshibkakh v ponimanii predmeta dialekticheskogo materializma,” *Voprosy Filosofii*, 1956, No. 1, p. 188.

[9]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 105.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For the following see above, pp. 17 f.

[11] See Leonard Krieger, “Marx and Engels as Histori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V*, No. 3 (June, 1953), 396 ff.

[12] M. T. Iovchuk, “Rol’ sotsialisticheskoi ideologii v bor’be s perezhitkami kapitalizma,” *Voprosy Filosofii*, 1955, No. 1, p. 4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强调苏维埃国家对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的服从，是斯大林最后文章中的基本论点之一；see above, p. 121.

[13] For example, M. D. Kammari, “O novom vydaiushchemsia vklade I. V. Stalina v marksistsko-leninskuiu filosofiiu,” *Voprosy Filosofii*, 1952, No. 6, p. 32.

[14] “Anti-Dühring,” in *Handbook of Marxism*, pp. 255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5]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I, par. 158 and 159; *Science of Logic*, Book II, Sect. 3, Chap. 3, C.

[16] 例如见 1843 年 9 月马克思致卢格的信,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I,” in Marx and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 by D. Rjazonov (Frankfurt, Marx-Engels 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1927), Div. I, I, Pt. 1, 575; and 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3 卷, 2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7] 例如见 M. M. Rozenta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1), *passim*; S. P. Dudel, “K voprosy o edinstve i bor’be protivopolonovsti: kak vnutrennem sodержanii pro-tsessa razvitiia,” in *Voprosy Dialekticheskogo Materializma* (Moscow, Akademia Nauk SSSR, 1951) pp. 73 ff. 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矛盾的学说, 最后形成于日丹诺夫在 1947 年 6 月批评亚历山大诺夫的报告之后, 载于 *Bol’shevik*, 1947, No. 16 (August 30), pp. 7-23。

[18] *Capital*, I, Chap.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3 卷, 83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9] *Science of Logic*, Book III, Sect. 3, Chap. 3.

[20]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ed. by Leo Gruliov (New York, F. A. Praeger, 1953), pp. 1-20. 参见《斯大林选集》, 下卷, 542~54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1] See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iazykoznaniiia* (Marxism and Linguistic Problems)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0). 参见《斯大林选集》, 下卷, 504、51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2] V. I. Cherkesov, “O logike i marksistskoi dialektik,” *Voprosy Filosofii*, 1950, No. 2, p. 211.

[23] *Voprosy Filosofii*, 1951, No. 6, pp. 145, 146.

[24] 它们被概括于 *Voprosy Filosofii*, 1951, No. 6, pp. 143-149, 又见 Gustav Wetter,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Freiburg, Herder, 1952), pp. 544 ff. 至于后斯大林的发展, 见 George L. Kline, “Recent Soviet Philosophy,” 载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 *Annals*, CCCIII (January, 1956), 126-138。

[25] I. I. Osmakov, “O zakone myshleniia i o nauke logiki,” *Voprosy Filosofii*, 1950, No. 3, pp. 318 ff.

[26] 这里讨论的只是对马尔学说的斯大林主义的评价, 而不是这些学说本身。

## 8.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全部解释，如同斯大林主义最后时期以来的全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都是集中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或者说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两个公式可以交换使用）的过渡方面。这种过渡的思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苏维埃国家得到巩固以来，已经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早在1935年，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斯大林欢呼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在“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这一开始是“第二阶段”的前提。<sup>[1]</sup>但是，这种过渡的思想（没有它，苏联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伴随着一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过现在这种过渡被说成是处于进行之中，当作了苏联国内政策的下一个目标。这是斯大林最后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要旨，它被苏联马克思主义誉为关于这种过渡之具体形式的最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它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但这篇论著仍保持着它的意义。

这里的含义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就是与西方之间没有战争。按照这种设想，斯大林坚持主张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先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范围之间的冲突。有整个一节专门用来肯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sup>[2]</sup>斯大林显然是首次公开引证了一个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某些同志”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洲际之间的结合，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政治格局，而且是建立在一种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基础上。这种看法，无异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否定，斯大林的引证只是为了批驳。在这种批驳中，斯大林坚持美国与“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还有德国和日本）之间经济冲突将会复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帝国

主义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不可避免性”这个命题的修改是十分含糊的。首先，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用法，它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样，这个命题就处于帝国主义论的中心。相反，这个命题的“修正”主要是指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战争：所谓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是指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一旦这种含糊之处清晰起来，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中，就表现出一种奇特的一贯性。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论述<sup>[3]</sup>，实质上（有时甚至在字面上）与斯大林主义的公式毫无二致！这种一贯性可以由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一些主要方面来说明，这就是：依靠“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东西方关系的稳定、苏联社会内部的发展，以及经济—政治方面的竞赛。如今特别强调可以避免的战争，首先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可以凭借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长，和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爱好和平”民众的影响来加以防止。然而，正是这些因素又易于导向抵制一般的战争，因此，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看起来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在战争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看来是完全一贯的。与列宁断定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时期相比较，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种“力量的均势”已经建立（就是说，苏联阵营的加强），形成了一种对东、西方战争的制止因素。但是，这种相同的制止力量也减少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军事冲突（苏联阵营会作为这种冲突的受益者出现）的可能性，而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于加剧资本主义矛盾的命题，属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核心。但是，斯大林在他的论文最后重复这个命题的上下文中，给予它特殊的含义。由这一命题引出了从社会主义向作为苏联社会发展下一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命题的作用是重申国内政策对国外政策的优先地位。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人》（*Kommunist*）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第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回顾道：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并受国内政策支配”<sup>[4]</sup>。对于苏联来说，这一“正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势，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的战略调整以及恢复时期所中断。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像是宣布回到国内政策的正常主导地位，并开始它的新阶段。我们强调过，《经济问题》（*Problems of Economics*）杂志对斯大林的文章的讨论，明确地表述了，“实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超过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的冲突。<sup>[5]</sup>斯大林文章的这一部分对于

党的路线仍然具有训令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力量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造成了资本主义力量的一种“和平的”内在缩减。



美国的对外侵略政策，使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尖锐化……苏联的对外政策……不能不重视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内部以及依附于资本主义阶级和集团的个别政党内部矛盾的存在。为保持和巩固和平，削弱侵略的、反民主的势力而利用这些矛盾，是我们的任务。<sup>[6]</sup>

现在帝国主义的强力政策遭到了反对——有人接着论述道，不仅被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而且遭到一部分“富有阶级”反对。<sup>[7]</sup>人们不应低估“一小撮剥削者”在走投无路时发动战争的危险，但若“高估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会是一个更大的错误”<sup>[8]</sup>。

在对帝国主义之间的形势进行重新估价，为对外政策提出一种新的倾向的同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又为这种倾向指出了内部的基础（或许也可说是理由）。对外政策的重新定向，似乎是由一种国内政策的重新定向必然造成的。国际目标的达到——主要是从内部削弱西方社会——最终依赖于苏联社会的一种更高水平的成就（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sup>[9]</sup>斯大林的政治遗言用这种过渡重新阐述了列宁的遗嘱，它规定，作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需要一种新的更长时间的“喘息”。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出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命题后，接着有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这就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斯大林把这个“规律”与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有效的“平均利润”规律相对照。关于这个段落，有些马克思主义解释者曾被这里所包含的正统性问题所困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不能与“平均利润”规律相对立，因为前者或者隶属于后一规律，或者保持着一种例外——只属于“有特权的”企业集团。苏联的评注者们曾经不顾这种困难，而把斯大林的公式看做重新定义今日资本主义形势的一种提示。

由这个新定义来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概念<sup>[10]</sup>，被用来说明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反衬背景。总危机为集中精力于这

种过渡的苏联国内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明显强调苏联制度内部变化的需要——这种变化就是要使制度本身向“更高的”第二阶段转变。斯大林文章的一大部分是专门反驳某些人的观点的，因为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是说，在今日的苏联制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致已达到了排斥矛盾的地步。与这种观点相反，斯大林认为，经济基础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存在什么“完全适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起生产关系来，生产力也“跑在前面”——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是向前进展的发源地，生产关系则不得不转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桎梏。不过，在私人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下，这些矛盾必定导致一种只有通过“爆发”才能解决的冲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却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把落后的生产关系引向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而不致使社会秩序发生“爆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力的增长将提供这样的可能：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sup>[11]</sup>这是“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斯大林谈到了恩格斯说的：“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sup>[12]</sup>在恩格斯的原文中，标有着重点的字（在上述斯大林自己的引用中却没有加着重点）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几个字排除了把社会的商品需要等同于全社会个别成员的需要独裁主义观点。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只在如果并且当社会的需要真正成为个人的需要，同时当这种需要的发展和满足决定着社会的劳动分工时，共产主义才是成功的。但斯大林自己所描述的第二阶段的特征，却并没有暗示要放弃把社会的需要跟其成员的需要加以行政的独裁式的等同。按照他的概念，由于生产力的增长不再受对抗性的私人利益所阻碍，靠苏维埃国家“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的作用，生产关系就能够适应这种增长进行调整。<sup>[13]</sup>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这些机构的工作；“共产主义”将作为一种行政的措施而被引入。

至于哪一年开始过渡，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所讲的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看做基础。考虑到近来所作的调整，可以把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最迟确定在1960年和1965年之间。<sup>[14]</sup>更重要的是按照客观条件来计算时间的问题。斯大林列举了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1）“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3）“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sup>[15]</sup>斯大林强调，为达到最后一个条件，首先必要的一步是“至少”把劳动时间缩短到“六小时，

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他认为，这个时期经济政策的基本措施是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通过既增加货币工资，又有计划地降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sup>[16]</sup>，并且通过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来逐步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特别是通过把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纳入产品交换系统）<sup>[17]</sup>。

上述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概括，重申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一思想主要是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第三部分的论述中引申出来的。但是，在斯大林论述的上下文中，一般性的命题获得了一种政策指令的分量，而且被斯大林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后继者全盘接受了。

首先要注意的事实是，现在的后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继续了晚期斯大林主义政策在“过渡”问题上的主要路线。我们已经就资本主义发展的估价方面试图指出这一点。<sup>[18]</sup>就苏联政策的主要目标来说，这一点也同样不假。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主要的经济任务”，即“在生产按人口平均计算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决议再次肯定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同时肯定了“迅速发展”消费品生产的需要。像斯大林那样，赫鲁晓夫批驳了关于过渡的“乌托邦观点”。遵循斯大林关于向前发展的“基本的预备条件”的论述，决议规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中，全体劳动者的工作日时间缩短到七小时，采煤和采矿工业部门缩短到六小时。而且同样一贯地注重强调技术教育、“专家”培训，以及“国家科学机构与生产相联系”<sup>[19]</sup>。

斯大林主义与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也许仍然只是基本宣传所需要的连续性，若不是它可能反映了苏联社会制度自身固有的一种动态的话。

我们已经提出，在向前进展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了它自身的一种辩证法。一方面，极权主义的管理加强了它自身，也加强了它所反对的力量本身（因而创造了西方社会的一种更为强大的联合）；这样一来，它使苏联制度的压抑性的经济、政治特征持久化了。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它的主要目标（“赶上并超过”），这种管理就依靠它所支配的生产力的竭尽全力的发展。这种发展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视为生存斗争的国际竞赛的影响下，以最现代化的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武器装备，向前推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以达到一种为满足个人需要而自行“流溢”的生产水平。

如果能够保持生产充分地增长，而且这种充分增长不会越来越多地用作浪费和破坏的目的，那么这种生产就很可能产生足够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以显示出所预定的第二阶段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完全适度的）。即使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同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特权官僚阶层，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因为人们



可以期望生产力跑在特权的前面，并且在特权压抑下的居民环境方面，以及相应地在政治制度方面，造成一种逐渐的而又质的变化，如同在文明发展的先前阶段所发生的那样。

当然，极权主义的管理有着足够的力量来阻碍这种趋向，而且如果这种管理是在利益对抗的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增长及其满足个人需要的使用发生作用的话，或者如果它考虑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而必须予以阻碍的话，那么这种阻碍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曾试图表明<sup>[20]</sup>，第一种条件尚不具备。官僚阶层的“阶级利益”（官僚机构各个部门的特殊利益的共同特性），是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相联系的，而行政管理进入“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会最有效地保证苏联社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苏维埃国家已经连续把很大部分生产力（人的和物质的）转向对内对外的军事行业。这种政策阻碍了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吗？战备经济与生活水准的提高和谐共存，这不只是一个技术经济问题。保持一种庞大的军事设施（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及其教育、政治以及心理的控制，能使独裁主义的制度、观念和行为的模式永久化，从而阻碍受压抑的生产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由于官僚阶层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独立阶级，因而它在自我保存中，在永存的压抑性的生产（和政治的）关系中，便有了自己的一份利益。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官僚阶层所赖以建立的压抑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否日益与苏维埃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一般的利益和目标相矛盾。

如果我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回答也必须是肯定的。当前时期，苏联的基本目标是打破那抵消“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西方世界的巩固，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依靠帝国主义冲突的有效性。有利于并保持这种巩固的同样的力量，也危害和延误“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力量的目标的实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西方的巩固以一种“持久的战争经济”为基础，利用资本主义在时间上的领先地位，保持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大部分有组织的劳动的整体性。因此，它继续推迟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革命，而斯大林甚至把这种革命看做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所最终不可缺少的<sup>[21]</sup>。资本主义的战争经济反过来也得到了苏联的“强硬”政策的支持，这种政策同时妨碍着苏联向能有效地与资本主义力量相竞争的第二阶段前进。因此，首要的一步必须是松动“强硬”政策。然而，这是一个对内对外重新定向的问题，是从强调军事和政治竞争向强调更有效的经济竞赛转移的问题，也是使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自由化的问题。这种转移以一种高度的工业化水平为先决条件。苏联在原子能利用方面的成功，可


能是重要事件之一，它使得苏联领导者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足以竞争的工业化水平。

我们相信，近来苏联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上述情况。如果这是事实，上述那种转移就是一种长远趋势的一部分，它源于客观的历史形势，从属于苏联的社会结构。客观的历史形势（也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权力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巩固之间的相互关系），迫使苏维埃国家重新考虑它的基本战略，采取“松动”政策，如果成功的话，就会有助于利用日益增长着的生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基本的经济趋势会产生一种相应的政治趋势，这就是压抑性的极权主义政权的自由化。

在苏联对西方的政策方面，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56年东欧的动乱，新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朗。在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印度与日本的党对一种“合法民主”纲领的信奉；西方共产党的“温和”战略，特别是（否定斯大林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的继续（甚至强化）。正是这种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领导也按照其中基本的政策概念作出反应。苏联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真正的第三种选择，在共处时期，这第三种选择被确定为与苏联结成一种牢固的联盟。因此，按照苏联的解释，东欧国家“防护地带”的打破，就等于是资本主义影响的上升，和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力量均衡的致命变化。而且，在苏联发生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为坚实基础的自由化时，东欧国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工业化还处于一种很落后的阶段，农民还没有与国有化经济及其政治制度有效地协调起来。因此，朝向“民族共产主义”的运动，被人们看做是客观上的不成熟和反社会主义，不管国家的领导者和他们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追随者有着怎样诚挚的主观意愿。

东欧的事件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减弱甚或扭转否定斯大林的倾向；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方面，一种相当“强硬化”的倾向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种基本倾向将在整个这样的逆转过程中继续存在和重新表现出来。至于苏联的内部发展方面，这在当前意味着“集体领导”的继续、秘密警察的权力下降、管理分散、法律改革、检查制度减弱、文化生活自由化。这种政策对长期社会—经济倾向的关系，可以由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的情况得到说明。“马林科夫路线”（Malenkov line）把斯大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行冲突的论述，解释为必然造成在两种主要部类生产之间的关系上改变为有利于第二部类，即消费品工业<sup>[22]</sup>，


尽管有斯大林的指令：第一部类“占优势的增长”必须仍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虽然转向第二部类优先的理论，直到1955年1月，才受到官方的驳斥，但1954年，在马林科夫政权下已公开发表与之对立的意见。



在苏联的科学中，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者和伪造者讨论的余地。有些经济学家……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导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扩大再生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求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不是优先发展第二部类的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sup>[23]</sup>

把党和苏联政府现实活动的实质，歪曲为过分地提高农业和增加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断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有效地扩大再生产，不必比消费者商品的生产更快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sup>[24]</sup>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来说是根本的，这不但是根据社会产品的内部增长而言的，而且具有国际意义。换句话说，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必须得到加强。



完成了党在战前五年计划中设计的工业化纲领，苏联人民为主动保卫国家建立了一种牢固的经济基础。一种强有力的重工业证明了苏联具有不可摧毁的防御力量基础。<sup>[25]</sup>

在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条件下，为了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党和政府必须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诚然，在各种说教争论的背后，可能还存在着一种最高官僚阶层为分享权力的斗争。无疑，生产上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转移，会包含着一种政治重心的相应转移：重工业方面的管理阶层的影响不能不下降。然而，政治斗争有一种更基本的内容；苏联社会似乎达到了它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苏联领导者自己确定了这个转折点：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前进不再要求在发展重工业或提高生活水平间进行选择，而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作为重工业发展的一个结果。归结到它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不是战备竞赛

或者满足大众需要的竞赛，而是二者的结合。选择还是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选择，不过现在被认为已由这个时期的成功超越了。

在这方面，看来马林科夫和他的对手已经取得一致。1955年10月，要求莫洛托夫（Molotov）收回他（1955年2月）的“错误”主张（认为只是奠定了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要求他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已经建立，承认一整个时期（他本人就被认为是属于这一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是，只有赫鲁晓夫才最简明地表述了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选择的社会经济原因。他在1953年9月发表的关于农业纲领的报告中说：



共产党坚持主张全面发展重工业，对于成功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是基本的方针，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解决这一直接的国民经济问题，基本的力量和手段也已向这方面转移。我们最好的干部担任了国家工业化的工作。我们过去不具有同时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手段。因为这要提供必需的先决条件。现在这些先决条件存在了。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巩固的集体农庄，和在经济建设各部门受过训练的干部。<sup>[26]</sup>

这是产生新倾向的内部原因：列宁主义的“文明化”纲领<sup>[27]</sup>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通过斯大林主义的建设，工业基础的建立已经强大到足以对付国际上的“突然事件”，并在苏联提高消费水平。在此以前不可能“同时”发展的东西，现在能做到了：在重工业继续“竭力发展”的同时，能使社会产品越来越多地涌向满足个别消费者的需要。

但是，如果说在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速和扩大消费品生产的决策，表明了超越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前进程度，那么它也表明，这一前进将被保持在“非对抗性”矛盾和行政调节的框架之内。换言之，凡是认为质的变化会达到过去阶段的那种爆发式“否定”的估计，都要受到坚决反对。改良和自由化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坚持斗争，取决于社会主义竞赛和工作与培训的全民总动员。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中的持续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苏联领导者的“强力的驱使”，而是根源于苏维埃国家发挥作用所处的客观条件，根源于列宁的政治遗嘱所集中概括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的“异常”形势。处于“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的

概念，排除了放弃对人民的全体总动员，也排除了社会主义自由服从劳苦和纪律这一价值体系中的根本变化。是苏维埃政府和党，将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这种经常重复的公式表述了基本的政策，即进步和自由化，“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作用，不是自由和“自下而上”发起的结果，而是利用一种发展的经济，由国家按照政治的（国内的和在国际的）需要进行调节的结果。可以证实坚持这种政策的决心的是，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仍然融合于工作和闲暇时私人或公共的一种受压抑的道德改良。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分析苏联道德的社会职能。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作为制度化的东西，是不是也会受到新倾向的重大影响呢？即使是极为踌躇的回答，也必须讨论两个首要的因素：经济—政治发展所达到的阶段，以及已经建立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的内在动因，虽然是有计划和被控制的，但也有它们自身的迫切需要和目的。只需就经济—政治因素方面的一种尝试性的回答，就可以在这一点上作出概略的叙述。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作为压抑性机器的国家的消失，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强为条件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强要继续到第二阶段。斯大林死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概念已经改变。尽管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时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错误公式”遭到了反驳<sup>[28]</sup>，尽管已经宣布并正在实施国家的“民主化”、权力分散和自治，但国家和党的机构的继续加强仍然列入了议事日程。<sup>[29]</sup>没有任何客观的因素或趋向（这是更为重要的）会允许这种改变。国际战略上的重定方向和相应的国内，特别是农业领域的重定方向，使得政权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问题，以致新的努力的成功似乎正要求来自上面的强化式的严密管辖。制度的缓和及其僵化同样需要有计划的控制。官僚和下层居民之间在特权和权力方面形成的鸿沟，仍然大得足以使官僚阶层自我长存。而且，对人民的教育和训练也使之适合于作为管理竞争主体的良好功能集团。按照这种学说本身，正是国家作为一种趋势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的性质，必须保持“直接生产者”与对生产资料控制的分离：社会的不自由再生产出政治上的不自由。我们已经提到的倾向是趋于缓和后者，但是只有当它作用于前者，或者，按斯大林的术语，只有当增长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真正解决，整个结构才会变化。这种矛盾的解决要推迟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仍然是与国际革命相联系的。在这方面，转向国家“消亡”的发端，与苏联领导不相干，这种转变依赖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打破及其对苏联社会的

影响。

国家持久的权力保持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缓和也许相当可观，个人的自由也可能随着经济利益的增长而增加，但是除非经济利益本身已经变为政治利益，就是说，除非经济利益已导致由“直接生产者”，或者由于自动化的进步由“直接消费者”控制生产，否则量就不会转变为质。只要这还不是事实，后斯大林主义的福利国家，将仍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直接继承。而只要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仍将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颂扬思想与现实、意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基础就反映在严格说来自由的意识形态中。精神发展的所有各种表现，摆脱了“必然王国”的盲目决定性，而趋向于自由发挥人道的个人才能。唯物主义通过这一点的实现而被取消；当经济进入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相互联系的个人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精神的发展也就从控制中获得解放。为生存而斗争和与自然斗争的必需品的合理调节，使得社会能够免除对其成员的本能和智力生活的调节。理性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在苏联社会里，对基础发展的控制，继续伴随着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控制，伴随着因征服必然而获得的“自由王国”的调节。正是在斯大林要求把工作日“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马克思视为自由的基本前提的一项措施）的那段文字里，他主张这种缩短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必需的闲暇时间，以便接受全面的教育。于是，获得的时间将不是自由的时间，它将花费在教育中。

的确，教育是解放的必要前提：只有那种学习和认识整个真理，把握人与自然被压抑、被侵犯和被损坏的潜能的自由，才能引导自由社会的建设。而斯大林设想的是什么类型的教育呢？他要求“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sup>[30]</sup>。

遵循这个纲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再一次全力强调“训练”，“在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训练专家”，并且号召“加强国家的科学机构与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具体要求相联系”<sup>[31]</sup>。职能的可交换性、制度化的劳动分工的消灭<sup>[32]</sup>，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的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为人的真正才能在物质生产过程之外得到全面发展的一种前提。但在斯大林的上下文中，马克思的思想似乎是指一个所有的人都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消灭劳动”<sup>[33]</sup>，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所有的人都将是他那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sup>[34]</sup>。把自由时间变成

进行多种工艺训练的受教育时间，工作精神被固定在人的本能结构中，这样，行政的控制就有了保障，过去也就可以安全地转入未来，于是斯大林就能安然无事地引证恩格斯关于劳动将由一种负担变为享受的论述。然而，这种享受在本质上是无异于压抑下所允许的享受的。

意识形态的观点相应于政治的观点。国家将继续进入共产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环境”也将同样进入共产主义。因为国家是国民经济的“共同主体”，它组织整个社会，而且这种组织已经成为超越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的客体化代表。由于社会生产是由国家系统地指导的，由于基本的决策是国家强加于社会的，因而进步本身，即为个人的需要和渴望利用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必须通过国家机构。于是行政管理的延续性就必须填补与自由的鸿沟，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化，而行政管理，如我们试图指出过的，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比以往更有效的增长和利用：它倾向于把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按照国内和国际水平上竞争效率的标准来实现工业化和合理化，以及使人发展成为物质与精神劳动前所未有的优秀运用工具，这就很可能产生经济的与政治的成果，即对各个特殊集团和个人的不同利益和意向的支配。

这一报偿将不是人支配人的结束，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对物的管理都不可能代替对人的管理。马克思曾强调技术在本质上的“中性”特征：尽管风车可以给你一种封建社会，蒸汽工场可以给你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但后者也可以给你另外一种形式的工业社会。近代机器既容许资本主义利用，也容许社会主义利用。也就是说，成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同样的技术基础，如何利用这种基础的历史的决定，乃是一种政治的决定。在共处时期，经济因素同时是政治因素；所谓它是一个政治的经济时期，不但是着眼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是着眼于意识发展的政治含义。下层的平民意识，满足于生产力的逐渐增长，和因高度机械性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效率，因而日益屈从于作出回报，这样一种意识只能达到机器本身的那种政治水平，因此阻碍了平民意识发展出可以指导政治变革的政治意识。

这里有两种对抗的社会制度加入技术进步的一般趋向。我们曾经指出（并将试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以苏联伦理哲学为例来论证这个概念），当今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多么的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归属于上升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主义精神”。苏维埃国家看来是要以一种整体化的、政治控制的形式，培养这种精神的有纪律的、自动的、竞赛性生产的因素。“企业化的管理”、管理者的首创精神和责任感，以及人和物的资源的科学的合理

利用，乃是整个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时期一贯的强制性要求<sup>[35]</sup>，在实行“强硬”与“缓和”的政策、个人领导与集体领导的时期，都是这样。“企业化的管理”也应用于重大的国际战略，应用于国外事务的处理。领导类型从职业革命家到管理者的转变（一种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而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的转变），现在看来是圆满完成了。1922年，列宁宣布宁要商人、贸易家、管理者，而不要那些不懂得如何搞贸易、做买卖和进行经营的忠于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怕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改变了。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sup>[36]</sup>

然而，20世纪井然有序的政治和高效率竞争的精神不再是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了。发达工业社会要求一种有差别的组织和有差别的行为。苏联社会，处于一个浓缩了全部发展阶段的“后来者”的地位，在一种共同的形势下遇到了它的对手。在控制人和自然的“原子”阶段，社会生产超越了传统的控制与利用形式。社会的内聚力不再允许经济力量和对它们的个别评估与预测自由地发挥作用；它们需要更有力的调节来补充。经济、文化与政治控制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国际现象，它超越了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在苏联，这种融合是一种公开宣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目标：正当苏联工业再次按照高效率工作的标准改进的时候，政府同时强调这个纲领要用加强共产党的“工业领导”来补充。<sup>[37]</sup>

要在一个自我长存的国家里，使这种经济和政治控制的融合发生分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在国有化而不是社会化的苏联经济中，在大规模国际化的国际现状中，这种融合有着双重的基础。国家的这种结构，在行政管理内部为许多变化留下了余地：最高统治可以从一个集团过渡到另一个集团，从以党为优势到以军队为优势，从“委员会统治”回到个人统治等等。但是，这些变化不会根本改变苏联社会的基础，也不会改变这个社会正在运动的基本方向。除非发生另一次世界战争或类似的灾难，可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否则只会向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把生活水准提高到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分配基本商品和服务、稳步地推广劳动的机械化、技术职能可以互相变换、普及大众文化，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大致的趋势。它很可能导致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逐步同化——纳入技术这一共同的标准之下。技术的进步将超脱早期阶段强加的压抑性限制——它们将变为技术上被废弃的东西。这将导致政治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它将有损于官僚及其特权的扩展，有利于最高阶层和下层平民间差距的缩小，有利于政治控制向技术控制的转变。即



使一个新的独裁者会把领导权集中到顶点，个人的统治也将日益被集体的管理所代替。制度内部的社会变动性将会增长。但是，这些变化本身将在普遍控制、普遍管理的结构内部发生。福利国家的发展会不会最终带来民众直接控制下的管理，也就是说，苏维埃国家会不会发展到一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主，对这个问题，现行的事实和趋势还没有提供一种可行的假设。从反面来看，在苏联社会的结构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排除这样一种长远的发展，它既不会依赖于苏联领导的某种“决策”，也不会单独依赖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内部形势。从我们的分析出发，要在苏联出现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决定于两个依次相关的主要前提：（1）社会财富达到的水平，有可能按照个人的需要组织生产，因而能够取消特权势力的特权；（2）国际形势中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再规定它们的经济和它们的政策。

我们已经提出，这样一种质的变化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sup>[38]</sup>：这里有着变化的技术—经济的基础。阻碍“社会主义民主”，即对生产和分配的“自下而上”控制的，不是停滞可怕的匮乏和贫困。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贫乏的分配和为取消它而一致进行的斗争，一开始，甚至在第一阶段，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内容。<sup>[39]</sup>在国有化经济的基础上，民主控制的建立仍然是一种政治的行动。这样，它就包括压抑性国家及其压抑性机器的废除——不一定通过国内战争采取暴力推翻的手段。但是，政治行动本身像是不依赖于第二个前提。正在发展的福利国家可以把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为安全，但只要东方—西方的冲突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它就排除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它可以用来为极权范围内（主观的和客观的）压抑性的竞争和竞争动员作辩护。苏联社会的历史似乎注定要与它的对手相联系。超越于一国和一种势力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建设之上的，似乎是社会主义所必要的国际因素占据优势。

但是在这一格局中，苏维埃国家未来的发展，是处于它所祈求的辩证法规律的作用之下的。绝不能把质的变化设想为一种自动的变化。不论技术进步和物质文化、劳动生产和效率的水平有多高，从社会主义的必然到社会主义的自由的变化只能是自觉努力和决策的结果。压抑性的生产关系的保持，使苏维埃国家能够用其普遍控制的工具，来管辖下层民众的意识。我们提出过，官僚阶层也许不具有一种既得利益，要使压抑性的国家机器永存。<sup>[40]</sup>但是，这并不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该制度的特定“合理性”，是否易于通过下层民众自身，并在下层民众自身中使压抑性永存，换句话说，来自上面的压抑是否与来自下面的压抑相符合。于是苏联的制度

就会重复和再现马克思归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过程的那种决定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那里，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要成为一种手段，以打破这种决定论，解放主体的因素，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我们曾试图指出，在苏联社会里，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这种职能。由于被统治者对于现存制度的“规定性的否定”，对于了解和实现它的被束缚的潜力，尚缺乏一种认识水平，因此，被统治者不仅易于服从统治者，而且易于在他们自身中再生产出他们的屈从性。再说，这个过程并不是苏联社会特有的。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手段和好处，由它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唤起的工作观和闲暇观，建立起了一种有助于基本价值观变化，有助于自由向安全转变的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转变反过来会阻碍一种“否定”的政治意识的发展，因而阻碍政治上质的变化。基本的价值体系，现行的社会“精神”，于是会呈现出一种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动作用。作为对这种因素的部分分析，本书第二部分将要考察苏联伦理哲学的主要结构。

### 注释

[1] *Lenin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2), pp. 367 and 369.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376、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ed. by Leo Gruliov (New York, F. A. Praeger, 1953), pp. 7 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3~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往下的讨论，see above, pp. 66 ff.

[3] 参见米高扬和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in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Stenograficheskiĭ otchet* (2 vols.;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6), I, 14-20, 319-321。

[4] 1953年第7期，译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 No. 20 (June 27, 1953), 3。

[5] See above, p. 65.

[6] “Za uprochenie mira mezhdū narodami,” *Kommunist*, 1955, No. 4 (March), p. 12.

[7] “Sud'by mira i tsivilizatsii reshaiut narody,” *Kommunist*, 1955, No. 4 (March), p. 12.

[8] *Ibid.*, p. 18.

[9] See above, pp. 76 f.

[10] See above, pp. 58 f.

[11]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p. 5.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中再次得到强调 (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 p. A-23)。

[12] “Anti-Dühring,” in *A Handbook of Maxrism*, ed. by E. Bur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 29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13]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p. 15.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Ts. A. Stepanian, “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 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ed. by F. Konstantinov (Moscow, Gospolitizdat, 1948), pp. 540-542.

[15] Stalin,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pp. 14 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89、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Ibid., p. 14.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Ibid., p. 19.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See above, pp. 65 ff.

[19]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u*, II, 434, 475, 480.

[20] Pages 116 ff. above.

[21] 苏联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国际格局中社会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潜能：西方社会的内部力量，最显著地表现在较高的生活水准和“阶级合作”上，按马克思的说法，这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来说，是比西方军事力量更大规模的一种威胁。

[22] 例子参见 A. N. Maslin, “Printsip material’noi zainteresovannosti prisotsializme,” *Voprosy Filosofii*, 1954, N. 4, pp. 3-14; 1955, No. 1, p. 15.

[23] M. T. Iovchuk, “Rol’ sotsialisticheskoi ideologii v bor’be s perezhitkami kapitalizma,” *Voprosy Filosofii*, 1955, No. 1, p. 15.

[24] I. Doroshev and A. Rumiantsev, “Protiv izvrashcheniia marksistskoi teorii vosproizvodstva,” *Kommunist*, 1955, No. 2 (January), p. 14.

[25] E. Frolov, “Tiazhelaia industriia — osnova ekonomicheskogo mogushchestva SSSR,” *Kommunist*, 1955, No. 3 (February), pp. 29 f. 又见同期第2版第22页。

[26]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 No. 39 (November 7, 1953), 11 f.

[27] See pp. 46 f. above.

[28]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June 30, 1956, in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ed. by Rus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290.

[29]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u*, I, 91 ff.

[30]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p. 14.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1956年5月25日塔斯社 (Tass) 广播的决议；*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u*, II, 480.

[32] 不是劳动分工本身，只是那种因生活而把劳动者束缚在一种专门的工作和职业上的分工方式。

[33] 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p. 49, 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5卷，6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4] Stepanian, “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 in *O sovetskoi sotsialisticheskoi obshchestve*, pp. 486 f.

[35] 比如见布哈林 1955 年 7 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II, No. 28 (August 24, 1955), 3-20, 以及 Zverev 在 1955 年 2 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in *ibid.*, VII, No. 6 (March 23, 1955), 19-20, and No. 7 (March 30, 1955), 8。

[36] “Report at the All-Russian Congress of the Metal Workers’ Union,” in *Selected Works* (12 vo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7-1938), IX, 31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see also p. 326.

[37] See Bulganin’s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July, 1955,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II, No. 28 (August 24, 1955), 18 ff.

[38] P. 185 above.

[39] P. 20 above.

[40] See pp. 109 ff. above.



苏 联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第二部分

# 伦理学原理



## 9. 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它们的历史关系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业已联系苏联社会的发展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倾向。这种分析导致了如下结论：工业化的各种特殊条件和目标是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抗性竞争中实现的，它们甚至决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绝大部分理论特征。与此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这两个相互对抗的体系之间又似乎显示出一种相互平行的趋向：总体工业化似乎有着十分近似的观念模式和组织模式，这些模式抹杀了根本性的政治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高效的“有条理的管理”往往推进了政治与文化的集中化和协同化。这种“有条理的管理”不独被高度合理化和集中化，也对同样合理化和协同化的人与技术产生着影响。在西方，这种倾向导致了对人道主义自由伦理学的侵蚀，这种伦理学是以自主的个人及其不可异化的权利这一观念为中心的。但大致说来，人们一直都在维持着这种源于早期的价值体系（自人们清算暗中颠覆这一价值体系的法西斯纳粹国家以来），尽管这种价值体系与现行实践的矛盾日趋明朗。在苏联，总体工业化是在各种与自由伦理学不相容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这个革命的国家 and 后革命的国家创造了它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以此灌输给广大民众。然而，凭借当代技术和工作方法所进行的总体工业化，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使得人们对那种在西方伦理学和苏联伦理学之间进行抽象对照的做法产生了疑问。

无论是集中化，还是协同化，本身都不会妨碍自由与人性的进步（它们不止一次曾是反对压迫与反动的斗争的有效武器）。在总体工业化的各种技术活动和经济活动中，也不存在任何必然会侵犯人的自由的东西。相反，如果说在 19 世纪哲学中马克思的与反马克思的对工业社会的评价还存在共同点的话，那么，这个共同点就在于：两方面都坚持认为，不断增长的工业化不仅是物质意义上而且也是伦理学意义上进步的先决条件。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都表示反对人的“异化”，都是针对工业的政治组织而言的<sup>[1]</sup>，而不



是针对工业本身而言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然不是指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认工业的政治组织中的这种共同因素并不难，这种共同因素影响自由的进步，即它导致了人为其劳动所奴役的结果，使人屈从于他自己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e）劳动。不过，在历史上，这种屈从曾有过殊为不同的作用：它可以开创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崭新阶段，或是延滞一个陈旧的时期；它既可以促进这种发展，也可以窒息这种发展。所以工业的政治组织本身并不能说明苏联伦理学的特殊内容及其与西方伦理学的关系。

我们建议通过对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各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来探讨这一问题。这种比较假定：双方各有一套可以辨别的伦理学理论，各自的同质性足以使我们将它们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就苏联伦理学而言，这一假定似乎可以成立：通观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苏联诸种伦理学理论所发生的全部变化，都受一种统一化原则的支配，即各种伦理标准都是按照苏联国家的目标来构成和评价的。而且，就这些目标本身而言，也一直是由在共处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长远政策所决定的<sup>[2]</sup>，尽管它们都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却一直保持着它们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但是，我们能否对西方伦理学与此相对的同质性也作类似看待呢？情况似乎恰好相反。如果我们看一看苏联在讨论西方伦理学时所集中探讨并提出批评和重新解释的那些伦理标准和观念，就会发现西方伦理学特点中所显示的某些一般特征，它们是：

（1）自由的概念得到公认；根据这一概念，人最根本的条件是他充分地摆脱外在决定的束缚，自由地作出自我负责的行为，并成为自由的行为者。

（2）这种本质的自由使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命题发生效力，而且尽管有个人的偶然性境况和偶然性目的，这种效力也可以为人们观察到。

（3）伦理意义上的个人合法目的是这样一些目的：它们包含着个人才能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和满足，但个人的自我实现应服从于普遍有效的基督教伦理规范及其人道主义的世俗化，服从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团体与政治团体的较为具体的特殊规范。

（4）这两套规范须得到上帝或“人的本性”的认可；必须维护和完善社会团体与国家团体的各种要求的认可。

（5）尽管有终极的道德认可，这里仍有一种假定，即在个人道德一方与公共（社会的和政治的）道德一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冲突。<sup>[3]</sup>这就是说，在西方（工业的）文明国家里，基本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被认为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这种方式是：个人的目标（上述第3点）和他的本质

(上述第 1、2 点)可以在现存社会制度内部得到实现,或者至少被合理地追求。这些制度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改进,它们的这种改进甚至意味着大规模的变化。然而,人们一般都不把这些变化视为对现存社会的否定,而视为该社会的壮大和发展。

最后一个命题陈述了西方伦理学所隐藏的历史标准:它的先决条件是,在文明最终建立的各种制度和关系之构架内部,人可以实现其“本性”,即人可以展开其各种潜在性,满足他的各种需要。对于唯心主义伦理学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伦理学来说,这种先决条件都是共同的,对那些已为法国理性主义者、英国功利主义者、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圣西门及其追随者们所详细阐述过的诸种理论来说,这种先决条件也是共同的。但是,18 和 19 世纪的政治与工业革命并非西方伦理学的唯一源泉,它的道德实质深深根植于基督教传统。自从基督教伦理学不再是一种“反面的”伦理学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它为国家所采纳以来,各种有代表性的伦理哲学就把认定现存文明与人的各种潜能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的道德斥为异端。当然,人的自救和赎罪并不在今生今世,但今生今世不仅不排除他的自救,而且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行为也是他得以自救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sup>[4]</sup>从有代表性的西方伦理学观点来看,所有不接受这种先决条件的哲学,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不仅是异端邪说,而且也是非道德的,如果说不是反道德的话。因为,这种不接受意味着拒斥道德原则普遍有效性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即意味着拒斥道德原则实现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许多“异端”哲学仍以多种形式生存下来了。从基督教早期的各种诺斯蒂学派(Gnostic Schools)\*、净化派和其他一些激进的宗教流派,到近代的各种革命性社会哲学家都是如此。对于所有这些哲学来说,共同的一点是它们都承诺着一段具有崭新性质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又必然冲破既定的体制,以便能实现人的真正命运;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它们在社会下层和“边缘”阶层的民众中所拥有的吸引力(而且还在于它们可以为形形色色的政治“名流”和知识“名流”所接受)。它们的道德具有一种不同的历史标准,因而表现出对现行道德的否定。但与此同时,这些“异端邪说”也要求保持,甚至履行为其正统对手所维护的那些原则和许诺:中世纪的净化派就曾要求成为真正的基督教;而宗教改革中各激进教派也把自己作为真正的新

\* 基督教早期异端教派之一,主张灵知直觉论,含古希腊及古东方哲学中的某些思想因素。——译者注

教代表。近代期间，那些不断世俗化的反对派也是在人道主义传统内继续发展起来的。16世纪那些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启蒙时期的极左翼及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后嗣们，也都按照人道主义的理想来证明他们的“破坏性”哲学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是同一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视为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者时，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自由、平等和正义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关键技术术语，该书的经济理论不只是在一种编年史的意义上，更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846）和《经济学哲学手稿》（*The Economic-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1844）<sup>[5]</sup>的人道主义哲学为先导的，而且也是这两部著作的人道主义哲学的完成。

以上概述虽然过于简单，但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之间的历史关系。苏联伦理学所受的主要影响，并不是来自外部和反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其动力亦不是来自苏联伦理学的特殊内容，即来自“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苏联伦理学将它所代表的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建立在马克思理论的历史使命之基础上，但马克思的理论却没有独立的伦理学，它只是要求证实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实现。依马克思所见，资本主义的经济乃是这种伦理学法典的厄运和否认，而废除这种经济乃是这种伦理学发展的先决条件。苏联哲学的历史根基并不异于西方哲学（无论它们与东方哲学传统的融合多么密切，也不论它们多么适用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它们基本上也不是为权力和宣传的要求所规定的。它们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那种人道主义理想的革命公式；源于它用来发挥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和竞争的新的社会作用。不论前者与后者的矛盾多么深刻（本书的第一部分曾试图表明这种矛盾的深刻程度），但它们的关系之密切，仍是以能够运用前者的理想来捍卫后者的现实。导致对这种理想的滥用和褻渎的各种力量与环境，似乎比那些纯粹权力政治的力量与环境更为客观一些，其客观性程度甚至达到了可以轻易地将其描述为历史理性的作用。在此构架内，苏联的伦理哲学是一种内在一贯的合理的价值体系，它足以与那些吸引苏联统治之外众多人口的自身利益的政治伎俩分离开来。

这种吸引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论证，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业已把人道主义伦理学从资本主义的曲解中挽救出来。我们可以将这种论证概述如下：

在西方世界里，人们一直都受着基督教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教育。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与这种精神相一致的，并使这种精神更

充分更普遍的实现成为可能，特别是使人的自由、平等以及各种人的潜能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其工业时代，西方文明确实聚集了具体实施这种观念所必需的全部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然而，现存的社会体制却阻碍了这种观念的实施，因为这些体制维持着非正义、剥削和压抑。其结果是：为了履行西方文明的许诺，就必须消灭它们。

这一论证一直都被人们以各种非常大众化的公式并在各种各样的曲解、说服和证明的层次上加以宣扬，使之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规定如下：（1）这种论证从一种明确可信而又易于确认的原因，即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中，推导出人们对文明的普遍不满；（2）它不是凭借任何外在的和先验的标准来批判这种社会，而是凭借那些业已公布并为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标准（“人道主义价值观”）来批判这种社会；（3）因此，它不仅在物质基础上，而且也在伦理学基础上解释并证明了这种不满与反抗的正当性；（4）它提供了一种抉择，这种抉择也不是被描述为一种外在的抽象可能性，而正是现行社会的各种许诺和可能性的实现。

最后一点似乎表明了这种感召的主要力量，即伦理箴言与科学的客观性的结合。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苏联伦理学要求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上，把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普遍利益乃至人类的普遍利益统一为一个整体。此外，苏联的伦理哲学宣称能够证实那种唯一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和一种人道的存在观念、行为和实践。这种实践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这就是说，它在一种共同事业的基础上，把个人与某一社会团体统一起来，通过这种共同事业，个人的特殊关切将由群体来承担。

因此，苏联伦理学主张把各种生活观念与生活领域结合在一起，而在西方伦理学中，这些东西却是支离破碎的。依西方伦理学来看，人是在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成为他自己的，这种环境与一种自由而道德的存在相容，至少它并未妨碍这一目的的实现。然而，在现实中，生活的各种条件却原来更多的是限制性的和敌对性的条件；而且人们所经历的毋宁说是与一种伦理人格的发展相敌对的环境。因此，这种经验就不得被贬值和被重新作出解释：“内在的人”与其外在存在被迫分离，对伦理人格的规定则包括（甚至必然产生）抛弃、痛苦和压抑。这种激励着西方伦理学的张力表明（同时也证明了），在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智力财富与它们对个人需要的适用性之间、在自我决定的要求与现实强加于这种决定的各种限制之间、在本质上的平等与仍然盛行的人反对人的非人性之间，以及在正义的理想与非正义的实践之

间，存在着一种经验的对立。对道德所认可和表达的理想的那些实际限制，似乎削弱了西方伦理学的那些主要概念，而且，这些限制似乎也使人的存在面临各种忠诚与价值相互冲突的颠簸起伏的困境（神性的法与人性的法、自然法与成文法、个人福利与共同福利、私人价值与公共价值、家庭准则与社会准则等）。与此相反，苏联伦理学似乎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即把道德价值与实践价值统一起来，而西方伦理学却无法完成这种统一，也不想完成这种统一。因为，它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紧张状态视为道德行为的一种先决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对自由价值和安全感价值所给予的不同强调，来说明它们两者之间的这种对比。

西方的自由观念是通过各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实现的，这些制度可以使个人成为自我负责的他的命运的设计师。他的存在是他自己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他自己在与其他具有同等条件的个人之自由竞争中的表现。按照这种哲学，自由的制度化保护措施（法规、公民权利、财产保护），必须让个人在他存在的大量领域里去自作主张。但随着经济过程日渐复杂而又无法预测，又超出了普通个人的控制范围，并依赖于一种超个人的力量和过程的整体安置，这些领域往往会成为不安全的领域。这时候，经济领域的自由也就为整个就业范围实际上的“封闭性”所取消，为规定的行为模式之严格性所取消，为所要求的工作表现的规范化所取消；或者说，这种自由就会含有一种绝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冒险（失业的冒险、“落后”的冒险、成为局外人的冒险，如此等等）。这些对自由的侵犯，表现为各种合理的和技术性的过程——它们绝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和所作所为，而是后工业社会里劳动分工的副产品（也许甚至是其条件），而就此而言，也是所谓效率与进步的标志。这样，自由的价值本身似乎就成了问题。在现实中（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不一定），自由被重新规定，它不再意味着成为人的生活之自我负责的设计师，也不再指人成为自己各种潜能及其实现的自我负责的设计师。相反，自由却成了那种抬高个人主义社会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一直意指的那种东西，即让个人的“本性”自由屈服于那种能够来做被法律所禁止或不触犯法律的事情的公民自由，或者是承认合法化的不自由。但是，这却是一种安全。自由的标准从自律的个人转移到了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法律，而这些法律又支配着社会。自由的标准逐渐消失在支配着经济、共同福利、国家和各联邦的法律之中。然而当人们以为个人在这种绝对至上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内部获得安全时，他们的“真正的”自由却仍然源于那种“内在的”存在，甚至依旧只能由这种“内在的”自由所构成（信仰、思想、宗教等的自由）。因此，当

实际存在中对安全的追求胜过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甚至是以自由为代价来追求的时候，自由与安全便相互冲突了——而只有通过减弱独立的因素和自主的因素，才能将这种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为安全的价值而牺牲这些因素，才能将这种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由于整个西方伦理学的意识形态传统都把人想象成为自由的主人和立法者，所以它阻碍了这种趋势；在经济必然性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在一切传统的对立中表现出来，但它只能以更为精明的解脱方式，来消除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这一意识形态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阻止对放弃个人自由的认可，并抵制总体的协调；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冲突仍旧是人们公开承认的一种存在状态，而且控制这种冲突乃是一种伦理任务。但是，这一任务的完成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

苏联伦理学许诺，通过支持苏维埃国家来消除自由的“否定”方面，可以解决这一冲突。也就是说，苏维埃国家可以消除这样一些方面，即个人自行其是，尽管他个人的设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很不适当。在苏联，那种对教育、训练和职业的选择，关心自己和赡养老人的自由，以及阅读、写作和倾听各种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言论之权利统统被减少或被废除了，而且苏联伦理学也为这种政策辩护。在这些方面，各种传统的自由都屈从于对就业的严密管辖，对运动、保健、审查等的控制。合法的非自由领域被大大扩展了；在人存在的一些领域，公开而巧妙地迫使人们放弃个人“本性的”自由。而在西方，这些领域向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各种目标的范围内，这种对传统自由的压抑却呈现出一种“肯定的”作用。苏联的伦理哲学将这种作用解释为真正自由的准备。在苏联伦理学中，各种传统的自由之所以得以被安然贬值，是因为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在绝大多数民众真正获得经济保障，即获得满足的自由之前，并且除非如此，否则，那些传统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自由，甚至只是虚幻而已。

依马克思之见，只有当人们不再为其劳动所奴役时，人才能获得摆脱需求意志的独立性。换言之，政治与精神的自由以摆脱为生活之必需而进行日常斗争的自由为先决条件，而后者又是以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马克思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恰恰是在经济不再是人的“命运”的情况下，人才不再是经济的主体；这就是说，经济不再是一种决定性因素，而它本身是被决定的，即为相互联合的个体合理地加以控制。在马克思看来，在经济自由还只是为“求生”（谋生）而不断斗争的自由竞争这种情况下，经济自由

乃是真正自由的否定，因为它实际上迫使人花费其全部时间和精力去获取生活的各种必需品——花费在“异化劳动”中。而且就自由个人的概念仍含有自由经济主体的意味而言，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由的概念。因为，只要“经济”还是一个“异化劳动”的领域，它就不可能是个人自由的领域。也就是说，在仍然发生为生存而进行竞争性斗争的全部必然性领域，“经济”不可能是个人自由的领域。在这一领域进入联合个体合理的集体控制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就不再是自由个体的本质了，同样，那些作为经济自由的工具和补充的自由也不再是必要的了。到那时候，以前隶属于私人个体的大部分和决定性部分的权利，也就成了一种社会的关切。而且，如果这种必然性领域不是被纳入联合个体的合理控制，而是被纳入附加于个体之上的国家的合理控制的话，那么，在此领域的个人权利同样也成了国家的关切。

随着个体不断改变其社会作用，自由观念本身也不断变化。在“自由经济”不再存在的地方，西方的个人就不再是一种实在，甚至也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他和他的自由一起被重新塑造和重新规定。那么，组织和指导作为自由之先决条件的各种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也就成了社会主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这些必需品还不用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所有的人又都是自由的，那么，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国家就很可能僭取这种组织和指导，并同时僭取对个体的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的立法。因为无论怎样受到保护，私人存在仍然是对公共存在的“否定”，只是普遍的个别部分。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国家控制着必然性领域，同时也控制着个人的意向、目标和个体的价值。系统地减少内在存在与外在存在、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中的生命要素），一直是苏联社会和苏联伦理哲学的基本作用之一。内在的和私人的价值被外在化，这就是说，人在一切事物中，都表现为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

### 注释

[1] “政治的”与“社会的”相区别，它指称一种工业的组织和利用，这种工业组织和利用并不由个人的能力和需要决定，而由那些与个人能力和需要的自由发展相冲突的特殊利益所决定。在此条件下，虽然生产也满足了一种“社会的需要”，但后者却是被附加给个人需要并按照占支配地位的特殊利益来塑造个人利益的。

[2] See Chapter 4 of this study.

[3] 尽管肯定存在（并应当有）实际紧张和差异。

[4] 加尔文主义的学说亦无例外。“善功”和各种优点与基督教意义上的道德行为并不同一。

[5] 后一部著作尚无可供使用的英文全译本。该书的全部本文最先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第 3 卷, 第 1 分册上 (Berlin, Marx-Engels Verlag, 1932)。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没有适用的英译本, 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手稿。



## 10. 苏联伦理学——价值的外在化



价值的外在化是苏联伦理学的一个普遍特点。它是国家化（nationalization）的伴随物和必然结果，并享有国家化的功能和内容。尽管废除私有制只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但也影响到作为一种实存性范畴的私有财产。<sup>[1]</sup>如果私有财产不再被视为个体赖以肯定自己的工具，不再被视为他的自我相对于其他自我的表现和化身的话，那么，整个个体的私我领域（这种个体的私我领域历来就浸透着私有财产的价值观）就会成为外在化的，它也就成了社会的合法关切。对于西方伦理学来说，这种外在化的影响在这样两个领域里尤其令人厌恶，这两个领域被视为个体本身的圣殿和储主，它们就是思想和良心的私我、家庭的私我。根据西方的观念，自由在这两个领域里也许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里都更具一种私我的功能，而私我又是与财产相联结的——这就是个人得以合法地构成为拥有一个他自己的王国的制度。思想和良心的自由要求摆脱那种对属于个体而不属于国家和社会的事务的干涉。个体的各种思想和感情以及它们的表现都是“他自己的”<sup>[2]</sup>，他要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和良心来利用和指导它们；他不仅要遵守普遍的标准，更要“占用”它们并使它们成为他自己的（道德）立法。

在这里，西方概念的历史尺度又一次凸显。自由的思想私我在近代社会时期已呈现了一种无条件权利的尊严，在这一时期，各种被认为是人的存在的真理之观念都已显现为与那些为各种公共权威，特别是为国家所颁定和所代表的真理是相对抗的，因为这些观念对于各种公共权威来说不是有用的和自明的。这就足以使人们回忆起这样一个事实，即“思想自由”乃是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专制主义斗争中的一种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出现的。即使在今天，凡是这种权利已在西方民主中坚实地制度化了的地方，它的价值就只是在紧急境况下才得以触动，因为在这些紧急境况下，独裁的团体和政策侵犯了私我。相反，在私人思想与公共意识形态或私人良心与公共道德之间不

存在真实冲突的地方。思想和良心的自由似乎就不是作为一种为人们经验到的个体存在所依赖的本质价值——似乎它也没有一种本质的内容。在最为极端的情况下，私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被“消解于”完全的协同之中：个体私下的所想、所感和所估，也就是“公共舆论”中的所想、所感和所估，并表现在各种公共政策和公共意见之中（它们不一定由政府发布，而是由一些公共舆论的领袖、志向远大的“英雄”和模范以普遍教育的形式发布，或由占支配性的娱乐形式发布）。这种协同可以通过恐怖、通过“大众文化”的规范化倾向而建立起来，或者是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而建立起来。如果这种协同是通过恐怖来完成的，那么，个体和社会所花的代价也就大得多，其代价差异很可能就是生死之别。然而，在这种协同过程的最终，假如并且只有当一致趋同已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对各种价值等级的影响才趋于相同：个体的思想和良心自由似乎正在丧失其独立的和无条件的价值，并渐渐淹没在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的一体化中。数代人之后，如果这种政体的效力依旧如故，那么压抑性就可能通过扩展到全社会之中、扩展到所有物质的和智力的文化部分而得以减轻。当私我和内在自由不再具有明确的经验内容时，它的废除也就不再具有压迫的性质，这种压迫性质仍存留于西方的价值等级之中。

由于私我的“社会化”，自由的中心也就从作为一个私我个人的个体转移到了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体上了。苏维埃国家所代表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sup>[3]</sup>，不仅规定自由的价值，而且也规定自由的价值的范围，换言之，自由成了政治目标的工具。

苏联伦理学的工具化并不排除对动机的考虑，也不取消道德上的“性格”概念。相反，我们将看到，动机和性格本身已服从于客观的社会评价，即苏联社会的具体历史状况及其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并规定特定的动机和特定的性格是合乎道德的。对于其他一切伦理价值来说也发生着同样的转移：它们均被诉诸一种新的普遍尺度，而且正是这种共同尺度给予苏联伦理学合理的内在一致性和一贯性。只有在个体以其行动和思想促进社会所树立的目标与价值的情况下，他的行动和思想才是“有道德的”。在此意义上，伦理价值“外在于”任何特殊的个体行动和思想，后者只是达到属于社会伦理目标的工具。然而，苏联伦理学一方面在本质上是工具主义的，另一方面却又建立在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基础之上。这种历史观规定共产主义道德具有超越工具主义的特殊作用。

列宁在1920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对共

产主义道德的作用作了权威性规定<sup>[4]</sup>：（1）否定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前资产阶级的）道德，这就是说，摒弃一切建立在先验的（宗教的）认可和（或者）“唯心主义”命题之上的伦理价值和伦理原则（列宁并未对这两种伦理学作任何实质性区别）。（2）确认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整个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这种道德的各项原则都应从这种斗争的要求和目标中推导出来。必须注意的是，对这种共产主义道德的阐发并不排除对“资产阶级”伦理价值的“吸收”，如果而且只有当它们与这种阶级斗争各阶段的需要相吻合的话。还必须注意的是，根据列宁的观点，共产主义道德的这种公开的“工具主义”特点（在阶级斗争中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指向一个将会超越实用主义层次的目标：这种道德的目的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内容，列宁谈道：“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sup>[5]</sup>列宁的定义表明，除开阶级斗争和在阶级斗争之外，不存在任何特殊的伦理价值（这是共产主义道德历史地位的一种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他的定义还指明了这些价值随后将得以具体化的方向。“团结和纪律”使共产主义道德集中体现为斯大林主义时期那种严格的工作道德，同时又强调自觉斗争（列宁的演讲通篇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揭示了苏联伦理学强烈的“理智主义”特点：学习、训练、对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技术文化知识系统而有方法的占用被作为建设共产主义最首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这方面，苏联的伦理哲学也堪称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自由的获得，换言之，人的实现，乃是建立在知识和理性基础之上的。

列宁朴素而粗陋的共产主义道德定义是以一种复杂的历史辩证法为前提的，这种历史辩证法要使这些伦理学由相对有效的王国上升到绝对有效的王国。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总体解放和普遍解放的阶段）将会取消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特点，使这种工具成为目的本身。

苏联伦理学的工具主义特点历来都是西方批判的主要靶子，而这种批判又一直集中在“目的证明手段之正当”的原则上——这一原则被视为本身就是非伦理的原则。然而，苏联伦理学的目的又超出了工具主义，因而这种按照手段一目的关系来进行的批判就失去了靶子。苏联伦理学的超实用主义倾向源自苏联工具主义的特殊特征。

根据苏联哲学来看，为苏联伦理学提供普遍尺度的社会为两个本质特征所规定（本书第一部分对这两种特征予以了更详尽的讨论）：（1）它被设想成

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这种方式是：它已经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各种人的才能之自由发展和实现建立了种种先在条件（通过废除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控制，并因之通过废除剥削和阶级正义）。（2）由于“落后”和“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环境，这些自由的条件还没有充分地利用各个个体的直接利益。压迫、匮乏和生产力的非生产性使用（军工生产）仍然盛行（它是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区别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标志）。因此，自由的条件仍然还是先在条件：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尚不自由的个体的持续奋斗。

这样两个社会概念的相互关系给予苏联工具主义以特殊的动力。第一个（肯定的）概念提供了一套客观的伦理标准，这就是说，提供了那些隶属于一种充分发展了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标准。这些标准恢复了西方文明的传统理想——自由、公正、个体的全面发展——并凝结成这样一个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公式重新确立了个体作为伦理规范的最终依据之地位：凡促进个体自由发展的东西都是善的。这一规范所固有的极端相对主义被假设为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而摆脱了各种有害的意蕴：普遍意志将与所有个体的意志契合；各种需要和能力的的不平等只有在这种不平等不再包含以他人为代价而求一人之发展的时候，才能成为一种绝对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前程似锦的结果赋予了苏联伦理学以普遍有效和客观规范的尊严，并在团结与合作的原则中达到了顶点。工具主义在伦理绝对主义中寿终正寝；党派偏见和阶级道德被宣布为实现人性的纯粹手段（尽管是唯一的历史手段）。这样一来，这些未来的标准便与苏联社会的实际境况联系起来，但它们却保留了其“超越的”意蕴，也就是说，保留了一种未来的憧憬，这种未来将给个体现在的苦难和挫折以补偿。在这里，苏联伦理学包含一个“安全阀”：未来的憧憬似乎履行着一种与西方伦理学的超越因素相符的功能——在这种憧憬中，我们似乎有了一种能真正取代宗教的苏维埃。然而，却有一种本质的差异，苏联伦理学正是从这种差异中推导出它的许多要求的。苏联伦理学的超越目标乃是一种历史的超越目标，而通向这一目标实现的道路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种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发展的结果。人的最终实现和满足不是定向于“内在自我”或彼世，而是定向于社会实际发展的“下一阶段”。而且，这一概念的真理也不是个信念问题，而是一个对必然性的科学分析和推理的问题。<sup>[6]</sup>

毫无疑问，对于苏联伦理学来说，这一官方的论证极有助于证明压抑性政体的正当性，这种政体可以把这种论证用作使现状永存的意识形态面纱。然则，凡适合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利用的东西<sup>[7]</sup>，也同样可以适用于

它的伦理哲学：一俟它成为个体心理结构和行为结构的一个本质部分，一俟它成为社会凝聚和整合的一种因素，它就产生它自己的强大力量并有力地推动自身。唯有作为这样一种因素而不是作为苏联领导的一种目标，才能把苏联伦理学置于本书的考察之中。基于客观历史必然性，这一主张使苏联伦理学具有一种极端的严格性，也极大地增加了它的范围和强度。恰恰是因为它与一种绝对的目的有关，并在此意义上“外在于”任何特定的个体之行动和立场，苏联伦理学才把一切违反或妨碍历史必然性的行为和立场都视为是非道德的。因此，人的存在的许多领域——在西方传统中，这些领域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也服从于道德评价，比如说科学追求领域和艺术追求领域。一种科学理论，尽管它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得到证实，但如若它被认为是有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则它也可能遭到谴责。认识论上的真理概念（理论理性）和道德的善的概念（实践理性）往往会融为一体——正如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审美真理往往会和认识论真理融为一体一样。<sup>[8]</sup>它们的融合以政治为中介，因为这种政治中介既协调着历来相互分离的个人的存在领域，也协调着反映这种分离的各种价值。而且，苏联伦理学新的历史基础也必然使它把道德判断应用于私人方面的“中性”领域——也是通过政治的中介。对“阶级敌人”的爱在道德上是应当谴责的，因为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尤其是如果它是一种真正的爱的关系的话。因为这时候它介入了整个个体存在，而不单是他存在的“私我”部分，因此它就影响到与他人的关系、与工作的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因而，就伦理标准毕竟适用它来说，同样的政治标准也适用它——不存在任何双重的道德。苏联伦理学是一种政治工具主义，但这样一来，政治领域与其是其他什么领域，而毋宁就是人的实现的领域。

伦理学的政治化贯穿西方哲学的始终。在柏拉图和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自律都屈从于（或者毋宁是被转变成为）理想国的自律，即国家的自律。而且在这两位思想家那里，结论都不是相对主义的实用主义，而是绝对主义。如果说，“善的理念”要求在城邦中实现或完成自身的话，那么，这种善就只有在政治生命（*bios politicos*）中才是可以获得的；而城邦也就体现了绝对的伦理标准。它体现这些标准——这意味着城邦并非最终的善本身。然而，对于人的存在之实现来说，道德的善是以政治的善为先决前提的，而后者则是依照使人的实现（和他的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本质的实质）具有最大可能的那些资源、制度和关系来规定的。根据这种概念，伦理冲突不是（道德的）个体与（反道德的）城邦之间的冲突；亦非两种相互抵牾的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是城邦中的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之间的冲突。苏格拉底（*Socra-*

tes) 所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权利反对城邦的权利, 而是正确的城邦反对错误的城邦。令人疑虑的不是私我的思想和良心的自由, 而是政治思想和政治良心, 即真正有问题的是已为苏格拉底和他的审判官所共同接受了城邦。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 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 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真理都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真实的秩序的认识。因此, 伦理真理即政治真理, 而政治真理乃是绝对真理。从本质上看,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存有同样的概念, 它对意识形态的处理尤其如此。我们也已说明, 苏联对智力文化的陈述, 甚至在这些陈述的系统表述中, 都使人回忆起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 和《法律篇》(Laws)。<sup>[9]</sup>

只要人道主义的价值, 特别是自由尚未变为现实, 它们的内容本身就仍然服从于它们能够赖以变为现实的那些条件。这种转变乃是一种政治的转变, 因为它牵涉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而不仅仅是牵涉到私人个体。因此, 自由的实现在下述两重意义上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1) 它意味着某一既定社会的转变; (2) 这种转变依赖于各种历史条件。在这两个基础上, 自由的实现都是以那些与历史真理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动(理论与实践)为先决条件的, 即以那些与客观理性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动为先决条件。这样一来, 这种理论和实践, 而不是对孤立个体的自由的保持, 就成了基本的伦理使命和伦理价值。而对“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的证实, 对客观理性的确认, 可以求助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或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种体系绝不是相互对立的哲学两极, 它们都蕴涵着把自由过渡性地纳入历史必然性和政治必然性之中, 即纳入客观理性之中。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存在着这种共同的基础。我们已经指出过,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念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概念之诠释的重新表述: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按照已被认识的必然性而行动。<sup>[10]</sup> 恩格斯的这种诠释是否表达了黑格尔概念的真实含义, 是颇值得疑问的。不过,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 私人的自由领域被消融于国家和法律的公共领域, 主观权利被消融于客观真理之中, 这确乎是真实无疑的。人们常常评论, 在除此而外包罗万象的黑格尔体系中, 唯独没有任何特殊的“伦理学”学科。而造成独立的伦理哲学“消失”和私人伦理价值消解的力量, 正是历史。

这就是伦理学政治化的关键点所在, 它产生于西方传统, 并巩固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既是这种西方传统的后继, 也是它的敌手;

\* 一译《国家篇》。——译者注

既是这种传统的完成，又是它的否定。西方文明自身的进步历程就是把自在价值转变成为外在价值，把主观观念转变成为客观实在，把伦理学转变成政治学。如果说，黑格尔是按照历史来解释理性的话，那么，他也就是用一种唯心主义的公式，预演了从马克思的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历史的过程已经为理性（黑格尔主张）在社会组织（马克思主张）中的实现，以及为自由与必然的融合创造了各种先决条件，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然而，这种与必然性的融合（甚至是为必然性所吸收）的自由并非自由的最后形式。在这一终极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也是一致的。真正的自由王国乃是超出必然性王国之外的。自由和必然性都得重新予以规定。对于黑格尔来说，最终的自由寓于绝对的精神王国。对于马克思来说，必然王国将被这样一种社会所掌握：该社会的再生产已服从于个体的控制，自由就是在必要劳动王国之外自由发挥个人的各种才能。自由被限定于自由时间，但自由时间在数量和质量上是生活的内容本身。而且，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客观规律所支配的历史过程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而产生了作为自由之条件的合理组织的社会主义。因之，历史的必然性使伦理学转变为政治学，而对历史必然性的洞见又把政治学安置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赋予政治学以一种客观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苏联伦理哲学本身就表现为正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面，表现为反对理性消灭者的理性的主人。这种对资产阶级伦理学的攻击是以代表“被背叛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资格来进行的。

这种反对资产阶级伦理学的斗争对苏联社会哲学愈是至关重要，这两者间似乎愈是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资产阶级哲学中的那些进步的和批判性的倾向已成为这种攻击的主要靶子，而对它们的主要控诉则认为它们使理性畸形化了。尼采（Nietzsche）和弗洛伊德（Freud）、叔本华（Schopenhauer）和杜威（Dewey）、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通通被贴上了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标签，而且也因此缘故而被划归为“反革命的”、“非道德的”和“帝国主义的”。依照苏联的解释，它必然如此——在它们的客观历史作用上必然如此，不论各个哲学家的个人意向和信念可能如何。因为，任何对已被历史地超越了的资产阶级社会价值观的妥协退让，任何否认已被历史地确定了的进步方向和人把握这种方向之能力的客观有效性的企图，在这种概念看来都是对一种业已过时的社会制度的辩护。

在此，我们无须遵循这种批判的路径走下去了：我们只是试图说明它所运用的那种方法（这种方法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使这种批判具有合理依据的方法大致相同）。这一方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假定其对手的

观念和目標的有效性，并照样接受这些观念和目標，然后再来表明它们在这些对手所操作的理論框架和社会框架内部，这些观念和目標都是无法实现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哲学及其社会背叛和败坏了这些观念与目標，或使它们成了一种虛幻。就伦理哲学而言，苏联所批判的两个主要目标是：（1）当代西方伦理学为达到把握个体的具体存在境况并从这种境况中推导出为了实现自由和理性的进步之概念性工具和实践工具的努力；（2）力求给予伦理学一种科学的（逻辑的或实验的）基础之企图。根据苏联的批判，资产阶级的伦理学理論家们不仅无法达到这些目标，而且在努力达到这些目标时，这些目标却在被变成它们的对立面。只要进步的资产阶级伦理学仍在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工作，它所维护的就只能是妨碍进步的力量。因此，这种哲学否认包含着消灭资本主义的理性和自由的更高历史阶段，当它自己宣称是合理的和具体的时，它恰恰是非理性的和抽象的：它保留一种陈旧过时的理性定义，忽略了（或抽去了）自由的具体历史条件。从这一立场来看，进步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即使在它批判既定社会时也是倒退性的。但苏联伦理学愈是强烈地摒弃西方哲学，后者就愈具有批判性。因为，按照苏联的观点，资产阶级对当今社会的这种批判，一方面指出了它的压抑性特征，另一方面却转移了反对这种压抑原因的斗争。这种哲学的科学手段和行头被称为是偽造的，它们起着模糊人们的注意并使之避开真实问题的作用，即使人们不去注意资本主义制度的停滞和破坏性。我们将通过苏联对杜威实用主义的讨论来说明这种解释。

在马克思和杜威对理論之于实践的重新定向之间，似乎有一种密切的亲缘关系。然而，苏联的批判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不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是相互对立的。正如谢丽娅（Shariia）所系统阐述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是有用即真理，而是真理即有用”<sup>[11]</sup>。这一阐述涉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该书中，列宁已经陈述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践只有在它本身源于真知和真识的情况下，才是真理的标准<sup>[12]</sup>，而且只有当它是唯一能够认识真理和履行真理的社会群体（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那种实践时，才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的理論与实践的统一，是以一种客观的、甚至是“绝对的”真理存在为先决前提的，它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得到证实（比如说，关于某一社会的各种潜在性和前景的真理，以及关于自由和“发展”的潜在性与前景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内容是历史的，而且它的可接近性和实现也是历史的。但这些相对性因素乃是客观现实的特征和关于这一现实之客观真理的特征。根据列宁的观点，辩证法“包括”相对



主义，但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相对的只是“接近”和实现客观真理的历史条件。<sup>[13]</sup>如果把这种观点应用于道德，它就不仅允许人们把某些假设性的无条件道德原则作为对客观真理的意识形态歪曲而予以摒弃，而且还会允许人们接受某些独立于阶级内容之外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sup>[14]</sup>。自从抛弃了20世纪早期的那种道德放任主义以来，苏联伦理哲学便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论点并不妨碍伦理规范的有效性，虽然根据马克思的论点，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因为无论社会存在的历史形态是多么不同，对于一切文明化社会形式来说，某些基本关系和行为模式却是共同的，而且它们表现在适用于所有人（不论阶级）的某些普遍的“伦理行为规则”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原则之普遍有效性的坚持，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观点十分类似；它把这种论证应用于捍卫形式逻辑，反对把形式逻辑消融于辩证逻辑的企图<sup>[15]</sup>，同时也反对那种阶级语言学说。

这些意识形态倾向表现出一种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苏联国家丧失了它独一无二的革命立场，享有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那种组织化特征和行为模式特征。在这一阶段，长远的合理化、效率和可预测性便成了首要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而在伦理学中对客观真理的强调，则属于按照苏联社会新阶段来建设意识形态的最近努力。但后者\*同时也要求坚持如下主张，即唯有苏联社会才走在实现这些客观真理的正确的历史道路上。因此，苏联伦理学的客观原则具有一种双重的特点，它们主张：（1）诉诸适用任何文明化社会形式的道德原则；（2）坚持唯一能实现真正自由和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第一个观点出发，苏联的道德哲学攻击了所有被贴上准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标签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因为这些伦理学否认普遍的道德原则，而赞同那些诸如生命、权力意志、爱情等反道德的力量。第二种观点则是攻击杜威的核心所在。

对“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的攻击尤其能够说明问题，因为它揭示了苏联的合理性和西方的合理性所共有的特性，即认为技术因素优于人道主义因素。叔本华和尼采、形形色色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流派、存在主义和深层心理学，在最本质的方面都各执千秋，甚至于相互冲突；然而，它们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相似，即它们都打破了现代文明的技术合理性。它们通过指出在这种合理性之下的各种精神力量和生物性力量，以及这种合理性要求人所作的无法弥补的牺牲，来打破这种合理性。结果是，它们以一种新

\* 指苏联社会新阶段之意识形态。——译者注

的价值评价来打破进步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不是通过浪漫主义的和情感的倒退来作如此评价的，而是通过打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被禁忌的领域来作此评价的。这种新的价值评价（transvaluation）正是依赖于苏联社会所必然不惜一切代价来加以保护的那些价值进行的。这些价值是：竞争性工作、社会必要劳动、自我维持的劳动纪律、被延迟的和压抑性的幸福等伦理价值。因此，在与“资产阶级价值”的斗争中，苏联马克思主义无法承认和接受“资产阶级阵营”本身对这些价值所进行的毁灭性批判；相反，它不得不通过孤立和嘲笑资产阶级哲学（明显的）倒退方面来否认这些批判。

但它对杜威的攻击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向。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承认任何将资产阶级社会判定为历史过时的客观评价，他克服资产阶级伦理学之意识形态局限的努力，就必定会终止于因循传统的相对主义。杜威以存在境况的无限多样性和经验、渴求的无限多样性，以及认为每个人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种种潜在性因而具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论据，来反对伦理理想主义者们的非科学的绝对主义。然而，根据苏联的批判，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实在的伦理评价的基础。只有在把各种境况和目标的多样性统一起来的社会，才能有自由“发展”的真实可能性，这种多样性也才能提供这种基础。于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在“日益衰落的”资产阶级社会恰恰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除非在一些边缘情况下，或以牺牲其他可能性为代价。由于杜威拒绝超越这一社会而进入其“客观的”历史未来，因此也就使得他克服一种因循传统的伦理相对主义的种种努力徒劳了。诚然，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排除社会变化和社会改革：他认为，社会的变化和改革都是通过真正而充实的知识教育而得到促进的，这种知识又将指导社会的逐步改革。然而，根据苏联的批判，这一纲领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社会无法允许一种可能导向该社会毁灭的知识教育措施和知识权利。这一情况迫使杜威的哲学偷偷地接受了（也许甚至是与杜威本人的意向背道而驰的）普遍盛行于既定社会的各种标准和目标。这也就宣判了杜威想把伦理学建立在一种科学基础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使杜威的各种命题得以证实的参照框架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但这种框架本身仍需要“证实”。由于缺少这种超越的证实（这种证实可能表明这种框架是错误的），使杜威的“行动科学”只不过是社会上普遍盛行的行为所作的一种描述（甚至是一种辩护）。由于实用主义拒绝把科学的方法扩展到历史的未来——这种扩展是可以通过对现存社会之基本倾向的分析而接近科学的，所以也就把实用主义限制在一种纯粹的“是然”（what is）描述上。<sup>[16]</sup>

## 注释

[1] 黑格尔的《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 par. 41 ff., especially par 46) 概述了这一意识形态, 根据这一意识形态, 对于“自由个人”的实现来说, 私有财产仍是本质性的。然而, 大多数在根本立场上极为不同的思想家在关于人类个人与私有财产之间的这种本质性联系问题上所达到的一致程度确实令人瞩目。对此, 我们可以回忆几种最为著名的陈述: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II. II. qu. 66a. 1, 2) 说, 人应该拥有财产, 这不仅是“合法的”, 也是“必要的”。关于物的使用, 他谈道: “人具有一种对外在物质的天然支配权, 因为他凭借其理性和意志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来利用它们, 仿佛它们是为他而创造的一样。”(Dominican Fathers of the English Province 译)

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Of Civil Government*, Second Treatise, chap. III, par. 26) 说: “每个人都具有他自己的‘人格’财产……我们可以说, 他肉体的‘劳动’和他双手的‘工作’恰恰就是他的。这样, 不论他从自然拥有所提供的状态和留在这一状态中的东西中移动什么, 他都已经使他的劳动与某种是他的东西混融一体并与其结合在一起了, 因之也就使它成为了他的财产。”

黑格尔(《法哲学》, par. 41) 说: “为了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充分发展而又独立的有机体, 他为其自由而寻找或创造某一外在的领域乃是必要的……财产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其对需求的满足, 而在于其纯粹人格主体性的扬弃。正是在财产中, 个人最初才作为理性而存在。”

[2] 一个“自然个人”乃是一个“其语言和行动都被视为他自己的人”(Hobbes, *Leviathan*, Chap. XVI)。

[3] 在本书第一部分, 我们已经强调了,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 “社会”被塑造成为一种独立的或至少是分离的超出个体成员或在个体成员之上的力量。在此, 把“社会”作为一切伦理价值的新起源, 我们指的是社会的具体化, 事实上与(民族)国家处延相同。

[4] *Sochineniia* (Works) (3d ed., 30 vols.; Moscow, Institut Lenina, 1928-1937), XXX, 403-417. 参见《列宁全集》, 中文2版, 第39卷, 302~312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5] *Ibid.*, XXX, 413. 参见《列宁全集》, 中文2版, 第39卷, 306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6] 诚然, 进步的意识形态使现有的剥削、苦难和压抑合理化, 为它们最终消失的预先条件, 它也是西方资产阶级传统所固有的——事实上, 它甚至还从这种传统中“吸收了”某些东西。然而, 有两个事实构成了决定性的差异: (1) 信仰科学技术进步的宗教从来就没有被认可为人道主义发展的公开目标和表现。最接近于这种哲学的思想流派(例如, 西门的思想)总是被视为值得怀疑的和“异端的”。(2) 同样道理, 西方伦理学也拒绝接受(技术的)进步和伦理学之间的直接一致。在此, 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冲

突) 本身也一直是一种道德的主要动力。

[7] See Part I of this study.

[8] See pp. 132 f. above.

[9] See p. 132 above.

[10] See p. 152 above.

[11] P. Sharii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kommunisticheskoi morali*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1), p. 220.

[12] *Sochineniia* (Works), Ⅷ, 112-117.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39~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 *Ibid.*, Ⅷ, 107-11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4] Sharii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kommunisticheskoi morali*, chap. Ⅷ. See also pp. 63 f.

[15] 在1950—1951年的逻辑讨论中即是如此；see Part I of this study, pp. 148 f. above.

[16] Sharii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kommunisticheskoi morali*, pp. 24, 85 f., 223.

## 11. 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根据苏联对其伦理学观点的解释，我们应该预料到道德哲学的两个层次：其一规定“独立于阶级内容之外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其二则表明这些原则的表现及其在“共产主义道德”中的特殊实现。然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有关前者的系统解释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充足的有代表性的材料。当然，缺乏对“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的系统推导，乃是伦理学政治化所固有的：道德价值愈是成为政治价值，道德行为便愈是成为正当的政治行为，因之给独立的伦理原则所留下的地盘便愈小，或者毋宁说，给这些伦理原则的客观有效性所留下的地盘就愈小。尽管如此，苏联伦理学还是主张，就苏联社会的特殊目标而言，其客观有效性是与人类的普遍利益亦即实现所有人的自由的利益是相吻合的。但这也是“资产阶级伦理学”的要求。从形式上来看，苏联道德哲学所设想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将因此而与那些对抗面所设想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普遍有效的原则往往与那些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原则相融合。在苏联伦理学情景内部，前者从后者获得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后者又反过来根据苏联社会的发展来加以规定。因此，现在我们将按照这些原则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来讨论这些原则。从第一步起，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道德原则以及“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伦理学的那些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苏联宪法在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告中似乎抄袭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一样，苏联关于伦理原则的宣言也是如此。无须强调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仿效和吸收的事实已客观存在。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制度之世界一历史性共存规定了它们的政治态势，也规定了它们伦理学的社会作用。

通过列举苏联伦理哲学中所规定的最高道德价值，我们很难发现单个道德观念或道德观念的综合因素不是与西方伦理学共同的。关心、责任、爱、

爱国主义、勤奋、诚实、勤劳、反对侵害同胞幸福的禁令、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在这一价值目录中，无一不为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所包含。如果我们看一下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原则<sup>[1]</sup>，这种相似性仍然处处皆是。列宁在1920年所阐发的价值等级几乎被逐字逐句地重复，而附加于这一价值等级之上的道德规范简直就只是对已充分而牢固地确立了的苏联国家境况的重新阐释。苏联的爱国主义，苏联国家的民族自豪、国际团结、民族团结和个体团结，对社会主义财产的尊重，热爱社会主义劳动，对社会主义家庭和对党的爱、忠诚和责任——为了能够评价这些常规概念的实际作用，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置于苏联伦理学给予其解释的具体情景之中。通过讨论各种工作关系、婚姻和家庭问题、闲暇活动和教育，以及通过它们在文学和娱乐业中的表现，便可提供这种情景。各种道德都汇聚于使快乐服从于义务这一点上——这便是使一切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党、服务于社会的义务。如果把这种义务转变成私人道德，这就意味着针对生育和儿童抚养的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在既定的职能分工中遵守纪律并参与竞赛，以及把闲暇活动视作从工作中解脱出来的休息和对工作能量的再创造，而不是把它看做一种自在的目的。这种竞赛性劳动道德的每一方面都是以一种超资产阶级道德的严格性而公布的，而且是根据苏联国家的特殊利益而被软化或硬化的（例如，在处理不合法年龄的儿童时，这种道德就被软化了，或者是，如果这种严格性与政治忠诚、劳动效率、党的纪律等发生冲突，它就被软化了；而在惩罚盗窃或“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时，它就被硬化了）。

意在“强化共产主义道德”<sup>[2]</sup>最具代表性的告诫完全集中在劳动道德上。支配着这一道德的“最高原则”被说成是苏联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爱，它们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原则可以证明完全把劳动认定为个体全部生命之内容的正当性。劳动本身不仅是光荣的和荣耀的，而且，“社会主义的竞赛”也是一项无条件的义务，它具有一种创造性的特点，任何贬低体力劳动的做法都有害于共产主义教育。在苏联社会里，“热爱本职工作”本身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原则之一，而工作本身也被宣布为培养道德品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鉴于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对各种工作方式和工作领域的这种道德平等化，对于规定苏联伦理学的实际作用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在作为实现人的潜能的工作和作为“异化劳动”的工作之间作了本质的区分，整个物质生产领域和各种机械化与标准化操作领域被视为异化的领域之一。根据这种区分，自由的实现

被归属于与现行劳动根本不同的社会劳动组织，被诉诸这样一种社会，在该社会里，作为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和一种社会的“生命需要”，而作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它也不再构成个人的劳动日和职业。归根结底，正是异化的消灭对于马克思来说规定并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文明的“更高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又反过来规定着一种崭新的人的存在：这种崭新的人的存在的内容和价值将由自由时间所决定，而不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就是说，人只有走出并“超越”整个单纯生活必需品的物质生产领域，才能进入他自身。生产的社会化将把花费在这一领域上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到最低限度，使时间和精力最大限度地用于个体在自由王国的需要之发展和满足。

与这一思想相对照，苏联的劳动道德并不承认异化劳动与非异化劳动在价值方面的任何差异：个体应该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他自己所找到或当局所安排的任何工作之中。正是对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劳动之间的这种决定性差异的抹杀，使苏联马克思主义能够宣称苏联的社会制度将使那种与西方社会不健全的个体相反的全面个体得到充分的发展。<sup>[3]</sup>但是，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运用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建设，唯一表明的却只是马克思概念与苏联概念之间的对峙：在后者中，个体的充分发展乃是全面劳动者的充分发展，是指个人将其个体性投入到他的劳动之中。据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特点本身业已改变”；结果，“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按照他的能力而为人民的和他自己的利益工作”。但在这一公式中，却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东西，只要各尽所能的工作仍然还是“必然性王国”内的工作，也就是说，只要它还不是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

苏联宣布和实行的那种重要的松动，也没有消除技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的混溶，即劳动生产率与伦理学、效率与幸福之间的混溶，在反对人民精神上的资本主义影响残余这一陈旧口号之下，一切反对各种自由化倾向的系统斗争仍在继续，因为这些自由化倾向可能会危及这一政权的目标。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因素的残存与“资本主义环境”的继续存在联系起来。它指责各种西方势力正企图使那些在苏联国家内部仍有根基的残余势力沉渣泛起。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斗争主要是对于国内政策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抵制包含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之中的松懈的危险。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和扩大一支训练有素、技术精良而又遵守纪律的劳动大军。因此，反对过去遗产的斗争就与早期资本主义自身反对前资本主义的价值和观念的斗争颇为相似。<sup>[4]</sup>

这种意识形态的再教育仍然集中于对待工作的“社会主义”态度上，而不是集中于那种被认为是具有剥削社会中的劳动者之特征并只适合于剥削社会中的劳动者的那种否定性态度。使劳动者与其劳动得到肯定性的统一的要求，无情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压力，在各个领域都依然如故。按照苏联的说法，这种压力似乎是成功的：



在培养这种新的劳动态度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竞赛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第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无报酬劳动）在内战岁月里诞生，到国家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风暴旅，再到工业革命中先锋队的群众运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竞赛发展的主要阶段。如果说，“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参与者们还只是工人的先锋群体的话；那么，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和风暴旅运动则已经包括了更多的参与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人了，而他们中间的革新先锋队成员则在不断增长着。<sup>[5]</sup>

斯达汉诺夫运动被说成是为“人格的全面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运动。<sup>[6]</sup>正如国家的强化应该先于国家的消亡一样，苦役的强化也应先于苦役的废除。

依据定义，在苏联社会中不存在任何异化劳动，因此生产是国家化的。但是，国家化并不排除异化。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社会财富的尺度，后者就依然存在。

“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sup>[7]</sup>

在苏联伦理学中，对异化的否认可能首先表现为仅仅是一种诡谲的抽象理论化；然而，从更深入的分析来看，它暴露出苏联伦理学的具体实质。在取消适应于苏联社会的异化概念时，苏联伦理学也就把道德的基础从对一种压抑性社会劳动组织的反抗中排除了，而且也使道德的结构和个人的特点适应于这种组织。为苏联国家服务的劳动本身就是道德的——它是苏联人的真



正使命。个人的需求和渴望被加以严格规定，克己奉公和吃苦耐劳是通向自救的道路。引导人们走向自由新生活的理论和实践被变成了为更有生产力的、更紧张的和更合理的劳动方式而培养人的工具。加尔文教的劳动道德所达到的东西，使人们对永远隐秘的神的决定，充满了非理性焦虑，但在苏联伦理学这里，是通过更合理的手段获得的：一种更能令人满足的人的存在应该是对日益增长着的劳动生产率的报偿。在这两种情形下，远为有效的经济力量和物质力量保证着它们的有效性。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两种伦理学在历史的“同时代性”的共同基础上相遇了——它们都反映出把广大“落后”民众融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之中的需要，反映出创造一种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劳动力的需要，使它们能够赋予周而复始的工作日制度以伦理的认可，更合理地生产出不断增长的财富，同时又以“条件”为借口进一步推延把这些财富合理地用于个体的需求。在此意义上，苏联伦理学证实了苏联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基础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确立起来的。

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中，斯大林主义时期是工业化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列宁在其最后著作中大致勾勒的意义上的“工业文明”时期。<sup>[8]</sup>这一时期深远的主要目标便是“赶上”和超过发达西方国家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的出发点处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落后状态来看，这一时期可能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对应，即与“原始积累”完成以后的阶段相对应。

然而，“后来者”居上的有利地位、生产资料的国家化、集中计划和极权控制，都使得苏联国家有可能缩短工业化的好几个阶段，有可能利用最合理化了的技术和机器，以及先进的科学和最强有力的工作方法，而又免于受到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的严重障碍。苏联伦理学系统阐述了原始工业化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它也同时表现了后来阶段的不同的（甚至是与之冲突的）要求。苏联伦理学必须把对劳动阶级的“原始”惩戒的需要与个体首创性和责任的需要结合起来，即把人作为工具的规范化顺从与人作为机械师的理理想象结合起来。它必须培育一种既有益于较长工作日，又有益于一种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既有助于操作数量，又有助于操作质量的道德。限制着苏联工业化的种种落后条件已经遇到了发达的技术条件（如同18世纪的工业化遇到了20世纪的工业主义一样），在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学中都是如此。管理上的绝对主义面临着民主西方有效的立宪主义，一个拥有特权的极权官僚阶层必须得到完善和更新，并保持敞开大门让下面的人升上来。这不仅是扩大生产机构的范围与提高效率所要求的，也是与西方世界的能力和现实进行公开竞争所要求的。对下层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补偿和物质补偿是不可或缺

的——这不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且也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们都隶属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长远的苏联政策的支柱。<sup>[9]</sup>

苏联伦理学试图把经济和政治需要的这种多样性统一起来，并想把它变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道德价值体系。因此，人们发现，对个体首创性和自发性的提倡与极权主义的纪律告诫，对斯达汉诺夫式竞赛的规劝与社会主义平等的规劝，以劳动为荣与以闲暇为荣，以苦役为荣与以自由为荣，以极权主义价值为上与以民主价值为上，等等，都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苏联的社会哲学反映着苏联社会所固有的客观历史矛盾的全部内容——这一矛盾是由下述事实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已被打造成为一种支配工具，它被应用于一个面对远为先进得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落后国家。“赶上”资本主义的需要呼唤着人们强化并加速工业化，以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附属于这一道路之目的的人道主义价值，被礼教化为意识形态，而附属于这种手段的价值，即总体工业化的价值，则成了真正的支配性价值观。（在本书第一部分里<sup>[10]</sup>，我们推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并非完全难以预测的将来，苏联势力范围之外——也许甚至在其内部——现有的共产党组织，有可能成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继承者。在这里，我们似乎切中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鲜明的平行关系。目的退让了，手段成了一切。手段之和便是“运动”本身。它融进了目标的价值之中，并为后者所装饰，而“运动”本身却又推延了这些目标之价值的实现。这难道不是自爱德华·伯恩斯坦以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含蓄地或公开地主张的那种哲学吗？）因之，社会主义道德屈从于工业道德，而后者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又被浓缩成一个包容一切的单元，并将加尔文教伦理学与新教，启蒙派的绝对主义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中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苏联伦理学所表现的那种奇怪的综合特征。

在这一综合特征内，压抑性因素是占支配性的。在学校和家庭中、在工作 and 闲暇时、在私下场合和公共场所，许多行为规则与它们传统的西方早期的摹本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都具有那种证明“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精神”所隐含的世俗说教味道。它们与清教从善立功的劝告也相去不远。那种对一夫一妻制的赞美，和对婚姻之恋的快乐与义务的赞美，都使人回想起古典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对私人领域的消解则反映着 20 世纪的现实。反对嫖娼、淫乱和离婚的斗争要求有与西方相同的伦理规范，而对出生率的要求和在劳动竞赛中保持旺盛精力的要求，则被赞美为“性爱”的表现。诚然，对于这种把性爱关系与有功劳动表现结合起来的公开说教不该过于认真，因

为其间明显地存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嘲笑和反抗，也明显地是对个人生活的广泛僭犯。决定性的因素乃是总的倾向，个体对其个人关系的自我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上所欲求的评价相一致。

最近，情况有了广泛的松动，但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的道德。这种倾向似乎是趋于常规化，而不是废除压抑。按照后工业文明中普遍盛行的各种倾向来看，压抑乃是由被压抑的“个体”所“自发地”再生产的；这种压抑可以容忍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压抑有所松弛。民众和官方对于使爱从属于劳动道德的异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说明。这些异议都是严格的反自由放任的，它们强调，爱、责任、家庭道德甚至是幸福，都是对国家的义务。

对爱的主题的过低评价，已经把我们许多电影人物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忽略了许多广泛而基本的重要社会问题。恰恰是在爱、家庭和日常生存这些问题上最有可能出现落后，因为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并不直接是某一较大群体中的一部分。常常发生的情形是：一个人在其工作中似乎是先进的——他既是一位斯达汉诺夫主义者，又是团体中的一位积极分子，但是，在其家庭里，他却要实行一种严格的家长制，其态度利己而粗暴，或者是毫无思想而又不负责任。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种情况迟早会影响他的全部工作和公共生活，以及他的各个道德方面。切莫遗忘私生活领域。有必要动员一切影视手段，包括喜剧和讽刺剧这样一些形式，以幽默去鞭笞、以烈火去焚烧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不但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如此，而且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亦如此。<sup>[11]</sup>

因此，这种异议是按照苏联的纪律要求而为苏联国家服务的。新的性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要重新肯定性爱关系的自主性，反对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工作关系和“大团体”的价值——实际上宣告了使前者更加和谐地适应于后者的需要。爱将成为一种必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王国的自由之反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规律调节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人们承认这种价值规律也支配着个体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曾经引用过的一位妇女在“第二次集体农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最为赤裸地表达了这一点<sup>[12]</sup>：



两年前，我没有新郎，也没有嫁妆！现在我已有500个劳动日，而结果是：我无法使自己免受可能成为求婚者的那些人的纠缠，他们说想和我结婚。但现在我可得慢慢瞧一瞧，再作出选择。

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混溶，无疑不是苏联伦理学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否以劳动日或用股票、保险金、不动产来计算“嫁妆”，显然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这种混溶被视为是反道德的，并且是为意识形态的承诺所掩盖的。在苏联伦理学中，这种“意识形态的面纱”却要薄得多，几乎就不存在。爱和工作效率被极好地糅合在一起。爱情的社会条件是按照觉悟水平和政治规定来加以说明的。这是对西方伦理学的冲击，而这种损失的确是巨大的：它影响到西方文化最为珍贵的形象和理想。正如沃尔逊（Wolfson）所指出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本身业已过时，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给悲剧性冲突留下任何余地，这些悲剧性冲突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社会条件阻碍着恋人的结合、他们的联姻和组成家庭。<sup>[13]</sup>

这段粗略的话却揭示了较为深刻的东西。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当然有赖于“阻碍这两位恋人结合的社会条件”，正如崔斯坦和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唐·璜（Don Juan）、波瓦利夫人（Madame Bovary）、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故事一样。但是，这些社会条件不仅规定了这种不幸，也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幸福，因为它们创造了爱情成为其所是的尺度：爱情是一种个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与公共国家相对抗的，而且爱情正是从这种对抗之中吸取其全部的快乐和痛苦。如果说崔斯坦和伊索德、罗密欧和朱丽叶，以及类似他们这样的恋人，要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美满的婚姻是不可想象的话，那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由社会规定的）“非生产性”乃是他们所代表和为之献身的价值之根本性质——只有在处于压抑性社会群体及其规则之外并与之相反对的一种存在中，这些价值才能获得实现。这种爱情愈是遵守它自己的法则，它就愈会威胁到社会团体的法则。西方文明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冲突，而且使之成为其伦理学的一种必要因素。法则与法则相对抗，价值与价值相对抗——不存在任何关于何种法则将会盛行的道德决定。两种价值体系和两种伦理学比肩而立，各执一方，互不相让。这种双重道德不仅属于

\* “Tristan and Isolde”系德国歌剧家瓦格纳（Wagner）所创作的一出歌剧的剧名和主人公。——译者注

性爱的忠诚——这是为西方伦理学所称颂的，也隶属于当群体与群体发生冲突、事业与事业相抵牾、传统与传统相冲撞时的其他忠诚。安提戈涅（Antigone）反对希瑞（Creon）是对的，正如希瑞反对安提戈涅是对的一样。革命反对现状是对的，一如现状反对革命一样。通过保持冲突各方自身的权利，双重道德便证明了僭越严格限制性社会秩序的个体渴望和群体渴望的正当性，双重道德的终结将意味着整个文明时期的终结。

随着性爱危险区域为国家所征服，对个体需要的社会控制也将完成。在人的自身本能中，可能树起了阻挡自己解放的有力障碍。如果当第二阶段由于社会生产按需分配而达到时，这些需要本身就将是这样一些需要，即它们将“自发地”使其政治管理永久化。只要公共国家不是为其成员和公民所共有，私人道德与政治道德及公共国家的和谐关系就一定是压抑性的。它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或许是伦理学上的一种较高等度的合理性，例如，通过减少或避免冲突、精神病和私人或个人的不幸所达到的合理性。假如幸福并不意味着一种心理贫乏和精神贫乏状态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这种和谐关系在极权主义管理构架内获得成功，它只会在受管制的社会需求之上附加一种决定性的尺度，即性爱需求的尺度。和谐的爱情关系的发展可能成为正隐约显现于地平线上的“消费科学”的一部分。S. G. 斯特鲁米林（S. G. Strumilin）在1950年6月的经济研究院大会上对此作了一个非常坦率的简述：



在谈论按需分配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地规定所涉及的各种需求。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需求乃是受到良好教育和文化修养的人们的需求，他们不会滥用他们获得消费品的机会。现在，一种消费科学已经创立起来了。在苏联，已经有了一个营养协会，它专门研究饮食的合理规范。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民的要求都将是极为多样、极为个体化的，但在一般水平上，必须有一个趋于固定规范的重心，这些固定规范将完全满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们的种种需求。<sup>[1]</sup>

#### 注释

[1] 又见 N. I. Boldyrev, *V. I. Lenin i I. V. Stalin o vospitanii kommunisticheskoi morali* (Moscow, Pravda, 1951)。

[2] “Neustanno vospityvat’ sovetskikh liudei v dukhe kommunisticheskoi morali,” *Kommunist*, 1954, No. 13 (September), pp. 3-12.

[3] Igor’ Semenovich Kon, *Razvitie lichnosti pri sotsializme*, (Leningrad, Vsesoiuznoe obshchestvo po rasprostraneniuiu politicheskikh i nauchnykh znaniu, 1954), pp. 3 ff.

[4] M. M. Rozenta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1), p. 303.

[5] G. Glezerman, “Tvorcheskaia rol’ narodnykh mass v razvitii sotsialisticheskogo obshchestva,” *Kommunist*, 1955, No. 3 (February), p. 48. 在一篇关于 “Recent Trends in Soviet Labour Policy” 的论文中 (载 *Monthly Labour Review*, 七月号, 1956), 格里克斯曼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 即 “斯达汉诺夫运动经过了修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迅速进步的结果, 强调的重心已由 “体力奋斗、创个人标兵和破纪录转移到了探索带来技术进步的新方法和对这些方法的掌握与普及” (p. 6)。然而, 无论这种修改可能是多么重要, 它都无法改变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异化劳动现代化的功能。

[6] Ts. A. Stepanian, “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 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e obshchestve*, ed. by .F. konstantinov (Moscow, Gospolitizdat, 1948), p. 502.

[7]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Dietz, 1953), p. 5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46 卷 (下), 22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8] See pp. 48 f. in Part I of this study.

[9] See pp. 114, 187 f. above.

[10] See pp. 73 f.

[11] M. Shmarova, “On Those Who Do Not Love to Talk About Love,”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 No. 18 (June 13, 1953), 译自 *Sovetskoe Iskusstvo*, (May 6, 1953)。又见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 No. 25 (August 1, 1953), 17 f.

[12] 依据 S. Wolfson, in *Changing Attitudes in Soviet Russia: The Family in The U. S. S. R.*, ed. by Rudolf Schlesing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9), p. 292 (引自 Wolfson’s *Socialism and the Family*)。

[13] *Ibid.*, p. 300.

[14] *Voprosy Ekonomiki*, 1950, No. 10, 译载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III, No. 2 (February 24, 1951), 7。

## 12. 伦理学与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伦理哲学的某些最有意义的特征，早在斯大林时期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压抑而又僵化的道德通常与放荡不羁的 20 世纪形成尖锐的对比，在 20 世纪，性道德实际上而且是合法地自由到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闻的程度。这种对比已得到部分证明：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曾有过殊为不同的伦理价值，也有过殊为不同的政治价值。然而，正如两个时期共同具有在一个国家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某些长远目标一样，它们也因此共享着某种道德的政治因素。科隆泰（Kollontai）被视为革命的性道德之有代表性的发言人，她在怀孕和婴儿哺养中看到了一种“生产劳动”方式，并把娼妓划归为“这种生产劳动的逃兵”<sup>[1]</sup>。

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对抗——科隆泰把这种对抗视为资产阶级伦理学的特征，在她的伦理哲学中，要用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主义道德无法产生的“社会感情”来调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集体”已经成了一种“排除任何孤独和自我封闭的家庭细胞的存在之可能性”的现实<sup>[2]</sup>。但是，在这一时刻，新的道德就已是一种劳动集体的道德，而不是一种自由个体之团体的道德。那时候生产率或“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一样，都是那种既支配个人关系、也支配社会关系的伦理价值。

“生产力”或“生产性的”这一术语的伦理内涵，自“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以来便既指称物质产量，也指称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能满足一种社会需求。马克思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着的生产力和贫困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关联，他仅就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一点而保留“生产性的”这一概念，并把所有其他劳动方式，包括独立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称为“非生产性的”，以此表明了生产率这一概念的压抑性特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之间、社会生产率与个体生产率之间的这种脱节，只要社会生产尚未被其劳动生产社会财富的那些个人集体地加以控

制，它就仍将存在。只要缺少这种生产方式上的革命，这种脱节就将保持下去：对社会和国家是好的，不一定对个人是好的。基于同样道理，只要国家仍然是一种附加的独立力量，个人关系若不按照国家的压抑性需求重新塑造，就无法消解在国家之中，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婴儿的出生量确实具有与机械工具产量相同意义的生产性，而且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也就具有跟能干的工厂工人相同意义上的“善”。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个体道德对生产力发展的从属地位，由于苏联伦理学的种种变化而大大加强，即被30年代早期那种僵化而又具惩罚性的极权主义道德的恢复而加强了。广为人知和正好可以回忆起来的事实是：婚姻法和离婚法的严格化、对家庭及家庭责任的重新强调、对“生产性的”性关系的赞扬，以及权威主义教育的重新引进等等。然而，业已改变的与其是苏联伦理学的哲学内容，而毋宁是它的社会背景，即工业化的水平和范围，以及工业化得以在内部发生的国际框架。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长期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竞争，而“资本主义稳定化的终结”并没有产生“革命潮流的高涨”：前景似乎只是孤立和冲突，而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国际蔓延。<sup>[3]</sup>伦理学中权威主义的重新确立明显是控制普遍加紧的一部分，即是为了战争、苦役和惩戒而作的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说消除自由主义伦理学是属于初级工业化的要求的话，那么，反对这些伦理学的斗争又为什么随着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仍在创立了工业基础之后继续进行呢？当然，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政策也得到了清算：对以前弃绝了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这些方法是：严格加强劳动纪律、延长工作日、“科学管理”、实行董事权威、计件工资和奖金制、竞争利润制）的使用，已经使苏联经济得以将工业发展的好几个阶段“缩短”到20年时间。然而，苏维埃制度就像其摹本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推进的，这种意义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不断的合理化成了保持这种制度运行的内在机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环境”的继续存在和战备式经济的维持，也使得这种对个体需求的集中化控制能够自我推进，虽然这种推进的节律可能松弛。苏联伦理学证实了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财富一方与对苦役和放弃自我的社会需求一方之间的冲突。利用前一方面去满足个体的需求和增强个体的自由之可能性愈大，对于在不削弱这一制度的驱动力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矛盾的需求也就愈大。随着工业化进步和与西方的经济竞争的更加迫切，恐怖也变得更加无益和更为非生产性。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生产性的和合理的协同是没有任何持久替代者的，必须把这些要求注入人们心中，



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在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可以让其摆脱制度化控制和外在力量与环境压迫的东西，以及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通过恐怖所实施的东西，现代都必须加以常规化，并使之成为个体的道德和情感世界中可靠的力量来源。作为不断进步的合理化之完整部分，道德具有其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以一种有效的价值组织形式引导着工厂、农场或机关内外的个体行为。因此，要说苏联伦理哲学要在某个阶段禁忌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尽管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会比在极为贫困和衰弱的阶段实现这些观念更加合乎逻辑，那就太可笑了。

但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日益扩展的工业化，国际竞争加剧了。在苏联国家内部，物质短缺依然存在，它要求广泛动员民众。在性道德不得不加以维护、妇女的性解放也不得不予以限制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力量必须超出传统的限制而给予解放。根据苏联伦理学的观点，共产主义道德高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最高价值观之一，便是废除家长制统治，建立两性之间的平等。苏联发言人并不隐瞒这种新的平等伦理学的经济原理。在对那些与1936年的反堕胎立法有关的苏联政策所作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辩护中，沃尔逊主要从女性劳动生产力解放的观点出发，讨论了在苏联使妇女获得解放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创造了各种条件，使哺育儿童和教育儿童的工作给妇女提供了将她的母性作用和义务与积极的生产性的和社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机会。”<sup>[4]</sup>他指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技术性劳动的构成已经朝着女性劳动和男性劳动之间平等化的方向加以明显的修改”，而且，他把下述事实视为“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即“苏联妇女已经在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关门的工业部门有所增加并继续增加着”。他列举了一个例子，即有关女性劳动在采矿和冶金工业中所占的高比率。<sup>[5]</sup>妇女的平等不限于体力劳动领域。“在工业、交通和农业革新家的行列，在科学和文化人物的队伍里，许多妇女都占有值得炫耀的地位”，她们“积极地参与了苏维埃国家的管理”<sup>[6]</sup>在这里，苏联社会大概已经超过了那些较老的工业国家，但是，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个体本身所控制之前，妇女的经济解放和文化解放所给予她们的仅仅是平等共享那种异化劳动的制度。

因此，人的生产率有秩序的增长似乎主要是一种“抽象的”劳动力量的增长，而这种增长的价值则是按照所估算的社会需求来加以衡量的。依附于个体具体劳动的那些区别被归于这一共同尺度（这种共同尺度容许有一整个系统的量的差异，它表现在巨大的工资级差上）。对于个体来说，这意味着要培训技术性的生产能力：因为社会需求主要表现在科学的组织化和合理化的

劳动时间上。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强调过不论使用什么样的工作时间的政策，都可以有助于普遍的职业教育。<sup>[7]</sup>这种教育往往易于使个体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技术工具（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智力）。诚然，职业培训要增补一种更好的“较高文化”教育——技术个体和政治个体应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个体。但是，在一种压抑性政治制度内部确立技术合理性之支配地位的同时历史倾向，同时也使得拯救较高文化的努力枉然无效。后者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在这种文明中，统治集团是真正的闲暇阶层；它们的“非生产性”存在（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来说）提供了这种文化气候。换言之，“较高文化”依赖于制度化的和在伦理上获得认可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人格”的价值不应该或不可能是“额外”实践的：它们意味着整个个体存在的塑造。相形之下，工业文明已经通过使脑力劳动从属于商品交换价值而不断减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并且不断地否认“非生产性”闲暇阶层的伦理价值。由于剥除了其反抗性的社会基础，文化已经成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成为受管制的私人存在和公共存在的一部分。

生产力伦理学表现出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的混溶，这是现阶段苏联社会的特点。在这一阶段，这种混溶显然压抑着自身有关个体自由和个体幸福的种种潜在性。如果摆脱了那种必定会阻碍对技术的集体性个人控制和为个人满足而利用技术的政治的话，那么，技术合理性就可能是一个解放的强有力媒介。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生产力伦理学是否包含着超越限制性政治框架的趋势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显然与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相互平行：在第一部分中<sup>[8]</sup>，我们提出，在国际“标准化”的条件下，苏联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易于“淹没”其压抑性的严密管辖，损害旨在使这种管辖长存的各种可能的政治对策。现在的问题则是，在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中是否存在相应的倾向。当然，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但是，就此来说，这种生产力乃是一种主体性因素，它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即令这些规律是从外部“给定的”（为国家和为社会所给定）。作为技术生产力，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也会淹没其政治方向和界限吗？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回答的任何尝试都会牵涉到一种远远超出本书框架之外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探讨。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对于评价未来苏联的发展极为重要，我们冒昧地提出一些看法。

一个最具意义的事实似乎是：在苏联社会里，似乎没有任何抵制加速推

---

\* 指个体生产力。——译者注

\*\* 指社会生产力。——译者注

进的和广泛的自动化的内在力量——无论是在管理方面，抑或是在劳动方面。因此，社会必要的而又令人不快的劳动从人的肌体向机器转移，必定会产生相当迅速的进步，因为这种转移是在与西方世界的竞争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所以更会如此。很自然，因此而取得的节省人的能量的解放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技术的压迫性使用而被取消了，包括工作日的延长、高速操作方法、浪费性生产，如此等等。正是这种技术使用促成了技术的反人道化和破坏性特征：一种限制性的社会需求决定了技术的进步。任何以一种最可能满足个体需求的观点来重新组织技术手段的做法，都是以一种对决定技术之社会需求的“重新规定”为先决前提的。换言之，技术真正的解放作用并不包含于技术进步本身，它们以社会变更为先决前提，包括基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更。

可以说，经济国有化也许能够使苏联社会跳过这一社会变更阶段并只需要政治上的变更，即在保留同样社会基础（国有化）的同时把控制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吗？<sup>[9]</sup>这样一种发展的前景与国际力量的平衡是相联系的。也恰恰就是国际状况（“共处”的境况）迫使苏联社会加速并推广自动化。只要这种国际形势依然存在，技术合理性就往往会不利于限制性的政治合理性，并倾向于在既定的基础上推动政治合理性向自由化发展。

技术合理性也包括一种自由发挥（playfulness）因素——这种因素因压抑性的技术使用而被束缚和歪曲了：自由发挥物（的可能性）、自由发挥物的结合、秩序、形式等。如果这种活动不再是在必然性压迫之下进行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无外乎增长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享受。确实，这样一来，技术生产力就可能正好是专业化的对立面，并从属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赫然阐明的那种“全面个体”的凸显——就其内在逻辑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必要劳动的完全合理化和对物的真正技术管理的基础之上的。

毋庸赘言，现在的现实距离这种可能性已如此遥远，以至于这种可能性似乎只是一种无聊的沉思。然而，一种系统进步的工业化所固有的力量在于：即令是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似乎正束缚或压制着它们，它们也依旧是值得深思的。

### 注释

[1] *Prostitutsiia i mery bor'by s nei*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 1921), pp. 22-33.

[2] *Ibid.*, p. 22.

[3] See Part I, pp. 50 ff.

[4] 引自 *Socialism and the Family*, in *Changing Attitudes in Soviet Russia: The Family in the U. S. S. R.*, ed. by Rudolf Schlesing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9), p. 283.

[5] *Ibid.*, p. 287.

[6] I. S. Kon, *Razvitie Lichnosti pri sotsializme* (Leningrad, Vsesoiuznoe obshchestvo po rasprostraneniuiu politicheskikh i nauchnykh znanii, 1954), p. 16.

[7] See especially pp. 181ff. above.

[8] See especially pp. 185 ff.

[9] 当然，社会变更和政治变更之间的区别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此突出强调一种包含着社会经济结构变更的发展（例如，从私人企业到国有化或社会化的发展）与一种既定经济结构内部的变更之间的差异。

### 13. 共产主义道德趋向



我们已经提出，工业化的共同要求造成了“资产阶级”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各自特有的价值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表现在劳动道德上，也表现在性道德上。苏联伦理哲学本身已经察觉了两种对抗性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宣称，被资产阶级社会所败坏的那些伦理价值，在苏联社会里得到了实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直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苏联社会里则可以变为现实。苏联伦理学宣称，在苏联，伦理原则支配现实，而不是支配意识形态，这一主张和西方类似的主张一样，都是极容易被驳倒的。但是，尽管有各种相似性，却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从苏联伦理学的社会作用中，是否可以推导出一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呢？苏联伦理学的技术—经济基础本身并不“规定”任何这类前景：它既造成了两种体系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也造成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工业化的共同要求可能规定了这种亲缘关系，而工业化方式的根本不同则可能产生了这种表面同一的价值背后的本质性差别。

当我们现在试图确认苏联伦理学的前景方向时，我们再一次把关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种富于启发性的陈述作为一个出发点。这种陈述宣告，资产阶级的个人由于他在公共国家中的实现而在消失，因而作为我思者和原造者的自律“主体”——他应该是西方文化的开端和终结。在已被缩短了了的苏联发展图式中，这种自律的“资产阶级”个体的消解，可能与流行的工业文明的最新阶段相对应，在这一阶段里，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操作导致了自我的萎缩和对他的物质需求与智力需求的管理性调节。在西方社会的后自由阶段，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之间的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背着个体而发生的；而在苏联，则是按照一种经过良好培训的意识 and 作为一种公共宣传的纲领而发生的。它是为了竞争性总体工业化要求对个体进行总体动员的一部分。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征服了前工业文化的残存和遗风：个体

的浪漫因素，特别是性爱关系中的浪漫因素，过去几乎就是“非生产性的”，对社会毫无作用的关系，现在却被造成了适合于并有助于政治上和对社会意义有用的工作关系。如果这种灌输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使其摆脱公共国家需求的存在之整个领域；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意味着对一个可能仍然存在着爆发性要求和渴望的危险区域的控制。随着个体的消失，伦理学价值便丧失了它们的自律性特点，而这种丧失又没有由超验的认可和允诺加以补偿。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和存在学说的伦理学就其自身来说也就消失了。

但是，伦理学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地依赖于自律或超验的认可。若果真如此，文明社会早就完蛋了。因为自律的人格和超验的效应已经被技术控制的增长日益损伤了。认可确乎可以来自公共国家，而不是作为一种超验主体或个体意识的道德自律所赐予的。然而，只有在公共国家以其各种制度来捍卫和促进一种对于所有个体来说都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之情况下，这种认可方能在伦理学意义上具有对个体的约束力（方能不只是一种外在或内在化的强制力量）。伦理学确实在本旨上可以是政治的，但这显然并不是说，一种有效的公开的政治伦理学体系必定会导致一个极权主义的机器人国家。苏联伦理学所拟想的那种行为模式，可能是以重建人的存在和社会为先决前提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他的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相分离，而且他的需求也与社会需求相分离——将让位于这样一种个体，他是公共国家的一个有机整体部分，因为他的需求同时也就是社会的需求。从理论和历史的意义上讲，这样一种发展不是不可能的：政治哲学已经把它规定为与“社会”（gesellschaft）相反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规定为理想的“城邦”，或者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规定为普遍与特殊的和谐。苏联伦理学对它的解释是，把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概念当做“全面个体”的联合。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之间的这种和谐的实现是以一种自由而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为先决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作为一种凌驾和超越或反对个体的独立力量之国家的消亡为先决前提的；而苏联伦理学却在一个以独立的力量支配个体的国家之中，并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而融合了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只要这种状况还依然如故，这种新伦理学就将继续作为一种为国家之基本社会目标服务的辅助工具而发挥作用，即在现阶段作为总体工业化目标的辅助工具而发挥作用。

然而，即使在这一阶段，苏联伦理学也似乎只是收回和“赶上”了资产阶级伦理学最初的作用而已，前者不同的社会基础也并不排除一种不同的发

展倾向。基本的社会制度一经牢固地确立起来，就会强行实施那种为其有效的职能所要求的道德，并使之长久保持。就苏联的情况而言，这一过程并不是听任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和价值施加缓慢而又几乎是自动式的影响，相反，它受各种政治机构的有计划的引导。但这并不妨碍这样一种态势，即因此而受制约的人们必定反过来影响这一制约系统的发展。无论对他们的控制是多么彻底，也无论对他们的制约是多么深刻，他们都在从事着再生产这个被控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无论这种劳动可能是多么“抽象”和“一般”，他们依然是最终的“生产力”。我们已经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资产阶级价值”的重新强调，也就是回复伦理学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国家依赖于为社会所要求的那些价值的“内向投射”，而不是依赖于它的外部强加；依赖于伦理行为“自发的”再生产，而不是依赖于恐怖主义的实行。但是，在这里，苏联伦理学所使用的“人的材料”却不利于对“资产阶级伦理学”过程的单纯重复。

在西方传统中，伦理价值的“内向投射”发生于“个体”身上，并通过个体而发生：他从旧的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的解放，是这一过程发生效验的先决条件。人与国家、团体、习俗和传统的分离，他与这些东西及新的权力和制度的对抗性关系，乃是他的道德自律和对伦理价值的自发而内在的阐发与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唯有在这一基础上，内向投射才能成为真正的内在化，即成为个体自己的良心和信念的要求。从而，这些要求的有效性才会大大加强。它们并不表现为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东西，而是表现为个体自身理想本性的内在流露；它们并不靠强力认可，而是由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来认可，而对它们的服从也往往成为本能的和几乎是自动的服从。这样一来，义务、劳动和纪律也就成了自在的目的，不再依赖于按照它们的现实必然性所作的合理说明。自我克制成为个体精神世界的一个有机整体部分（也可以说是它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并通过教育和社会气候而代代相传，它也就不必非得经常地靠专门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强化了。然则，在苏联社会中，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受到伦理学政治化的抵制，受到把个体吸收到公共国家之中的做法的抵制。伦理价值的外在化只能容许极低程度的内在化。由于传统的个体实体的消解，内在化的基础被削弱了。一切伦理价值都被有系统地归结于苏联社会的要求：这种社会的特定状况和苏联国家的目标与需要才能证实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这种归结和这种证实方法被明确而持久地引入人们的意识之中。

我们已努力表明，伦理学的这种政治外在化最终是由一种绝对所引导的，

即是由共产主义所引导的，因之也就有别于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但是，这种绝对的标准最终又从属于社会所趋向的目标，而不是从属于达到这一目标的道德的（和技术的）手段。无论后者与前者的同一化是多么密切，道德规范都不是自在的目的；它们以未来为目的，而且只能从国家及其机体为未来所制定的社会规范中获得对它们的认可。因此，苦役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只有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苦役才是一种价值；并非一切竞争性行为都有价值，只有社会主义的竞争才有价值；不是所有的财产都有价值，只有社会主义的财产才有价值；不是任何爱国主义都有价值，只有苏联的爱国主义才有价值；如此等等。对于个体来说，只要他不作出任何选择，只要国家规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强行推广这一规定，就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内在化的削弱损害了社会的凝聚力和道德的深度。

苏联伦理学的理性主义达到了可能危及它理想达到的稳定的程度。在本书的第一部分<sup>[1]</sup>，我们已经强调过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礼教成分。在这一方面，我们业已提出，甚至这些明显的非理性因素在为这一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合理性服务中也发挥着作用。它的理性主义是在道德规范井然有序地趋向“绝对的”共产主义目标的定向中所固有的，这一目标又是从可证实的角度加以合理规定的。工作日是否要减少到五小时或更短一些？个体的自由时间是否真的是他的？他是否必须靠取得各种必需品来“挣得他的生活”？他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职业——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个体本身加以证实。无论个体可能受到怎样的统制和操纵，他们都将明白这样规定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事实。在这里，苏联的社会哲学与法西斯纳粹之间仍有决定性的差别。后者是以种族、血缘、超凡魅力的领袖之类本质上反理性、伪自然的实体为本位的。无论法西斯纳粹国家的实际组织可能是多么合理（德国的全民总动员和总体战时经济属于现代工业文明最有效率的表现），这个国家本身在其历史作用上都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它阻碍了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且是按照破坏性统治的利益来组织这些资源的。它所固有的目标构成了法西斯国家的历史局限。相反，苏联的理性主义并未停留在工具性上，而是伸展到了社会组织的方向和目标上。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这种概念上的联结。由根据自由发展的个体需求进行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按照减少为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质与量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以及用职能的自由选择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就目前的事态来看，这些概念当然是非现实主义的。但是，这些概念本身却是合乎理性的；况且，技术的进步和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力也使趋向于这一未来的进



化成为一种合理的可能性。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苏联政体的结构是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实现这一问题。<sup>[2]</sup>在那里，我们已经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传播和灌输结果可能还会证明是一种危及苏联统治者的危险武器。迄今为止，这一政体一直在通过马克思来证明其基本政策的正当性，来竭力调和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被定于圣典的压抑性道德，被说成是表达了初级阶段，即建设充分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客观要求。劳动和休闲训练的道德、在爱与苦役中体现的竞争性爱国主义的道德——整个政治清教道德——应该与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相符合，这个阶段因其匮乏而被迫按照个体行为对社会的有用性表现来评价个体的行为。伦理学的合理性与社会学的合理性同一化了。

这种同一化对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来说是带根本性的，如果这种同一化仍被坚持，那么社会发展的大规模变更就必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更：压抑性道德必定随着匮乏的不断减轻而减弱。在本书第一部分里，我们业已提出，在长期“和平共存”的环境下，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可能易于导致这种减弱。如果苏联政体无法或不希望相应地松弛这种压抑性道德，那么，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来看，它将日益变得非理性化。这种非理性又可能反过来削弱苏联社会的道德结构。全部思想灌输都集中于个体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目标的合理性上；而对这种合理性的信念也似乎已经是这一政体受大众欢迎的力量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此，内在化的种种局限——它们似乎是现行苏联伦理学结构中所固有的——可能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苏联伦理学的价值说到底是由“外在的”政治目标证实的，因此它不是自律的。只有彻底地内在化，伦理学才能以各种自律的价值而发挥长远的作用。而且，只有一种高度的伦理自律才能长期使可预测的和持久的伦理行为适当地独立于个体的变化多端的影响。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使个体在道德上免受社会所要求的非理性的牺牲、非正义和不平等的冲击。苏联伦理学的政治合理性并不利于个体的这种道德防范，而且维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的发展的各种潜在性应该与苏联社会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同步增长。因之，意识形态的压力似乎应和技术经济的压力一样趋向于同一方向，即趋向于压抑的松弛。诚然，意识形态的压力甚至是既定道德的削弱，本身并不对掌握着推行其目标的一切工具的政体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这些力量若与一种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动态实际地联系起来，那么它们虽然尚未形成、尚未组织起来，却完全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苏联发展的历程。

**注释**

[1] See Chap. 3, especially pp. 87 ff.

[2] See Part I, Chap. 6.

# 索引



- Aesthetics, *see* Art
- Aleksandrov debate, 11, 128
- Alienation, 196, 208, 234 f. , 238
- Art: and realism, 128ff. ; Hegel on, 130 f. ; in Soviet society, 131 ff.
- Bernstein, Eduard, 28, 31, 148, 242
- Bolshevik Revolution, 11, 42, 43, 121, 150, 197
-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43, 71 ff.
- Brecht, Bert, 129
- Bucharin, N. I. , 64
- Bureaucracy, Soviet, 108 ff. , 115 ff. , 171
- Capitalism, 6, 27, 161; as a precondition for Socialism, 19 f. , 43 f. ; uneven development of, 42; Soviet Marxist analysis of, 50 ff. ; "general crisis," 58 ff. , 165 f.
- Class struggle, 23, 54, 96 f.
- Coexistence, 7, 62 ff. , 70, 80, 93, 100, 116, 118, 155, 159, 173, 176, 178, 185, 197, 257
- Common interest, 117 f.
- Communist morality, *see* Morality, Communist
- Contradictions, interimperialist, 49, 65 f. , 99; internal and external, 79 f. , 94, 97 ff. ; in Soviet society, 108, 166 f. ; antagonistic and nonantagonistic, 153 f.
- Control, social, 110 ff.
- Dewey, John, 224, 226, 228 ff.
- Dialectic, 136 ff. , 227; Hegelian, 137, 138 ff. , 151, 158; Marxian, 141 f. , 158; Soviet, 141 ff. , 169 f. ; Engels on, 142 f.
- Education, Stalin on, 182 f.
- Engels, Friedrich, 21, 22 f. , 69, 74, 104, 105, 120 ff. , 167, 168, 180, 183, 200,

- 222; and dialectic, 138, 142 ff. ; and freedom, 152
- Ethics, Soviet, 197, 201 ff. , 210 ff. , 228, 259 ff. ; Western, 198 ff. , 204, 211 f. , 232, 246, Soviet criticism of, 225 ff. ; and politics, 220 ff. ; Soviet compared with Western, 258
- Fascism, 51 ff. , 75
- Foster, William, 90
- Freedom, 20, 92, 117, 125 f. , 129 f. , 132 f. , 196, 213, 215 f. , 221 f. , 231, 235, 257; logic of, 140 f. ; Hegel on, 140 f. , 152, 223; and necessity, 151 f. , 222f. ; and security, 191, 205 ff. ; Western notion of, 198, 205 ff. , 211 f. ; Max on, 201, 208; and Soviet society, 207 f.
- Freud, Sigmund, 224
- Hegel, G. W. F. , 220, 261; and historical law, 2 ff. ; and freedom, 2, 152, 222 f. ; and Marx, 2 f. , 154; and art, 130 f. ; and dialectic, 137 f.
- Hilferding, Rudolf, 32 f. , 47, 64
- Historical laws, 2 ff. , 6
-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Soviet ethic, 219
- Ideology, discussion of. 91, 124 ff.
- Imperialism, 28 f. , 46 ff. , 60, 62, 76, 161 f.
- Intelligentsia, *see* Bureaucracy
- Interest, real and immediate, in Leninism, 41 f. ; in Soviet Marxism after Lenin, 96, 118 f.
- Kautsky, Karl, 31, 33, 103
- Kollantai, A. , 248
- Khrushchev, Nikita, 169, 177
- Kuusinen, O. , 54
- Lenin, V. I. , 64, 70, 99, 116;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 40 ff. ; on communist morality, 214 ff.
- Leninism, 11, 29 ff. , 74 ff.
- Linguistics debate, 158 f.
- Logic, 139 f. , 157; formal and dialectical, 156 ff.
- Luxemburg, Rosa, 64
- Magic, and language, 88 f. ; and art, 133 f.
- Malenkov, G. M. , 174, 177
- Marr, N. J. , 157 ff.
- Marshall Plan, 56, 68

- Marx, Karl: on historical laws, 2 f. ; o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17 ff. ;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immediate interest, 23 f. , 41, 118 f. ; on the proletarian party, 26; notion of freedom, 233; notion of work, 234 f.
- Molotov, V. M. , 177
- Morality, Communist, 214 f. ; 231 ff. ; and love, 243 ff. ; and productivity, 248 ff.
- Nationalization, 81 f. , 86, 93 f. , 238, 256 f.
- Nietzsche, Friedrich, 224, 228
- Philosophy, views on, 125 ff.
- Plato, and art, 132, 135; and ethics, 220 f.
- Proletariat, 9, 15, 18, 24 f. , 26, 28, 40 f. , 103 f. , 125; class consciousness of , 18 f. , 22 f. , 27
- Rationalization: in first phase of socialism, 20; and freedom, 20; and “exploitaion”, 68; technological, 84, 251
- Reason, in Hegel, 2, 139, 223; idea of,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83 ff. ; and freedom, 85, 89, 125 f. , 182, 202, 224
- Reification, 24
- Ritualization of Marxism, 87 ff.
- Rozental, M. M. , 150
- Schopenhauer, Arthur, 224, 228
- Security and freedom, 191, 206
- Shariia, P. , 226
- Social control, 110 ff.
- Social Democracy, 30, 35, 242
- Socialism: two phases of , 20 ff. ; construction of , in Soviet society, 78 ff. ; in one country, 93 ff. ; transition to communism, 165 ff.
- Socialist state, 21; and democratizntion, 188 f.
- Stakhanovism, 12, 160, 238
- Stalin, J. V. , 53; on interimperialist contradictions, 65, 75, 161 f. ; on the state, 101 f. , 111; on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160 ff.
- Stalinism and Leninism, 74 ff.
- State, 21 f. , 66 f. ; in Stalin, 101 f. , 179 ff. ; and Soviet society, 107 ff. , 123 ff. , 183 f. ; in Engels, 120 ff.
- Stepanian, Ts. , A. , 114
- Strumilin, S. G. , 247
- Terror, 112 f. , 212, 251 f.
- Trakhtenberg, I. , 61

- Trotsky, Leon, 30
- Truth, interpretation of, 86 ff. , 226 ff.
- Two-camp doctrine, 56 f.
- Ultraimperialism, 60, 67
- United front policy, 57, 72 f. , 173
- Varga, E. , 57, 66 f.
- Weber, Max, 185 f.
- Women, emancipation in Soviet society, 252 f.
- Work, attitude toward, 178, 183, 233 ff.
- Zhdanov, A. , 56 f. , 63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by Herbert Marcuse

Copyright © 195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